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先　秦　卷）

郭预衡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 Zhōngguógŭdài Wénxué shí Chángbiān (Xiānqínjuàn)/郭预衡主编；熊先光等编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1996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81039-705-2

Ⅰ.中… Ⅱ.①郭… ②熊… Ⅲ.①文学史-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学史-中国-先秦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Ⅳ.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6901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100037）
三河科教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2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字数427千　印数3,001—6,000册
定价 15.40 元

主　　编　郭预衡

编　　写　（按姓氏笔画）

万光治

林邦钧

赵仁珪

段启明

熊宪光

序　　言

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是为了适应三种需要而编写的。

其一，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教师提供一点讲授的方便。

其二，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方便。

其三，给自学中国文学史者的读者提供自学的参考。

编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讲授中国文学史，在基本教材之外，需要一部论述简要而资料丰富的辅助教材。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不必翻检群书而看到一些原始资料，用于教学，比较方便。

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不能人人自备参考书的条件下，有了这部辅助教材，也就可以补充所学的知识，且有助于自己钻研。

对于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得到文学史最简明的内容提要和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部《长编》是配合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而编的辅助教材，已列入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部《长编》，和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虽有一些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却也并不新奇。名为"长编"，即取《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的名称，其体例也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有些相似。近

人著作体例之相近者，则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当然，作为文学史的“长编”，又和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

编者用心如此，希望于读者有益；但因水平所限，缺点实多，切望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师院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学术著作出书甚难的岁月里，风雨同舟，不胜感激。

编　者

1991年2月

编写说明

1. 本书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分编五卷。

2. 本书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1）文学史的纲要。

（2）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

3. 纲要力求简明，眉目清楚。

4. 引据材料，力求精确，注明出处。一般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卷次。但屡见或习见之书，一般只出书名，不出著者。如系转引之书，则加说明。一般不注版本。

5. 所引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般不录当代著作。有必要时，酌加补充说明，附以编者按语。

6. 全书五卷，体例力求统一。但因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编写方式也不尽一律。

7. 本书五卷册，皆为集体编写。每卷的执笔人是：

先秦卷	熊宪光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万光治
隋唐五代卷	林邦钧
两宋辽金卷	赵仁珪
元明清卷	段启明

目　录

第一章 总　论

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的源头。所谓“先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先秦”，指秦统一中国以前直至远古，包括原始社会(从远古到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奴隶社会(夏、商、周、春秋时代)和封建社会确立的战国时代。至于狭义的“先秦”，则主要指秦统一天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具有近4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但在春秋以前，文学作品遗留不多，现存先秦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因此，我们讲“先秦文学”，便主要讲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文学。

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中国文学史的第一篇。作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背景，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都具有不同于后世的特点。先秦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迹可寻，而作为发轫时期的文学，它自具独特的风貌和显著的特征，并以其辉煌的成就光耀后代。先秦文学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景十三王传》)

“先秦”，犹言秦先，谓未焚书之前。(同上颜师古注)

第一节　先秦时代的历史特点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遍布华北、华中、华南、西北、东北、西南的广大地区生活、劳动、繁衍，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它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奴隶社会的诞生。夏朝自禹至桀，共传14世、17王，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长达400多年。自禹死之后，其子启废除"禅让"制，继承王位，开始了王位世袭制。其后商汤灭夏，建立商朝，进一步发展为奴隶制的文明大国。商朝自汤迄纣，共传17世、31王，大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长达600余年。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率诸侯伐纣，灭商建周，史称西周。周是国势强盛、文明发达的奴隶制泱泱大国。至周幽王时，政治大坏，民怨沸腾。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遂亡。自武王迄幽王，共历11世、12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历史便进入了春秋时代。

春秋以前，文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早在文字发明之前，就已有口头文学的产生，包括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但远古口头文学悠邈难见，后人的记载又大多失真，故中国文学的"信史"时代，应起于文字发明之后。

据现有考古资料推测，夏代可能已有原始的文字，但并无留存。现存最古可识的文字是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及稍后的金文。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虽可称为包孕着文学因素的胚胎，但毕竟还算不上文学作品。至于《尚书》中保存的一些较为可信的商、周文献，和《诗经》中产生于西周时期的一些作品，则可认为显示了文学的萌芽和发展。

先秦文学的兴盛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上承商、

周，下连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一个时期。它以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革，思想的活跃解放和文化的空前繁荣为主要特征，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论语·卫灵公》）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同上）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按：一作"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一》）

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夏本纪》）

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

纣愈淫乱不止。……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史记·殷本纪》）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

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史记·周本纪》)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均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自平王东迁，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列国兼并，战争频仍。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社会的变革天翻地覆。先秦文学的兴盛，是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左传·宣公三年》)

昔天子之地一圻(杜预注：方千里)，列国一同(杜预注：方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王霸》)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史记·太史公自序》)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同上)

周室自文、武始兴，……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伯之起，尊事周室。……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刘向《战国策书录》)

（一）春秋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春秋时期，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都在原有基础上飞速地向前发展。铁器与牛耕的使用，大大推动了在当时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的进步。与此同时，手工业与商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逐渐取代了昔日奴隶制度下所谓“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促成了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制的产生。由于荒地的大量开垦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私田不断增加，周代的所谓“井田制”逐渐废弛，土地私有制产生并逐渐巩固。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税亩”，意味着鲁国井田制的废除和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化。各诸侯为了适应竞争的形势，维持自己的统治，也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齐任管仲改制，楚令尹子木使“庀赋”，郑子产作“丘赋”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产生。随着封建制关系的逐步形成，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谓“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都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先前“工商食官”的格局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一切，都标志着旧的奴隶制的瓦解和新的封建制的产生。

1. 铁器与牛耕的使用

铁器的使用大约在春秋初年，至于它的发明则应更早。春秋末，牛耕已在农业生产中广泛推广。铁器与牛耕的使用，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毛诗正义》卷六《秦风·驷驖》)

言襄公乘一乘驷驖色之马，甚肥大也。……驖者，言其色黑如驖。(同上孔颖达疏)

驷驖，四马皆黑色如铁也。(朱熹《诗集传》卷六《秦风 驷驖》注)

桓公问曰："……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斸，试诸壤土。"(《国语·齐语》)

窦犨侍曰："……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国语·晋语九》)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管子·海王》)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司马耕，字子牛。(同上)

2. 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早在西周末年，就已有私田存在，这意味着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到了春秋时期，不仅由于广泛开垦荒地，私田大量增加；而且公田也逐渐被许多诸侯、卿、大夫侵夺为私有财产，以至各诸侯国田土之争，已是屡见不鲜。这表明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周"井田制"基本废弛，土地私有制产生并发展起来。

公子夷吾出见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絷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国语·晋语二》)

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曰："佞之见佞，果丧其田。……丧田不惩，祸乱其兴。"(《国语·晋语三》)

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国语·晋语八》)

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左传·隐公十一年》)

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左传·成公七年》)

郤锜夺夷阳五田，五亦嬖于厉公。郤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左传·成公十七年》)

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左传·襄公十年》)

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左传·昭公十四年》)

3.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与农业的发展相适应，春秋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工艺更趋精细，器物制作数、质俱进。一些新的手工业部门，如煮盐业、冶铁业、漆器业也兴盛起来。这时候，出现了周游列国的私商，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旧格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工匠役工，以攻其财；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逸周书·大聚解》)

关市平，商贾归之。(同上)

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国语·晋语八》

春，秦师过周北门，……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吕氏春秋·上农》）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同上）

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汉书·食货志》）

4. 各诸侯国的改革

变革的现实促成了现实的变革。面对现实社会的风云变幻，慑于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各国统治者都先后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措施，以稳定秩序，维持统治，谋求生存与发展。

初税亩（杜预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春秋经·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初税亩，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楚𫇭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𫇭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

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汉书·食货志》）

5. 阶级关系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不能不使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发生变化。其中，既有贵族的衰落，也有新富的暴发。原来尊卑有等的旧秩序被打乱了，士、农、工、商也处于分化之中。旧的礼、乐、刑、政难以继续维持，"僭越"、"犯上"之事多不胜数。这都表明，旧的阶级关系已被破坏，新的阶级关系正在形成。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三家（按：指鲁国当政的三卿，即仲孙、叔孙、季孙）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同上）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同上）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左传·隐公三年》）

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左传·桓公五年》）

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桓公十五年》）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韦昭注：虞、夏、商）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

（二）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各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兼并战争此伏彼起。各国并大兼小，互相吞灭，终于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并峙、力战争雄的"战国"局面。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经历了空前未有的变动，经济、政治发生了新的根本变化。连绵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激烈。广大奴隶阶级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平民阶级反对世袭贵族的斗争，推动历史车轮进入了新的时代。奴隶制度终于崩溃，封建制度得以确立。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文学。先秦文学在战国时期取得了最辉煌的成果。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

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三》)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

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史记·天官书》)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政)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

1. 经济迅猛发展

战国时代，生产关系随着社会生产的蓬勃发展而发生根本变革，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劳动者冲破了奴隶制的桎梏，比过去有了较多的自由和生产积极性。这就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飞速进步，工商业随之兴盛发达，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财货交流，城市繁华。“货币的进军”动摇了氏族制度的基身，冲破了各诸侯国之间宗族的樊篱，使尊卑贵贱有严格规定的礼制日趋崩溃，新兴的阶级代替了腐朽的旧贵族。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意识也不能不随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今也农夫之所以蚤(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墨子·鲁问》)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

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垸，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彩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荀子·王制》)

掩地表亩，刺屮(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荀子·富国》)

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荀子·大略》)

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荀子·强国》)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绤、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韩非子·诡使》)

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韩非子·五蠹》)

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韩非子·说林下》)

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韩非子·五蠹》)

夫买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吕氏春秋·仲秋纪》)

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

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周礼·考工记》)

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同上)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汉书·食货志》)

(董仲舒)又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同上)

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2. 各国变法图强

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标志，晋、齐二国先后完成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楚、秦、燕三国也先后进行社会改革，新兴的地主阶级终于登上政治舞台，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七雄争为霸主，无不奋发图强，竞相走上改革之路。变法之风，吹遍各国。如魏之李悝，楚之吴起，秦之商鞅，赵之武灵王，韩之申不害，都是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的著名代表人物。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较为彻底，成效卓著，不仅巩固了秦的封建制，使之国富兵强；而且为日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国的变法革新虽然并不同步，改革的程度亦有差异，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但通过变法，各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封建的社会改革，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确立了封建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出公十七年(前458)，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哀公四年(前453)，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烈公十九年(前401)，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按：据《史记·六国年表》，"魏、韩、赵始列为诸侯"当魏文侯22年，韩景侯6年，赵烈侯6年，即公元前403年)。(《史记·晋世家》)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襄子卒，子庄子白立。……庄子卒，子太公和立。……三年(按即齐康公16年，前389)，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前386)，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

足，贾平而止。……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

是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晋书·刑法志》）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韩非子·和氏》）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韩非子·和氏》）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战国策·秦策一》）

蔡泽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功已成，遂以车裂。……"（《战国策·秦策三》）

（孝公）三年（前359），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十四年（前348），初为赋。（《史记·秦本纪》）

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仟伯，东雄诸侯。（《汉书·地理志》）

（武灵）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与肥义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于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骑射焉。（《资治通鉴·周纪三·赧王八年(前307)》）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昭侯)八年(前351),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

二　思想解放与文化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激烈,为生机勃勃的先秦文学之林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和繁茂生长的条件;而士阶层的崛起及思想的活跃、解放则犹如涌现了一批敢于创新、善于经营的出色园丁;文化的空前繁荣又好像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充足养料。有了这样一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先秦文学之林怎么能不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呢!

(一)士阶层的崛起

西周之初,"士"为贵族领主的最低层。进入春秋,"士"仍是"食田"的土地占有者。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各诸侯国先后经过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结束了领主割据的局面,使旧的世卿世禄制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尽管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很不平衡,但西周宗法的"宗子维城"(《诗·大雅·板》)毕竟化为历史陈迹,氏族贵族礼制的统治成了过去,国人(自由民)获得了一次伟大的解放。各阶级在斗争中重新分化、组合,一个新的士阶层冲破了贵族的樊篱,崛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士这一阶层较为复杂,有贵族没落降而为"士"的,也有自下层而上升为"士"的。"士"的流品亦颇不纯,大体上包括武士、文士、策士和食客。食客之中,流品最杂,甚至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者流。他们是在领主经济转化为地主经济,封君政治转化为官僚政治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也是打破了先前"学在官府"的垄断,文化学术走向民间的结果。他们大抵受过"六艺"的教育,是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有才干的人物。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

运动的漩涡之中，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之上，各自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或用舌与笔，或用刀和剑，或两者并用，不愧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一批英雄。特别是其中的“文士”，不少从事教育和著述，既培养了大批人才，又为文学作品的产生提供了优秀的创作主体。可以认为，士阶层的崛起乃是先秦文学兴盛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尚书·多士》)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韦昭注：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　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韦昭注：讲学道艺者)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

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管子·乘马》)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郯子曰：“……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子囊曰：“……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襄公九年》)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战国策·齐策四》）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范宁集解：学习道艺者），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历书》）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史记·孔子世家》）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史记·吕不韦列传》）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史记·孟尝君列传》）

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史记·魏公子列传》）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食货志》）

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中》）

（二）思想界的活跃

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社会经历了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已成过去，私家聚徒讲学之风盛极一时。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争鸣之风大炽于天下。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为儒、墨、道、法、纵横五家。孔丘开创的儒家和墨翟开创的墨家在当时已有"显学"之称。各家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各逞其说，放言争辩，不仅不同学派之间可以互相争论，而且本学派以至师生之间也不妨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便是这种情况发展的自然结果。各家的产生原有一定地域特征，如邹鲁乃儒、墨之邦，三晋多权变之士，南方为道家之乡，燕齐出阴阳家者流；但它们又互相影响，彼此渗透，相灭相生，相反相成；于是形成了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百家争鸣，处士横议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庄子·天下》)

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

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同上)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

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汉书·艺文志》)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诸子十家(按：指儒、道、阴阳、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按：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去小说家。古者官师合一，私家无学。及王道既微，官失其守，始有私家之学)。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同上)

春秋以后，角战争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晔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暨战国争雄，辩士云踊；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刘知几《史通·言语》）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三）文化的繁荣

自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以"六艺"设教讲学，古代文化始得以整理、传播，从此揭开了文化史上的新篇章。时至战国，诸子蜂起，各家著书立说，又将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更使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不仅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社会科学成就辉煌，艺术也相应地有了划时代的进步，而且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以及农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也大放异彩。虽然这些学科门类大多没有完全独立，未能自成体系，或者残缺不全，甚或早已失传，但凭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亦可大体推见先秦文化之灿烂。作为先秦灿烂文化之一部分的先秦文学，飞跃发展于春秋战国之时，是与整个先秦文化的繁荣发展步调一致的。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裴骃《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张守节《正义》曰：《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楚，唐眜；赵，尹皋；魏，石申（张守节《正义》曰：《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也)。(《史记·天官书》)

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同上)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颜师古注：孙武也，臣于阖庐)。(《汉书·艺文志》)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颜师古注：孙膑)。(同上)

《公孙鞅》二十七篇。(同上)

《吴起》四十八篇。(同上)

《楚兵法》七篇。图四卷。(同上)

《尉缭》三十一篇。(同上)

《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按：《史记·魏公子列传》：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同上)

凡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按：据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按：今计五十六家，八百零六篇，多十六篇，图五十卷，多七卷)。(《汉书·艺文志》)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按：所谓“四种”，即“权谋”、“阴阳”、“形势”、“技巧”。)(同上)

1972年4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在这批竹简中，除《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以外，还发现《六韬》和《尉缭子》。(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孙膑兵法》附录《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

《神农》二十篇(原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汉书·艺文志》)

《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国时，在齐、楚间。)(同上)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同上)

《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汉书·艺文志》)

《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同上)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按：所谓"四种"，即"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同上)

战国时期，艺术也有划时代的进步。青铜器表现出精巧的风格，形制轻便适用而且多样化。花纹多全身施饰，连续环绕，主要是精细的几何图案，又多用现实性的鸟兽形图案作附饰物，有用金银丝镶嵌成的，有用立体装饰的，还有全器作鸟兽形的。大型青铜器的花纹中有描写现实生活的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乐等图像。……在绘画艺术方面，壁画和帛画都发展起来了。(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第一章)

战国时地理学家依据地理知识和各种传闻所著的书，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比较确实的地志，《山海经》的《山经》、《周礼》的《职方志》、《尚书》的《禹贡》属这一类。《禹贡》所记最为确实。一类是真伪混杂，伪多于真的传闻，《穆天子传》(假托周穆王西游事)、《逸周书》的《王会解》(假托周成王受四方诸侯的贡品)、《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属这一类。(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五章第九节)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独特风貌

在先秦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秦文学按照自身的规律走过了漫长的历程，留下了明晰可辨的发展轨迹。作为我国文学史的开端，先秦文学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显示了鲜明的特征，并以其伟大的成就沾溉后世。

一　发展轨迹和主要特征

(一)发展轨迹

我国文学发展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文字发明以前出现的口头

文学，包括原始歌谣和远古神话传说。然而由于年代悠远，又缺乏文字记录，仅靠口头流传的作品势必失真。尽管古籍中尚有一些残留的记载，但难免有后人的窜改和增删。因此，我们讲文学的"信史"时代，应在文字产生之后。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我国的汉字已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然而现存最古可识的文字则是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以及稍后的金文。有了文字，也就有了书面文学的原始材料，我们便可据以了解书面文学的最初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文学"信史"的第一页，是从殷商时期揭开的。

从殷商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历史演进了1000多年，社会经历了从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的巨变。这一时期的文学，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样式。它们也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展开了自身发展的历程。这一历程，是有迹可寻的。

1. 诗歌的起源和原始歌谣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自身，创造了文明，也创造了文学艺术。最早的文艺作品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之中，它是生产实践的需要，劳动生活的反映，也是人类心灵世界的表现。原始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生产劳动的实践所决定的。

（1）诗歌的起源

诗歌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当人类有了语言之后，它便产生了。原始的诗歌，与人类的劳动生活紧密相连，并且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尧典》)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礼记·檀弓上》)

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摇)，犹(摇)斯舞。(《礼记·檀弓下》)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礼记·乐记》)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同上)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淮南子·道应训》)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语)

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

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在所有这些场合下，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决定的。不仅如此，生产过程的技术操作性质，对于伴随工作的歌的内容，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研究劳动、音乐和诗歌的相互关系，使毕歇尔得出这个结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上，劳动、音乐和诗歌是极其紧密地互相联系着的，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其余的组成部分只具有从属的意义"。(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

歌起于劳动和宗教。其一，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借有自然的韵调；其二，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渐因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2）原始歌谣

原始歌谣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的现实生活，也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愿望。原始歌谣标志着我国诗歌的起源，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是原始社会人类的集体口头创作，并在人们口头代代流传。由于时代遥远，又缺乏文字记录，年久湮灭，我们现在已难看到它们的原貌。在一些古籍中，记载有所谓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如所谓《康衢谣》、《击壤歌》、《尧戒》、《赓歌》、《卿云歌》、《南风歌》等，但它们多系后人伪托之作，即或为真，也难免经过后人的改窜。因而这些作品大都真伪难辨，不可尽信。不过，古籍记载中也有少数较为质朴的歌谣，如《周易·归妹》上六爻辞、《候人歌》、《逐魃令》、《蜡辞》、《弹歌》等，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接近原始的形态。这些作品从思想到形式可能依稀保留了原始歌谣的部分风貌。

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康衢谣》，见《列子·仲尼篇》）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击壤

歌》，见《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

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尧戒》，见《淮南子·人间训》）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赓歌》，见《史记·夏本纪》）

卿云烂兮，糺(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卿云歌》，见《尚书大传》）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见《孔子家语·辨乐篇》）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弹歌》，见《吴越春秋》卷九）

候人兮猗！（《候人歌》，见《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蜡辞》，见《礼记·郊特牲》）

神，北行！（《逐魃令》，见《山海经·大荒北经》）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周易·归妹》上六爻辞）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孔颖达正义：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时虽有乐，容或无诗）。……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郑玄《诗谱序》）

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久则忘失。缀以韵文，则便于吟咏，而记忆为易。（章炳麟《文学说例》）

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忆，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章炳麟《文学总略》）

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四条）

上古之时，未有诗歌，先有谣谚。（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二三条）

2. 文字的产生和书面文学的萌芽

（1）文字的产生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人类社会过渡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是由图画演变为符号，逐步进化而成。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文字的起源，年代悠远。根据考古发掘证明，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上所显示的契刻符号，其个别形体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字形已相近似，很可能这便是中国最原始的文字。关于文字的发明，历来有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其实，文字应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过程中的智慧的结晶，决非某一个人所独创。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易传·系辞下》）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而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许慎《说文解字叙》）

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

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同上）

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

（2）书面文学的萌芽

据现有资料看来，最古可识并用于文献记录的文字，是3000多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自1899年起陆续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证明我国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便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和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严格说来，这些都还称不上文学作品，但其中显然已含有某些文学的因素。此外，商代和周初的钟鼎彝器铭文，《易经》中的卦爻辞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文学意义。这些书面文学的初期形态尽管十分幼稚，但却标志着我国书面文学的萌芽，包孕着后代韵文和散文的胚胎，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① 甲骨卜辞中的文学因素

甲骨卜辞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的记录，其中也间或有少量与占卜有关或其他偶然的记事文字。其篇幅大都短小，多为片断的文辞，但记事清楚、准确，有的还形式整齐，且语句中含有某种感情，具有一定文学因素。

己巳王卜贞，[今] 岁商受 [年] 。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殷契粹编》九〇七）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三七五）

辛亥贞……在祖乙宗。丁酉贞，王乍(作) 三自(师)：右、中、左。辛

未卜，又(侑)于出日。(《殷契粹编》五九七)

翌甲戌，河其令雨；翌甲戌，河不令雨。(《殷虚文字乙编》三一二一)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殷虚书契前编》一·五〇·一)

戊戌卜贞，今日旦，王疾目，不丧明？其丧明？(《殷虚文字乙编》六四)

戊午卜，争，水其驭兹邑？其为我家祖辛佐王？其家祖乙佐王？(《殷虚文字乙编》三一六二)

② 钟鼎彝器铭文

如果说先秦散文如浩浩江河，史家之文则如其滚滚支流，而商、周钟鼎彝器铭文便是这一支流的源头。在传世的数千件有铭彝器中，保留了较早的史家记事文字，意味着史家记事之文的萌芽。

癸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障彝。惟王六祀，彡日，在三月。(《小臣邑斝》，《续殷文存》下)

庚申，王在东闲。王格，宰椃从。易贝五朋，用作父乙宝障。在六月，惟王廿祀，羽又五。(《宰椃角》，《殷文存》下)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惟王十祀有五，彡日。(《丁巳尊》，《殷文存》上)

王徂夷方，无敄咸，王商作册般贝，用作父巳障，来册。(《般作父巳甗》，《殷文存》上)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立(位)，乍(作)四方亟，秉繁蜀巢，令易铃，锄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驭国人伐东国痛戎，咸王令吴白曰："以乃自左比毛父。"王令吕白曰："以乃自右比毛父。"趞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徃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成，昦(敉)天畏，否畀屯陟。公告氒(厥)事于上，囗唯民亡徃才彝悉天命，故亡。允才显唯敬德，亡逌违。班拜韻(稽)首曰：乌虖！不杯丮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囗孙陾于大服，广成氒工，文王孙亡弗怀井，亡克竞氒剌(烈)。班非敢觅，唯乍(作)卲考奭盦曰大政，子子孙[孙]多世其永

宝。（《班簋》，见《文物》1972年9期及《殷周金文集录》693）

隹（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㽙（壮）武于戎工，经维（维）四方。搏伐厰（玁）執（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嚇（讯）五十，是以先行。趄趄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格）周庙宣㓝爰卿（飨）。王曰："白父，孔覭又(有)光。王賜㓝马，是用左（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政(征)緣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疆)。（《虢季子白盘》，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③ 《易经》中的卦爻辞

《易经》即《周易》本经，原为卜筮之书，以卦爻辞指告人事的吉凶祸福，是供巫史算卦所用的专门著作。《易经》中的卦爻辞记载了巫史们卜筮所积累的经验，反映了比甲骨卜辞更为丰富、宽广的社会内容，其文辞则是在甲骨卜辞基础上的发展。在卦爻辞中，颇有一些富于文学意义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歌谣体或近似歌谣体的作品，不妨认为是诗歌的萌芽。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屯》六二)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小畜》六四）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履》六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泰》九三）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六四）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无妄》六三）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颐》初九）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九四）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六三）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震》）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渐》六二）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渐》九三）

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丰》上六）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3. 从《诗经》到"楚辞"

我国无愧"诗国"之称，诗歌的传统源远流长。原始歌谣固然应是我国诗歌的一个源头，但留传无多，真伪莫辨，难以稽考。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迄今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

《诗经》收录诗作305篇。它们产生的时代大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诗经》本来是一部乐歌总集。其作品一部分为贵族文人所作，另一部分则是采自民间并经乐官加工而成。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丰富多采，形式新颖灵活，手法多种多样，风格淳朴自然，语言生动优美，感情真挚充沛，不愧为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端。《诗经》的产生，为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优秀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屈原为代表作家的"楚辞"的产生，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他继承、发扬了《诗经》的优秀传统，以自己的光辉诗作，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时代。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产生于战国后期中国南方楚国地区的一种新诗体。它的出现，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竖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诗经》和"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巍然屹立的两座高峰，代表着先秦诗歌的最高成就，并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从《诗经》到"楚辞"，清楚地显示了先秦诗歌前进的足迹。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按：据班固《离骚序》，此段文字原出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王逸《楚辞章句序》）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同上）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王逸《离骚经序》）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楚之骚文，矩式周人。（刘勰《文心雕龙·通变》）

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苏轼《答谢民师书》）

是惟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隐耀深华，惊采绝艳。故圣经贤传，六艺于此分途；文苑词林，万世咸归范围矣。（阮元《四六丛话后序》）

《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屈原《离骚》，引辞表旨，譬物连类，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与风雅为节，其原出于《诗经》；及宋玉、景差为之，涂泽以摛辞，繁类以成体，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亦葩经之嗣响也。（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二一条）

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四条）

在屈原以前，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诗歌，如"大雅"、"小雅"、"商颂"、"鲁颂"等，以及春秋以来的青铜器上的一些有韵的铭文，不分南国和北国，都一致地采用着四言诗的格调，和民间口语是脱离了的。到了屈原，虽然在《天问》、《招魂》、《橘颂》的几篇中，基本上还保留着四言格调，而在其它的篇章中便把这种格调彻底打破了。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屈原在古代中国的诗歌中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的。（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4．散文的勃兴

散文的产生始于文字记事。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以及稍后的钟鼎彝器铭文，便有当时巫、史的记事文字。它们当然应视为散文的萌芽，尽管大多不过是片断、零散的文辞，不成篇章，但毕竟已具文章的雏形。中国古代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是《尚书》，其内容主要是政府的文告，主上的誓言，君王的命令，贵族的诫词。《尚书》的语言古奥艰涩、难读难懂，体现了早期散文的风貌。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社会正发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演变。这时候，出现了私家讲学与处士横议的崭新局面，推动了散文的划时代的发展。代表孔子之文的《春秋》和《论语》，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作品。

到了战国时代，社会各方面经历了空前未有的大变革，涌现出一大批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他们活跃于当时的历史舞台，作为不同阶级的代表，各陈主张，竞造舆论；争鸣之风，

盛行于天下。散文作为记事、论战的有力武器，于是勃然而兴。散文的勃兴正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各国政治、外交、军事活动的需要，因而发展迅速，变化空前，呈现出质的飞跃。特别是产生了洋洋大观的史家之文和雄放奇骏的诸子之文，涌现出了一大批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堪称盛况空前，异彩纷呈。从片断的文辞到语录体、对话体，再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先秦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而散文勃然而兴、飞跃发展的战国时期，则无疑是散文的一个黄金时代。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按：指大禹、周公、孔子）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杨雄《法言·问神》）

《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余荣矣。（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覈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皆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同上）

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

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刘知几《史通·六家》）

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刘知几《史通·叙事》）

观夫文籍肇创，史有《尚书》，知远疏通，网罗历代。……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刘知几《史通·人物》）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刘知几《史通·言语》）

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经立传，又撰诸异同，号曰《外传国语》，二十一篇。……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衺(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同上）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同上）

周末诸子奋兴，百家并骛，老、庄传清净之旨，孟、荀析善恶之端，

商、韩刑名，吕、刘杂体、若斯之类，派别子家，所谓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至于纵横极于战国，春秋纪于楚、汉，马、班创体，陈、范希踪，是为史家，重于序事，所谓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实有不同。（阮元《四六丛话后序》）

（二）主要特征

先秦文学具有许多不同于后世文学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紧贴现实人生，体现理性精神；多非一人所著，作者难以确指；文、史、哲不"分家"，文学尚未独立；诗歌、散文为主，包孕后世文体。

1．紧贴现实人生，体现理性精神

先秦文学的一大特征是紧贴现实人生，体现了先秦时代的理性精神。文学的起源本来就与人类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它的不断发展、渐趋成熟也自然与现实人生密不可分。先秦文学作品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之中，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摆脱了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的束缚，把实践理性引导和贯入日常现实生活之中。这种理性精神作为总的思想倾向贯穿了先秦文学作品。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也无论是史家之文、诸子之说还是策士之辞，都以种种艺术的形式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其主要表现为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主观情感的昂扬和作品政治色彩的浓郁。

最初，"诗"与"文"都以实用为主，直接用于祭祀、庆典、宾宴、记事，无非是一些宗教性、历史性和政治性的文献。《尚书》之文、《诗经》之《颂》及二《雅》中的一些作品，即为其例。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和理性主义的高涨，文学也由巫史文化的附庸逐渐向抒情性的作品过渡，力图挣脱宗教、神权的桎梏，取得自

身独立的地位。这种变化，在《诗经》的《国风》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作品日渐注重情感的抒发，呈现出情感、想象和理解的综合统一，并将其纳入社会人生之中，终于形成了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华民族历来向往社会和乐，天下太平，故对政治特别关心。先秦作家们为了保持太平和促进太平之到来，或力陈政见，或畅抒心志，或奔走游说，或设教著书，对政治极为关切。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便呈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政治色彩，引人注目。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尚书·盘庚上》）

於穆清庙，肃雝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按：朱熹《诗集传》卷十九注：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乐歌）。（《诗·周颂·清庙》）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按：朱熹《诗集传》卷九注：此燕飨宾客之诗也）。（《诗·小雅·鹿鸣》首章）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诗·召南·草虫》第三章）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诗·邶风·北门》首章）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风·黍离》首章）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小雅·采薇》第六章）

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管子·山权数》）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论》）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

诗者，志之所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王逸《楚辞章句序》）

"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下》）

2. 多非一人所著，作者难以确指

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都不是出于一人一手、一时一地，故其作者往往难以确指。这是与后世不同的。一部《诗经》，305篇作品，除少数几篇可知作者姓名外，其余绝大多数均不可知。因其主要来源是公卿列士所献之诗和采自民间的民歌，并且又都经过了乐官的修订、整理，故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自然难以确指作者为谁，因而司马迁也只能笼统而言其大抵为"贤圣"所作。在产生于战国末期的"楚辞"作品中，可以肯定为诗人屈原所作者，除《离骚》而外，尚有《九歌》11篇和《天问》一篇。至于《招魂》等篇作者为谁，历来就有争议；而《九章》九篇是否均属屈原之作，至今

亦难肯定。即使是可以肯定为屈原所作的《九歌》，一般也认为，那是诗人据民间祀神的祭歌改写而成，并非全属个人的创作。

至于先秦散文作品，关于其作者的争论，历来是一个热点，而又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家之文中，《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均非一人之作；而诸子之文则大都属于某一学派，而非属于某一个人。有的著作虽有名号，却只能说明该著作属某家学说，而不能认定其必出某人之手。私家著作开始较晚，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末或战国初。而且此所谓"私家著作"，并非如后代似的纯出一人之手。它们往往在某一学派之中，由师徒之间代代相传，这就难免有所增益删汰。以致师辈之论，徒众之说，杂然混陈，难分难辨。因此，其作者到底为谁，便是难以确指的了。又因秦火之劫，现存先秦作品多为汉人所编订，故传抄之讹误，真伪之杂糅亦在所难免，这也是作者难以断然确指的一个历史因素。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史记·项羽本纪》)

《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汉书·楚元王传》)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汉书·儒林传》)

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

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

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同上自注）

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家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一《互著》）

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篇》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同上自注）

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3. 文史哲不“分家”，文学尚未独立

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在先秦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或者可以说，文学在那个时期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甲骨卜辞、钟鼎铭文、《易经》中的卦、爻辞和《尚书》中的殷、商文献固然含有若干文学的因素，《诗经》中的《大雅》和三《颂》也都含有颇具审美意义的片断文句，但它们的文学性还都薄弱。“楚辞”中的《天问》虽也不乏文学意义，但其哲学意义及史学价值则似乎更大。不妨说，在先秦文学的两座诗歌高峰——《诗经》和“楚辞”中，“文学”

与“非文学”是纠缠一体、兼容并存的。

至于先秦散文作品，则更其如此。它们的内容既博且杂。一书之中，往往涉及多种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以至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等等浑然一体；即便一篇之中，也往往多种学科内容杂然并陈。在先秦作品中，文、史、哲等尚未“分家”，颇为不“纯”。这既是它的一大特征，当然也是早期作品不够成熟、尚欠“专门”的标志。

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萧统《文选序》）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

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夫象欤、兴欤、例欤、官欤，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其辞可谓文矣，其理，则不过曰通于类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

《书》本史也，而载赓飏之词，其流为诗。《三百篇》，诗之古者也，风土人情，政事所详，犹地志然，故《诗》亦史也。《诗》、《书》之教，著于四术，姬周学人，靡不沾濡。凡为文者，必于史取则。……夫《诗》、《书》史也，故皆为文，有韵无韵，体犹未分。周、秦诸子，其兴也勃，

时作韵语，亦袭其旧耳。屈、宋相继，衍为辞赋，始独占文坛。（姚华《论文后编·源流》）

4. 诗歌、散文为主，包孕后世文体

先秦时期虽然还说不上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候就没有"纯"的文学作品。除《诗经》与"楚辞"中的大部分堪称文学佳作外，先秦散文中也有不少极富文学色彩的篇章。诗歌和散文，是先秦时期文学的主要样式，并且是渐趋成熟、极有成就的两类文体。

与后世文学相较，先秦文学确实说不上文体繁富、样式众多，然而它却孕育了后世的众多文体。各类散文的发展，起步于先秦；五、七言诗的诞生，导源于《国风》；特别是赋体的产生和骈文的滥觞，在先秦已露端倪；而小说、戏剧的萌芽，亦见于先秦诗、文。所以说，先秦诗、文无愧为后世众多文体之祖。

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挚虞《文章流别论》，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六）

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两〕体之篇，成于两〔西〕汉。（刘勰《文心雕龙·章句》）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钟嵘《诗品》卷上）

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钟嵘《诗品·总论》）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

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诗》三百十一篇，其经纬各三（原注：风、雅、颂为经，赋、比、兴为纬）；《书》体六，今存者三（原注：此蔡氏、真氏据《周官》太祝六辞而言。六辞：祠、命、诰、会、祷、诔也。祠当作辞。存者三：诰、誓、命也。誓，即会也。商有训，周无之，然《无逸》等篇，实训体也）。厥后颜氏推论，凡文各本"五经"，良有见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原注：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骚》。（刘熙载《艺概·诗概》）

我们可以推定七言是引承楚歌的系统。（〔日本〕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第二章）

（1）赋体的产生

赋体之盛，极于汉代；但赋体之兴，于先秦已见端倪。《诗三百》为赋体之本，诸子之文及策士之辞亦为赋体之源。至于荀况及屈原，更被后人视为赋体之"祖"。事实上，赋作为文体之称，即始见于战国末年荀况所作的《赋篇》。因此可以说，赋体实兴于先秦。

春秋以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

《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

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煖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

（赋体）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继别为宗，宋玉是也。追其统系，《三百篇》其百世不迁之宗矣。（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篇》）

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词》，为词赋家之鼻祖。……秦、汉之世，赋体渐兴（原注:《荀子》已有《蚕赋》），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四条）

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八条）

（2）骈文的滥觞

骈文为中国文学之特产。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其形为方块，又单音只义，故易于属对。汉字所独具的这些特征，为骈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骈文至六朝而盛极一时，但其滥觞，则在先秦。先秦之文，本无所谓骈、散之分，但文中不乏骈字俪句。《尚书》之文，已有偶句出现；而

《易传》之《文言》、《系辞》，骈行之佳句尤多。因而有人认为，《易传·文言》乃"千古文章之祖"。至于史文、诸子及纵横说辞中，亦多含骈文因素。然而它们都是"率然对尔"，并非刻意经营之。值得一提的是李斯作于战国之末(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此文排比铺陈，对偶工丽，明显地趋向骈偶化，可算是一篇基本成熟的骈文。清人李兆洛径自置之入《骈体文钞》中，不是没有道理的。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同上)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尚书·禹贡》)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同上)

用罪罚厥死，用德彰厥善。(《尚书·盘庚上》)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易传·乾文言》)

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同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传·系辞上》)

(李)斯乃上书曰(张守节《正义》：在始皇十年(前237))：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

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谏逐客书》，见《史记·李斯列传》）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刘勰《文心雕龙·丽辞》）

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阮元《文言说》）

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骈俪为言，独在中夏。而希腊文辞，务在对称。……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经，据句皆双，俪辞是昉，寻其文义，独多对待。……虽然，俪体为用，固由意有殊条，辞须翕辟，孑句无施，势不可已。（章炳麟《文学说例》）

（3）小说、戏剧的萌芽

中国小说、戏剧的成熟和发达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过程，但其萌芽时期则在先秦。先秦神话传说固为后世小说本根，而史家及诸子记人叙事之作亦含小说因素。至于晋咸宁五年(279)出于魏襄王冢的竹书《穆天子传》及散见于先秦散文中的某些寓言故事，则显然已具小说之雏形。戏剧的萌芽早已存在于古代反映祭祀及农牧生产活动等内容的歌舞之中，《楚辞·九歌》中也明显地保留着戏剧的成分。而在诸子之文及策士之辞中，那些设辞应对、拟人问难的章段也分明含有若干戏剧的因素。它们虽然并不多见，但却是值得重视的。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传》卷三)

(咸宁五年)冬十月戊寅，……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晋书·武帝纪》)

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晋书·束皙传》)

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

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予按《诗》三百篇，如《六月》、《采芑》、《大明》、《笃公刘》、《江汉》诸作，皆为叙事之诗。而汉人乐府之诗，如《孔雀东南飞》数篇，咸杂叙闾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乐府者，又乐教之支派也。是为《春秋》家与乐教合一之始。此即金、元曲剧之滥觞也。……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十八条）

小说成了一体，我想是从唐代起吧。若寻其源，则或须远溯于周代的传说、寓言与俗说之类。（〔日本〕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第二章）

可以叫做戏曲的那样的东西，始于唐代的参军戏。然若溯歌舞的性质，则须寻源于很远的周代的舞曲吧。（同上）

盖赋中早有问答体，原于《楚辞》之《卜居》、《渔父》；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乃入《子虚》、《上林》及《两都》等赋。大抵首尾是文，中间是赋，实开后来讲唱与戏剧中曲白相生之机局，亦散文与韵文之间一种自然之配合也。……其首尾之文，初以议论为便；迨转入伎艺，乃以叙述情节为便，而话本剧本之雏形备矣。（任半塘《唐戏弄》下册第五章《伎艺》）

二　辉煌成就和深远影响

先秦文学经历了产生、发展而渐趋成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它以生气勃勃的创新精神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足以辉耀千古的伟大成就，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为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愧为光辉的起点；由它所开创的优良传统，沾溉千秋万代。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位伟大作家屈原，彪炳文学史册；产生了以《诗经》、《楚辞》和先秦史家、诸子之文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著作，堪为后世典范。在中国文学史上，先秦文学不愧为光辉灿烂的第一篇。它不仅是中华民族足以自豪的珍贵遗产，而且是全世界人民为之骄傲的文化瑰宝。

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论》）

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古风》其一）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韩愈《进学解》）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都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

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论辨类者，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刘熙载《艺概·文概》）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刘熙载《艺概·诗概》）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同上）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同上）

东周以降，文体日工：屈、宋之作，上如二《南》；苏、张之词，下开《七发》；韩非著书，隐肇连珠之体；荀卿《成相》，实为对偶之文：莫不振藻简册，耀采词林。（刘师培《文说·耀采篇》）

故知《楚词》之书，其用尤广：上承风诗之体，下开词赋之先，若中垒《世颂》之篇，贾生《惜誓》之作，渊源有自，咸出于《骚》。……惟《洛神》之赋，出于《九歌》；《北征》之赋，近于《涉江》；《哀江南赋》，乃《哀郢》之余音；《归去来辞》，亦《卜居》之嗣响。（刘师培《文说·宗骚篇》）

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界，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三条）

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刘师培《论文杂记》第七条）

第二章 神　话

神话是富于想象力的古代人民以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口头创作的神异故事。

我国古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但因年代久远，散失甚多，未能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零星的片断，大都出于后世的传说和记载，已不完全是古代神话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总算基本上保留了古代神话的原始形态，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第一节 神话的产生及其价值

一 神话的产生

神话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远古蒙昧时期。在那个时期，人类的意识开始发展，但思维能力极为简单。面对林林总总的天地万物和变化多端的自然现象，他们感到神奇莫测，不能理解。诸如天地开辟、人类起源、日月运行、风云雷电等等问题和现象，都使他们迷惑惊异，自然界的无穷威力甚至使他们恐惧不已；于是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出现了冥冥之中有着伟大的主宰的模糊观念。他们凭借自身狭隘的生活体验，通过想象和幻想，创造出人格化的神的形象，并且按照他们幼稚的思考，造作出神们的故事，以解释自然现象，征服和支配自然力。这些故事在古代人民的口头广泛流传，后世称之为神话。

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韦昭注：山川

之守主，为山川设者也。足以纪纲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国语·鲁语下》)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

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许慎《说文解字》)

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在宗教领域里发生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对人格化的神灵和伟大的主宰的模糊观念；……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0页。)

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一般讲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与自然的斗争的反映，以及社会生活在广泛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高尔基《论文学·苏联的文学》)

我不怀疑你们都知道古代的故事、神话、传说，但是我很希望大家更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基本意思。这个意思归结起来是：古代劳动者们渴望减轻自己的劳动，提高劳动效率，防御四脚和两脚的敌人，以及用语言的力量，即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　人的自然现象。(同上)

完全可以认定，古代"著名的"人物乃是制造神的原料，……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神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是持有某种劳动工具的十分现实的人物。神是某种手艺的能手，是人们的师傅和同行。神是劳动成绩的艺术概括，劳动群众的"宗教的"思想也应该加上引号，因为这是一种纯粹艺术的创作。神话的创造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同时好像预先感到它们强大的发展，因而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同上)

从事抽象思维的是以后的人，是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里所说的那种离群索居的人，他说："社会以外的人不是神，便是野兽。"既然是野兽，他有时候就使人不得不认为他是神，但是作为野兽，他竟成了创造许多有关兽形人的神话的材料，正如古代第一批学会了骑马的人成了半人半马的神话的基础。（同上）

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鲁迅《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

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9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同上）

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确信以为是真的。（茅盾《中国神话研究》）

二　神话的价值

神话是远古时代开放的艺术奇葩。它不仅以特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反映了远古人民的心灵世界。它为我们探索远古时代的历史奥秘透露

了许多可贵的信息，也为我们了解远古人民的意识、情感、精神、性格提供了不少形象的资料，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不仅如此，古代神话还以自身的瑰丽壮伟组成了蔚为奇观的艺术殿堂，给后世人们以美妙的艺术享受，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同时，古代神话还是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源头。它本身就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营养，无愧为文学艺术的肥沃土壤。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1972年5月版人民出版社）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按：指神话）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

在这些故事和神话中我们听到了驯养动物、发现药草、发明劳动工具等等工作的隐约的声音。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着能够在空中飞行，——关于法伊东、狄达尔和他的儿子伊卡尔的传说以及关于"飞毯"的故事，都告诉了我们这点。他们梦想着加快在地上运动的速度，——于是有关于"快靴"的故事；他们学会了骑马。……还可以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证明古代的故事和神话的合理性，可以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证明原始人的形象化的、假想的、然而已经工艺化的思想是有远见的，这种思想竟不亚于我们现代的假想。（高尔基《论文学·苏联的文学》）

他们甚至企图用"咒语"去影响神。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古代所有的神都住在地上，和人相似，他们的举动和人一样：宽待驯顺者，仇视忤逆者，而且也和人一样好妒忌，好报复，好虚荣。宗教的思想并非产生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是在社会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神像人这个事实就是证明这种见解的证据之一。（同上）

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往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群众中间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他们认为神是同他们敌对的最高统治者。（同上）

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鲁迅《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

神话大抵以——“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但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同上）

第二节　中国古代主要神话

神话的产生固然很早，但用文字记录下来则较晚。我国古代缺乏系统地记载神话的专门典籍，但在《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列子》等古籍中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神话传说。虽大多属于片断的记录，不够系统、完整，但内容非常丰富，堪称瑰丽多姿。按其内容划分，现存中国古代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自然神话、英雄神话和传奇神话四类。

一　创世神话

对于世界产生和人类起源的探索与解释，构成了创世神话的基本主题。天地是如何开辟的？万物是怎样生成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总之，世界是怎样产生的？这个最原始、最基本也最重大的问题，是人类意识发展处于开始阶段的原始人类首先要思考的，难怪它要成为所有神话中最普遍的主题了。创世神话的创作者们

尽管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但他们那充满幻想的描述却极富魅力。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创世神话虽然形成文字较晚，但仍然特色鲜明，动人心魄。无论是天地浑沌、盘古首生、宇宙开辟的神话，还是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都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宇宙的开端以及人类的诞生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探索和解释。它们看似荒谬而无道理，却充分反映了我们的祖先认真探索、大胆想象的创造精神。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屈原《天问》）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同上）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列子·汤问篇》）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淮南子·精神训》）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说林训》）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许慎《说文解字》）

女娲，阴帝，佐虙戏治者也。（《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历年记》）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李冗《独异志》卷下）

女娲本是伏羲妇（一作"女娲伏羲妹"），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卢仝《与马异结交诗》）

第一段画二人，右为伏羲，……下身鳞尾环绕，向左；左为女娲……尾亦环绕与右相交。中间一小儿，右向，手曳二人之袖，两脚卷走。（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

伏羲一名，古无定书，或作伏戏、庖牺、宓羲、虙羲，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槃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槃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无问汉苗，俱自承为盘古之后，两者神话，盖同出于一源也。（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

二　自然神话

大自然森罗万象，千变万化，威力无穷，神秘莫测，使得原始人类由迷惑而生畏惧，由畏惧而生崇拜。在他们看来，大自然如此生机勃勃，富于活力，俨然是有人格、有意志的实体；而风云雷雨、山川鸟兽，则无不被他们认作神灵。在这种"万物有灵"观念的启示下，他们通过想象、幻想和联想，以有形的事物去表现无形的自然力，进而创造出自然神的形象和以这些形象为主体的故事，这便是自然神话。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自然神话颇为出

色。如主宰昼夜明晦、冬夏寒暑的“钟山之神”“烛阴”，“十日所浴”的神树“扶桑”，与日逐走的神兽“夸父”，衔木石而填东海的神鸟“精卫”等等，都是自然神话中的著名主角。自然神话多以鸟兽树木之类自然物为主体，它们反映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迷惑与解释，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美好愿望。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山海经·海外北经》）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山海经·海内东经》）

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山海经·大荒北经》）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外东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大荒东经》）

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同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姬天门，日月所入。有神。

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山海经·大荒西经》）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袁珂注：虎或是尾字之误）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云：或作夸父）。（《山海经·西山经》）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神兽也。饮河、渭不足，将饮西海，未至，道渴死，见《山海经》。（《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列子·汤问篇》）

飞廉，风伯也。（《楚辞补注·离骚》王逸注）

《吕氏春秋》曰：风师曰飞廉。应劭曰：飞廉，神兽，能致风气。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楚辞补注·离骚》洪兴祖补注）

按丰隆或曰云师，或曰雷师。屏翳或曰云师，或曰雨师，或曰风师。……据《楚词》，则以丰隆为云师，飞廉为风伯，屏翳为雨师耳。（同上）

三　英雄神话

英雄神话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标志着神话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创世神话和自然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认识和借助想象对自然力的征服与支配，英雄神话则反映了原始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与反思，它意味着人类自身成了意识的对象、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人。英雄神话中的主体，大多是半人半神或受到神力支持的"英雄"，关于他们在征服自然或在社会斗争中创造英雄业绩的故事，便构成了英雄神话的主题。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英雄神话是数量较多且极富魅力的一部分。如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的神话，颂扬了与自然作斗争的英雄；黄帝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则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描述了氏族社会部落之战的英雄；还有刑天与帝争神的神

话，赞美了敢于斗争、不怕失败的英雄。他们组成了一系列神奇灵异的英雄群像，在我国古代神话的宝库中熠熠闪光。

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国语·鲁语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山海经·海内经》)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齿持盾，一曰持戈。(《山海经·海外南经》)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无己誉。……一雀适羿，羿必得之。(《庄子·庚桑楚》)

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荀子·成相》)

羿焉弹日？乌焉解羽(王逸注：《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屈原《天问》)

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同上)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王逸注：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同上)

羿执决持扞，操弓关机，越人争为持的。(《韩非子·说林下》)

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揞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甚交阯、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

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其(奇)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

羿左臂脩而善射。（《淮南子·脩务训》）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淮南子·本经训》）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淮南子·地形训》）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淮南子·本经训》）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下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龙鱼河图》）

黄帝有熊氏，……治五气，设五量。及神农氏衰，黄帝修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黄帝于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版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

四 传奇神话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还有不少关于异域奇国怪人神物的传奇。它们大都记载于《山海经》中，出自所谓山、海、大荒之四裔。诸如"跪据树欧丝"的奇女子，"其民皆生毛羽"的"羽民国"，

"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的"讙头"，"一臂三目"、"能为飞车"的"奇肱民"，"其为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的"厌火国"，"捕鱼水中"的"长臂国"，"一身三首"的"三首国"，"食稻啖蛇"的"黑齿国"……如此神妙奇异、趣味横生的画面，令人啧啧称奇，赞叹不已！它们反映了原始人类企图突破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以改造自身生活环境的愿望和理想，表现出惊人的超现实、超自然的想象力，其中显然也含有描述远古时代华夏四裔氏族社会野蛮生活状态的痕迹。传奇神话数量较多，涉及面广，形象奇特，别有意趣。它们是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丝之野在反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山海经·海外北经》）

羽民国，……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山海经·海外南经》）

讙头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同上)

厌火国，……其为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同上)

三首国，……其为人一身三首。(同上)

长臂国，……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一曰在焦侥东，捕鱼海中。(同上)

有羽民之国，其民皆生毛羽。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同上)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黄蛇，名曰蜮人。(同上)

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同上)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有驩头之国。(同上)

黑齿国，……为人黑齿，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山海经·海外东经》）

奇肱之国，……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山海经·海外西经》）

奇肱民善为机巧，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至，吹其车至豫州。汤破其车，不以视(示)民。十年东风至，乃复作车遣返，而其国去玉门关四万里。(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第三节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与演变

一 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

中国古代神话是全人类神话中出色的一支，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奇珍。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原因，中国古代神话或散亡失传而致零星散乱，或被窜改变质而致面目失真，故现存中国古代神话既无宏篇巨制，也未形成完整而系统的体系，只是一些零碎散断、各自独立的篇章或片断。然而"古之巫书"《山海经》较为集中地记载了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保存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特多，还应该说是一部自成系统的著作。此书对于古代神话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现存中国古代神话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限，但它们特色鲜明，异彩斑斓。无论是对世界产生、人类起源的真的探索，对勤劳、勇敢、正义、善良的善的礼赞，还是对崇高、粗犷、神奇、悲壮的美的讴歌，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祖先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它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型，也是中华文化的艺术瑰宝。

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夷，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

信。……《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刘秀《山海经序》)

《山海经》，十八卷。是书或称夏禹撰，或称伯益撰，其中乃有帝启、周文王及秦、汉地名，则妄不待辨。然司马迁已称之，则亦周、秦以来古书也。其注为晋郭璞作。《隋志》以来，皆列地理之首。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四)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同上)

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我们要寻求，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不过这书也是无系统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所有者，只是些断片的，没有长篇的，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是本来的少有。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种：

一、太劳苦。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

二、易于忘却。因为中国古时天神，地祇，人，鬼，往往殽杂，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日出不穷，于是旧者僵死，后人无从而知。……(同上)

二 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和全人类神话一样，中国古代神话也经历了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从神话的发展历史看来，它大致经历了从灵性神话到神性神话再到人性神话的不同阶段。但由于中国古代神话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不断改造、加工，以致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故以现存者而论，上述发展阶段便有些纠缠不清，难以明确地分辨、界定。特别是以人格化的动、植物神为标志的灵性神话，其原始面貌多已失去；而以兽形神或半人半兽形神为标志的神性神话，和以人形神为标志的人性神话，也往往混杂在一起。不过，倘细加分辨，却也大致可见其分属于不同的发展时期。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则较为显而易见。由于神话是原始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含有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科学、文艺等等信息，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故其演变往往趋向于某一方面。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神话最显著的演变结果便是它的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

（一）神话的历史化

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最突出表现。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有意识地对神话妄加窜改的结果；也不仅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学发达较早的缘故；更主要的，恐怕还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贬斥神话，并且着意加以改造有着密切关系。儒家奉行经世致用的原则，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实用经验，因而鄙薄神话为荒唐怪诞的谬悠之说，并且煞费苦心地改造神话。他们把神来加以人化，并对一些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作了一番看似合理的理性的诠释，使之化为历史，载入简册。如对黄帝神话和“夔一足”神话的历史化改造，便是最为典型的实例。随着神话的

历史化，神话的精神也就消亡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卷七《五帝德》）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山海经·大荒东经》）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

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之的话，都是和凡人不同的。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二）神话的文学化

神话演变为寓言，是其文学化的主要表现。神话本身即寓含有一定的哲理，后世的某些思想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或伦理道德观念，从神话的武库中选取自己需要的部分，

自觉地进行艺术加工，将其改造为寄托作者思想的寓言，在形象的故事中包寓某种思想或哲理，这便是神话的文学化。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学化主要反映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特别是庄子，堪称将神话改造为寓言的高手。在《庄子》一书中，“浑沌”的神话被改造为“儵、忽与浑沌”的寓言，“姑媱之山”的神话被修饰为“藐姑射神人”的寓言，“河神与海神的神话被加工为“望洋兴叹”的寓言……或用以宣扬道家“顺物自然”及“逍遥无为”的思想，或用以说明囿于一端则不识大道的哲理。如此等等，都莫不是神话文学化的结果。

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山海经·西山经》）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山海经·大荒东经》）

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虹虹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背青黄。（《山海经·海外东经》）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䔄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山海经·中山经》）

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山海经·海内东经》）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

子·逍遥游》)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唐人殷敬顺《释文》云：此章与《山海经》略同)。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心如渊泉，形如处女，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愿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而已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疠，鬼无灵响焉。(《列子·黄帝篇》)

（三）神话的宗教化

神话与原始宗教有如孪生兄弟，二者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原始先民信仰与崇拜的对象，而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支配自然力，亦与原始宗教借助巫术以图控制自然同出一源。神话中含有宗教的因素，故易为宗教所利用。神话流为仙话，便是神话宗教化的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西王母神话和月亮神话之逐渐演变为仙话，便是颇为典型的例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主角由女神化为仙女，形象由粗野变为美丽，情节由荒谬走向“合理”。总之是经过了有意识的修改、润饰，掺进了方术之士的仙道观念。神话演变的宗教化抽去了原始神话的本质核心，无疑是神话趋于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嬴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西山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山海经·海内西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大荒西经》)

西王母之山，还归丌口世民作忧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称，顾世民之恩，流涕芔陨，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穆天子传》)

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唐成玄英疏云：少广，西极山名也。王母，太阴之精也，豹尾，虎齿，善笑。舜时，王母遣使献玉环；汉武帝时，献青桃。颜容若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坐西方少广之山，不复生死，故莫知始终也。又，唐陆德明《释文》云："西王母"，《山海经》云：状如人，狗尾，蓬头，戴胜，善啸，居海水之涯。《汉武内传》云：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庄子·大宗师》）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七种（按：据范宁校，"七种"当为"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按：据范宁校，"使"当作"侠"，通"夹"）侍母旁。（张华《博物志》卷八《史补》）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山海经·大荒西经》）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淮南子·览冥训》）

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焉。阴之类，其数偶，其后有冯焉者。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张衡《灵宪》，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李冗《独异志》卷上）

第三章 《诗　　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的辉煌的开端。我国的诗歌传统最为丰富、悠久，作为这一传统的光辉起点和不尽源头的《诗经》，以其伟大的文学成就辉耀史册。

第一节 《诗经》概说

一 《诗经》的名称与篇数

(一)名　称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战国时，《诗》被列为儒家所谓"六经"之一，但并未获得后世那样受尊崇的地位。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诗》于是被官方尊奉为垂教万世的经典之一，从此便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圈，称为《诗经》。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庄子·天运》）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

五年春，……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

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同上)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

(二)篇　数

《诗经》存目311篇，实际存诗则为305篇，另有六篇所谓“笙诗”，有目而无辞，故不计。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

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诗》三百一十一篇，亡其辞者六篇，考之《仪礼》，皆笙诗也。汉世《毛诗》不行，故云三百五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

毛氏引子夏《诗序》各冠其篇，序三百十一，《诗》三百五，故知亡六篇。三家《诗》无子夏《序》。(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

(三)关于“笙诗”

《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南陔》、《白华》、《华黍》，和“南有嘉鱼之什”中的《由庚》、《崇丘》、《由仪》等六篇，都是以笙为乐器吹奏的乐曲，故称“笙诗”。关于“笙诗”，历来有“有义亡辞”与“有声无辞”二说，多以后说为信。

《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絜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毛诗正义》卷九《南陔》、《白华》、《华黍》序)

《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义而亡其辞。(《毛诗正义》卷九《由

庚》、《崇丘》，《由仪》序）

毛氏不晓笙歌而一概观之。……大率歌者，有辞有调者也；笙者，管者，有腔无辞者也。后世间亦有如此清乐，至唐犹有六十三曲。（王质《诗总闻》卷十）

“有其义”者，以题推之也；“亡其辞”者，莫知其中谓何也。……前三诗所谓“有其义”者也，……后三诗所谓“亡其辞”者也，皆汉儒之学也。（同上）

《乡饮酒礼》：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燕礼》亦鼓瑟歌《鹿鸣》、《四牡》、《皇华》，然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朱熹《诗集传》卷九《华黍》题解）

按《仪礼·乡饮酒》及《燕礼》，前乐既毕，皆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间，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则此六者，盖一时之诗，而皆为燕飨宾客上下通用之乐。（朱熹《诗集传》卷九《鱼丽》题解）

二　《诗经》的编订与分类

（一）《诗经》的编订

《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其305篇作品均为配乐演唱的乐歌。其中一部分为贵族文人所作，但作者绝大部分已不可考；另一部分则是由民间采集而来并经乐官加工整理的民歌，多属民间集体创作，作者亦不可考。古有孔子“删诗”之说，但不可信。《诗经》的删汰和编订，一般认为乃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但孔子也确曾作过一番整理的工作。《诗经》的结集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

1. 《诗经》实为乐歌总集

《诗》305篇皆入乐可歌，古籍早有明确记载。至宋以后，始有所谓《诗》不入乐之说，但学者们多不从。实际上，《诗》305篇当初皆可“弦歌之”，后古乐失传，乃有可歌与不可歌者。一部《诗经》，实为乐歌之总集。

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国语·鲁语下》)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

师乙曰：“……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主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

之徒们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郑樵《通志·乐略》）

《风》因诗而为乐，《雅》、《颂》因乐而为诗，诗之先后于乐不同，其为歌辞一也。（吴澄《吴文正集》卷一《四经叙录》）

三百十一篇，皆古乐章也。……宋程大昌谓：《诗》有《南》、《雅》、《颂》而无《国风》，自《邶》至《豳》十三国诗，皆不入乐。岂非妄说乎？（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总诂·举要》）

凡《诗》皆乐也。……盖以诗为本，以声为用。……故谓"《诗》有不入乐"者（原注：顾亭林），非也。（顾镇《虞东学诗》卷首《诗说·诗乐说》）

《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程大昌谓：《南》、《雅》、《颂》为乐诗，自《邶》至《豳》，皆不入乐，为徒诗。其说非也。……古乐失传，故《诗》有可歌，有不可歌。……所谓"可歌"者，谓其声律犹存；"不可歌）者，仅存其词，而声律已不传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一《诗入乐说》

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宋人与顾氏之说，窃未敢谓然也。（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2. 所谓"采诗"、"献诗"与"删诗"

关于《诗经》的编订及其作者问题，过去有所谓"采诗"、"献诗"以及孔子"删诗"之说，载于古籍，流布广远。但史无明据，古无定制，其说或真或假，实难尽信。然而了解这些说法，毕竟有助于弄清《诗经》的编订及其作者问题。

（1）"采诗"之说

据古代典籍记载，古有所谓"采诗之官"，专于民间采诗，献诸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

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按：即"求"）代语、童谣、歌戏。（刘歆《与扬雄书》）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

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孔丛子·巡狩篇》）

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许慎《说文解字》“辺”字解）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王十五年”何休注语）

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狩述职；巡狩则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师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顾镇《虞东学诗》卷首《诗说·迹熄诗亡说》）

“遒人”即辅轩使者。《风俗通》：“周、秦以岁八月遣辅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之，永藏秘室。”是也。……胡渭曰：“诗有采有陈。……采之于每岁之孟春，陈之于五载巡守四仲之月，是《国风》所自来也。”（桂馥《说文义证》“辺”字条）

《孟子》：“王者之迹熄”，“迹”当作“辺”，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后人多闻“迹”，寡闻“辺”，故改“辺”为“迹”。（宋翔风《孟子赵注补正》卷四）

（2）“献诗”之说

所谓“献诗”，乃指统治阶级中的贵族文人，有目的的作诗以献王者，意在“补察其政”。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

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韦昭注：兜，惑也），……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国语·晋语六》）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艺执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左传·襄公十四年》)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昭公十二年》)

天子五年一巡守(狩)，……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

(3)"删诗"之说

司马迁称古诗原有3000余篇，经孔子删、取之，定为305篇，此即所谓孔子"删诗"之说。此说影响颇大。但自唐代孔颖达已疑其说，后世学者亦多不信。不过，据《论语》中有关记载看来，也许孔子是做过一番"正乐"之类的整理工作的。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

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又谓："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九：《诗论一》)

子曰："诵《诗》三百，……"子曰："《诗》三百，……"玩其词意，乃当

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故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厘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三《辨删〈诗〉之说》）

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夫曰"正乐"，必《雅》、《颂》诸乐，固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于其际也。奈何后人不察，相沿以至于今，莫不以"正乐"为"删诗"，何不即《论语》诸文而一细读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卷首下《诗旨》）

古人说孔子删《诗》，虽然不一定就是孔子，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但《诗》是经过删改的东西，这形式音韵的统一就是它的内证。此外，如《诗经》以外的逸诗，散见于诸子百家书里的，便没有这么整齐谐适，又可算是一个重要的外证了。（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

3. 关于作者

《诗经》305篇作品，除少数几篇可知作者之名外，其余绝大多数均不可知。司马迁曾笼统而言其作者大抵为"贤圣"，《毛诗序》则往往具体认定其作者分别为某王、某公、某大夫、某夫人。其实，《诗经》作品主要来源于公卿列士所献之诗，和采自民间而经乐官加工修订的民歌，故其作者大多难以确指。《诗经》乃由各代王官乐师采集积累，并加整理编订而成。流传既久，经手亦多，因而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至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乃是汉代以后传下来的定本。由于诗歌自身的特点，便于讽诵和口耳相传，故虽经秦火之劫而得幸全。在先秦古籍中，《诗经》是较为可靠的一部文献。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诗·小雅·节南山》)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诗·小雅·巷伯》)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大雅·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诗·大雅·烝民》)

奚斯所作，孔曼且硕。(《诗·鲁颂·闷宫》)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左传·闵公二年》)

《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三《鄘风·载驰序》)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见其《报任安书》)

"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熹《诗集传》卷一《国风序》)

《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了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过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15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于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面的变异性却很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

(二)《风》、《雅》、《颂》的分类

《诗经》是按《风》、《雅》、《颂》分类编排的，《风》即《国风》，包括15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收诗作

160篇。《雅》分《大雅》、《小雅》。《大雅》收诗31篇，《小雅》收诗74篇，共为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计40篇。《诗经》何以如此分类编排呢？古今学者对此聚讼不已。现在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从"《诗》皆入乐"的认识出发，认为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关于《风》、《雅》、《颂》的具体解释，更是众说纷纭。另有所谓"六义"、"四始"之说，也与《诗经》的分类编排不无关系。

1. 释《风》

关于《风》的解释，历来纷繁歧异。或从封建的政治、道德、伦理着眼，或以风土、民俗的观点阐释；或以为诗体，或释为讽诵之诗。现在大都认为，"风"即音乐曲调之意。所谓"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犹如今天的地方乐调。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郑樵《六经奥论》卷三《风雅颂辨》)

风土之音曰《风》。(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

"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国风序》)

《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皆以其篇章、节奏之异而别之也。(朱熹《楚辞集注》卷第一《离骚》序末按语)

《风》、《雅》之分，分于诗体。(崔述《读风偶识》卷一)

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章太炎《国学概论》第四章)

风即讽字，但要训讽诵之讽，不是训讽刺之讽。《周礼·大司乐》注说，

倍文曰讽，《瞽矇》疏引作背文曰风。然则背诵文词，实风之本义。（梁启超《释四诗名义》）

所谓《国风》，犹之乎说"土乐"。（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

2. 释《雅》

前人关于《雅》的解释甚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雅"即"正"，又与"夏"通。周王畿一带原为夏人旧地，故周人时亦自称夏人。王畿乃政治、文化中心，其言称正声，亦称"雅言"，意为标准音，类乎今之"普通话"。当时宫廷和贵族所用乐歌即为正声、正乐。《诗经》中的《雅》便指王畿之乐，是相对于地方"土乐"而言的"正乐"。这一名称，无疑反映了当时的尊王观念。此外，《雅》又有《小雅》、《大雅》之分。由于二《雅》在内容、风格上有明显区别，说者各执一端，对于二《雅》之分的缘由便有不同认识。现在大多认为，《小雅》、《大雅》之分，是与它们音乐之不同和产生时代之远近有关的。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宴劳嘉宾，亲睦九族，事非隆重，故为《小雅》。（《毛诗正义》卷九陆德明《音义》）

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毛诗正义》卷十六陆德明《音义》）

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风》见优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见积渐之义，故《小雅》先于《大雅》。此其所以异也。诗体既异，乐音亦殊。（《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孔颖达疏）

盖《小雅》、《大雅》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大吕、小吕，则

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别也。（郑樵《六经奥论》卷三《风雅颂辨》）

朝廷之音曰《雅》。（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

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程大昌《诗论一》）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词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朱熹《诗集传》卷九《小雅序》）

《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人之作。（朱熹《楚辞集注》卷第一《离骚》序末按语）

窃谓《雅》之小、大，特以其体之不同耳。盖优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风》之体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严粲《诗缉》卷一）

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小大论也。（惠周惕《诗说》卷上）

大、小之分，究何以别之？曰：此在气体轻重，魄力厚薄，词意浅深，音节丰杀者辨之而已。（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九）

入《大雅》者，朝廷纪功之作；载《小雅》者，草野歌颂之章。（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

俞（樾）云：《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荣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与"雅"通也。（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七《天志下》注引）

持《小雅》与《大雅》比，则《小雅》多言人事，而《大雅》多言祖宗，……要之《大雅》为岐周之诗；《小雅》为一般周人之诗，对岐周言，亦不妨谓为京周之诗。总而言之，则《诗谱》所谓"《大雅》、《小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一语，得其旨矣。（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诗大小雅说臆》）

聚族岐周，则曰大夏，东迁丰镐，乃号小夏。大夏之诗称《大夏》，小夏之诗称《小夏》，此则《大、小雅》之所由名欤？未可知也。（同上）

3. 释《颂》

《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的乐章，是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祭祀祖宗，祈祷神明，赞颂王侯功德，是其内容上的特点；其形式上的特点，则是诗、乐、舞的合一。《颂》的篇章大多简短，韵律缺乏规则，且不分章，不叠句，这都证明了它是音调缓慢、配合舞蹈的宗教性祭祀舞歌。《颂》为庙堂乐章，表现了对上帝和祖先神的崇拜，是奴隶社会神权至上的反映。在当时，《颂》无疑是最受尊崇的诗体；但我们今天从文学的角度着眼，则《颂》的价值远不如《风》、《雅》。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毛诗正义》卷十九郑玄《周颂谱》)

宗庙之音曰《颂》。(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

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郑樵《通志·乐略》)

《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朱熹《楚辞集注》卷第一《离骚》序末按语)

朝廷之乐歌曰《雅》，宗庙之乐歌曰《颂》，于燕飨焉用之，于朝会焉用之，于享祀焉用之，因是乐之施于是事而作为辞也。(吴澄《吴文正集》卷一《四经叙录》)

凡《周颂》之诗，多若韵若不韵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节，而今不可考矣。(顾炎武《诗本音》卷十)

“颂”之训为美盛德者，余义也；“颂”之训为形容者，本义也。且“颂”字即“容”字也。……容、养、羕，一声之转，古籍每多通借。今世俗传之“樣”字，始于《唐韵》，即“容”字转声所借之“羕”字。……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樣子”、“周之樣子”、“鲁之樣

子"而已，无深义也。何以三《颂》有様，而《风》、《雅》无様也?《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阮元《揅经室集》卷一《释颂》)

《周颂》三十一篇，惟《维清》为象舞之诗。《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为武舞之诗。其余二十四篇为舞诗与否，均无确证。(王国维《海宁王忠慤公遗书》卷二《说周颂》)

窃谓《风》、《雅》、《颂》之别当于声求之，《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同上)

4. 所谓"六义"、"四始"

(1)"六义"

所谓"六义"，又称"六诗"，即指"风"、"赋"、"比"、"兴"、"雅"、"颂"。古今学者对此解释颇多歧义。唐代孔颖达认为："'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这就是说，"风"、"雅"、"颂"是《诗》的体制，而"赋"、"比"、"兴"则是《诗》的表现手法。这一见解，大体上为人们所接受。

大(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周礼·春官·大师》)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疏)

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贾公彦《周礼·春官·大师》疏)

"风"、"雅"、"颂"，《诗》之体也；"赋"、"兴"、"比"，《诗》之言也。（郑樵《六经奥论》卷三《风雅颂辨》）

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一《汪扶晨诗序》）

风雅颂以性质言：……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是为《诗》之三纬。（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

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朱自清《诗言志辨》）

（2）"四始"

旧又有所谓"四始"之说，说亦有异。这与《诗经》的编排顺序显然大有关系。

是（按：指《风》、《小雅》、《大雅》、《颂》）谓"四始"，《诗》之至也。（《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史记·孔子世家》）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诗纬汎历枢》，见《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孔颖达疏引）

"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疏）

三　《诗经》的时代与地域

（一）《诗经》的时代

关于《诗经》305篇产生的确切年代，现在很难一一考定。但可大致论定其创作时期是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大约500年间。

1. 《颂》的时代

《诗经》作品中，《颂》的时代为最早；其中，最早者为《周颂》。

(1)《周颂》

《周颂》主要产生于西周初期。其大部分作品应是在西周初年至昭王以后不久的一段时期中制作的。

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郑玄《诗谱序》)

《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毛诗正义》卷十九郑玄《周颂谱》)

《周颂》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后之诗。(朱熹《诗集传》卷十九《颂》序)

(2)《商颂》

关于《商颂》的时代，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殷商后裔宋国的宗庙祭祀乐歌，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属商朝晚期之作。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下》)

《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太)师，以《那》为首。(《毛诗正义》卷二十《那序》)

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史记·宋微子世家》)

今按：《毛诗·商颂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师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国语》亦同此说。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许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谬说耳。(《史记·宋微子世家》司马贞《索隐》)

(曹)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后汉书·曹褒传》)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同上李贤注)

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朱熹《诗集传》卷二十《商颂序》）

妄夫以为春秋时人作，又不足置辨。虞廷赓歌，每句用韵，《商颂》多为此体，正见去古未远处。（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八）

三家与毛，又有大驳异处。如以《鲁颂》为公子奚斯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是也。……考父作《商颂》，义出《韩诗》，而《史记》用《鲁诗》，班固用《齐诗》，三家义同，乌得偏据《毛诗》以驳之乎？（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3）《鲁颂》

《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学者们大都认为，现存《鲁颂》四篇是鲁僖公（前659—前627）、鲁文公（前626—前609）时代的作品。

《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毛诗正义》卷二十《駉序》）

《駉》颂序云："史克作是颂"。广言作颂，不指《駉》篇，则四篇皆史克所作。（《毛诗正义》卷二十《鲁颂谱》孔颖达疏）

湣公弟名申，成季相之，鲁国以理，于是鲁人为僖公作《鲁颂》。（《史记·鲁周公世家》司马贞《索引》）

《韩诗·鲁颂》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选》卷一《两都赋序》李善注引）

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旧说皆以为伯禽十九世孙僖公申之诗，今无所考。独《閟宫》一篇，为僖公之诗无疑耳。（朱熹《诗集传》卷二十《鲁颂序》）

奚斯，公子奚斯，即鲁大夫公子鱼也。……史克见《左传》，在文公十八年（前609），至宣公世尚存，见于《国语》。奚斯见于闵公二年（前660），

故文公二年传已引《閟宫》之诗。则奚斯作《閟宫》，必在史克作《駉》之前，此其显证矣。（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九）

孔广森曰："三家谓诗为奚斯作者是也。此与'吉甫作颂，其诗孔硕'文义正同。……"史克见《左氏》文十八年传，宣公时尚存，见《国语》，其年辈在后。奚斯见《左氏》闵二年传，其年辈在前。则奚斯作颂于僖公之时，时代正合，故当从三家以为奚斯所作。（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2. 二《雅》的时代

一般认为，《大雅》大体上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略晚于《大雅》，其作品多数产生于西周后期，少数还是春秋时期之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毛诗正义》卷九郑玄《小大雅谱》）

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变有厉、宣、幽，六王皆居在镐丰之地，故曰丰镐之时诗也。（《毛诗正义》卷九孔颖达疏）

（1）《大雅》

《大雅》31篇，其内容为祝颂赞美、祭祀燕享者，占过半数，与《周颂》之内容相近。但其篇幅较长，用韵较整齐，在形式上则较《周颂》有所进步。《大雅》中的作品，其确切年代虽难考定，但可推知其产生的时代大体上不出西周。

自此（按：指《大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据盛隆之时，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国之大事，故为正《大雅》焉。《文王》至《灵台》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声》二篇是武王之《大雅》。（《毛诗正义》卷十六陆德明《音义》）

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其次序时世，则有不可考者矣。（朱熹《诗集传》卷九《小雅序》）

周之始大，实自文王，故命将征伐，则必"告于文人"，而《大雅》三十一篇言文王之德者独多，其次则言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故尝疑此诸篇为周人颂其祖德，歌于岐周宗庙之诗，而《崧高》、《烝民》、《韩奕》、

《江汉》、《常武》五篇，为告于宗庙，锡命将帅之诗。窃臆《大雅》皆岐周之诗，然未敢遽以为定论也。(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诗大小雅说臆》)

（2）《小雅》

《小雅》74篇，多数是西周后期的作品，少数则为春秋时期之作。《小雅》中的作品，风格近于《国风》，说明它受到了《风》诗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其时代较《大雅》略晚。

《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尽《召旻》，《小雅》尽《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自《节南山》下尽《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余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小大雅谱》疏)

《节南山》乃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时人，当隐、桓之时，家父使鲁，自幽及鲁，盖七十年，何得家父复仕幽朝？(郑樵《诗辨妄》)

《正月》亦刺桓王诗，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威(灭)之。"且平王东迁于王城，故以镐京为宗周。(同上)

太史公称《离骚》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言《离骚》兼《国风》、《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见《小雅》与《风》、《骚》相类，而《大雅》不可与《风》、《骚》并言也。(严粲《诗辑》卷一)

龚橙《诗本谊》云："《黄鸟》，女思大归也。《我行其野》，女父见之怨也。《谷风》，弃友之怨也。《蓼莪》，孝子不得终养也。《都人士》，思西都也。《采绿》，怨旷也。《隰桑》，思君子也。《绵蛮》，役思也。《瓠叶》，庶人飨射也。《渐渐之石》，从征也。《苕之华》，怨饥也。《何草不黄》，怨役也。"龚氏又指斯十二篇为西周民风。果如其说，则《小雅》之中，确有民

风，而昔人《雅》降为《风》之说，亦得一根据。（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诗大小雅说臆》）

3. 《国风》的时代

《国风》160篇，不少来自民间，流传既久，时代亦参差难定。一般认为，其时间跨度大致为上起西周后期，而下迄春秋中叶，大部分属于春秋初期至中期之作。关于《国风》亦即《诗经》中时代最晚的作品，多数人认为是《陈风·株林》；但也有人认为，《曹风·下泉》或《邶风·燕燕》才是最晚之作。

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诸侯。（《国语·楚语上》）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

《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诗正义》卷七《株林序》）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毛诗正义》卷七《下泉序》）

《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毛诗正义》卷二《燕燕序》）

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郑玄《诗谱序》）

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征舒字也。灵公（按：陈灵公于前613—前599在位。）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朱熹《诗集传》卷七《株林》注）

何楷《诗世本古义》据《易林》蛊之归妹云："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时，忧念周京"，此诗（按：指《曹风·下泉》）当为曹人美晋荀跞纳敬王于成周而作。……今按《易林》说《诗》多本三家，何楷以《左传》证之，似亦可备一说。……此诗"念彼周京"，似王新迁成周，追念故京师王室之词。自是以后，诸侯不复勤王，故列国《风》诗终于此。亦可为何氏增一证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五）

《诗经》是古书中最可信的，我们可以不必考究他的真伪，单辨清他的年代便够了。……据我看，最早的不能超过周初，也许有几篇在周公时代。最迟的，若依毛氏《诗序》就是《株林》，因为《株林》记了夏南的事，是在西历纪元前598年。……若依《韩诗外传》，就是《燕燕》，因为《燕燕》是卫定姜送其儿妇大归的诗，是在西历纪元前558年。……《周颂》最早，是周初的产品。《大雅》、《小雅》、《桧风》、《唐风》、《魏风》次之，是西周末到春秋最初期的产品。《周南》、《召南》、《王风》、《郑风》、《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卫风》较晚，是春秋时代的产品。论起篇数最多的，那自然是春秋时代。（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二)《诗经》的地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在名称上便有比较明确的标识。它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了江汉流域。其地域之广包括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湖北和四川等地区，都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颂》的地域

《周颂》产生的地域自然是在镐京，《鲁颂》出于鲁国，《商颂》则为宋国之作。

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甫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寖广，于是徙都于丰。……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岐周，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丰，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镐，在丰东二十五里。（朱熹《诗集传》卷一《周南序》）

鲁，少皞之墟，在《禹贡》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长子伯禽。今袭庆东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朱熹《诗集传》卷二十《鲁颂序》）

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地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猪之野。……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应天府亳州界。（朱熹《诗集传》卷二十《商颂序》）

2. 二《雅》的地域

二《雅》乃王畿之乐，当然也是周都（西周都镐，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的作品。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之时诗也。（《毛诗正义》卷九郑玄《小大雅谱》）

（洛邑）即王城也。平王以前号东都，至敬王以后及战国为西周也。（《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

《括地志》云："周丰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镐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同上）

《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二《雅》独无所系，以其纯当周世，无用标别也。（程大昌《诗论一》）

3. 《国风》的地域

15国《风》，其产生的地域各如其名所示，唯二《南》与《豳风》，尚有异说。但大都认为，二《南》之地域主要在南方的江汉流域，包括今之河南、湖北、四川等地。"豳"则同"邠"，周之先祖公刘由邰迁此，其地在今陕西彬县东北，西周亡后，为秦所有，《豳风》即出于此地。

（1）关于二《南》

（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条下引"韩婴叙《诗》云"）

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

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朱熹《诗集传》卷一《周南序》）

盖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北界河、洛，南逾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南分之。《史记》谓雒阳为周召，从可知已。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阳、襄、邓、承天、德安、光、黄、汝、颍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雒、兴安、郧、夔、顺庆、保宁是已。（王夫之《诗经稗疏》卷一）

《楚地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胡征士续曰：案汉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门州及襄阳、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阳，今河南南阳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诗曰"汝坟"者，其东北境至汝也。曰"汉广"、"江永"者，其西至汉，南至江也。《召南》之诗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东南至南郡也。大约《周南》有南郡之东，而东至南阳；《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也。（陈乔枞《韩诗遗说考》卷一）

（2）关于《豳风》

豳者，后稷之曾孙也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属右扶风栒邑。……成王之时，周公避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二年。后成王迎之，反之摄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纯似于公刘、太王之所为。太师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以为豳国变《风》焉。（《毛诗正义》卷八郑玄《豳谱》）

豳，国名，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县。（朱熹《诗集传》卷八《豳序》）

关于《豳风》，有两个问题，颇为近人所聚讼。一是豳之地望，一是豳诗之产地。关于前者，《诗经》本身内本有很明显的记载："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公刘》）所以豳地之在渭水流域，似乎没有问题。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十期）力证豳在汾水流域，……曲解道，

"而诗称'涉渭为乱'者，实则涉河而达于渭，不必其涉渭而更南也。……"然而诗人之意果如钱穆所推测者，则与其说是甚巧，毋宁说是笨伯；因为明明是涉河，而他偏说涉渭！总之，豳在山西，证据实在不够；以《公刘》一诗观之，则旧说在陕西，似更可从。(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一)

四 《诗经》的应用与流传

春秋时期，《诗》三百在上层社会、贵族生活中被广泛应用。或用其乐，或用其辞，或乐、辞并用，充分体现了《诗》的实用性。由于《诗》三百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故能得以保存和流传。特别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极为重视《诗》的社会教化作用，把它列为所谓"六艺"之一，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材，这对《诗》的广泛流布和久远传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秦皇焚书，《诗》赖口耳相传得免浩劫。到了汉代，文帝时相继出现传《诗》者鲁、齐、韩三家，此即所谓"三家诗"。东汉以后，"三家诗"逐渐衰落，《毛诗》代之而兴。汉亡以后，遂成《毛诗》之天下。《诗》自从被尊奉为封建社会中指导人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圣经"之一，于是在神圣的光圈环罩下，其本来面目便被掩盖了。

(一)《诗经》的应用

《诗经》的实用价值决定了它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之中。其应用范围包括祭祀、朝聘、婚礼、宾宴等各种典礼仪式，以美刺为手段的内部政治教育，以及通过赋诗言志而表情达意的社会交往和外交应对。其中既有音乐的应用，也有歌辞的应用，而且是明显地从音乐的范围扩大到了语言的范围。

1. 《诗经》的实用价值

不仅《诗经》的乐歌本身具有演奏、歌唱的实用价值，而且其歌辞更具有言志、美刺和观俗的作用。夫子所谓"兴"、"观"、"群"、"怨"，即概括了《诗》的感染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讽刺作用。然而应该看到，儒家之所以如此强调《诗经》的实用价值，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可用它来为维护封建的礼教服务。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同上）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者也。……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隋书·经籍志》）

2. 《诗经》的实际应用

在春秋时期贵族阶级的现实生活中，《诗经》为用甚广。它不仅被用于各种典礼仪式，还被公卿士大夫们用作美刺的手段和赋诗言志的工具。特别是"赋诗言志"，在当时颇为盛行。此所谓"赋诗"，不是自创诗作，也不是自己诵唱，而是点出现成的诗作，由乐工演唱。点诗者乃借用其中现成的诗句，断章取义地暗示自己的思想和情志。这种通过乐歌赋诗言志的作法，往往用于政治、外交场合。公卿士大夫们在交往谈话中，则常常直接引用某些现成的诗句。这就使《诗经》的应用范围从音乐扩大到了语言，进而发展演变为战国时代的"著述引诗"，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如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晋侯使行人问焉，……对曰："……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臣敢不拜贶。夫《鹿鸣》，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国语·鲁语下》)

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嘉乐》，《诗·大雅》。取其"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同上杜预集解)

《蓼萧》，《诗·小雅》。言大平泽及远，若露之在萧，以喻晋君恩泽及诸侯。(同上)

《缁衣》，《诗·郑风》。义取"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违远于晋。（同上）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

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弟子通利则思师。《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荀子·致士》）

《民劳》、《六月》之后，……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毛诗正义》卷九《小大雅谱》孔颖达疏）

古之达礼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谓吉凶军宾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礼。古之达乐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所谓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乐。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郑樵《通志·乐略》）

《诗》本讽谕，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从。（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二）《诗经》的流传

在我国古代，《诗经》流传久远。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以后，《诗经》的流传却有不同的特点。

1. 春秋战国时期《诗经》的流传

春秋时期，《诗》在贵族社会中广泛地被人们习学、传诵。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教习所谓"六艺"，《诗》即为"六艺"之一。到了战国时代，儒家崇尚"诵经"，其所谓"经"中即有《诗》。不过，《诗》在此时虽然流传甚广，却并未取得后世那样"独尊"的地位。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

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王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

"六艺"谓《易》、《礼》、《乐》、《诗》、《书》、《春秋》。(同上颜师古注)

2. 西汉以后《诗经》的流传

秦皇焚书禁学，《诗》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兴，广开献书之路，先秦典籍陆续重现。至武帝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倡导学"经"，《诗》为"五经"之一，从此正式被官方崇奉为"经"。汉代传《诗》者有今、古文经学之争。所谓"今文经"，乃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六国文字)所记录的儒家经典；所谓"古文经"，则指秦以前用古文(篆书)所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今、古文经学两派，不仅书写文字及读法不同，而且文字训诂及内容解释亦有很大差异。两派对立，斗争不断。汉代鲁、齐、韩、毛四家诗并传。鲁、齐、韩三家诗属"今文经"学派，兴盛于武帝以后百余年间。《毛诗》属"古文经"学派，较"三家诗"晚出。当"三家诗"兴盛时，《毛诗》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东汉以后，"三家诗"渐趋衰亡，《毛诗》代之而兴，遂压倒"三家诗"而盛行于世。

及今上(按：即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史记·儒林列传》)

申公者，鲁人也。……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同上)

(《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同上)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汉书·儒林传》赞)

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隋书·经籍志》)

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于鄢、郢；毛氏光价于河间，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孔颖达《毛诗正义序》)

《毛诗》者，出自毛公。……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惟《诗》在汉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辕固生、韩婴，鲁、齐、韩《诗》，并号初祖。故汉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经。……惟《诗》"三家"同为今文，所

出各异，当时必应分立，后人不可并为一谈。而专家久亡，大义茫昧。……“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义亦简略。（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第二节 《诗经》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意义

《诗经》305篇作品，产生于漫长的时代和辽阔的地域，反映了恢宏博大的社会生活面。其思想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较为突出的有：周民族的史诗，颂歌与怨刺诗，真挚动人的婚恋诗，以及农事诗、征役诗、爱国诗等等。可谓丰富多彩，博大深沉。

一 周民族的史诗

在《诗经》的《大雅》里，集中保存了五首古老的民族史诗。它们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一）光辉的史迹

《生民》生动地描述了周始祖后稷神奇非凡的诞生历史，颂扬了他长于农事、勤奋创业的英雄业迹。《公刘》描述了后稷之曾孙公刘自邰迁豳的史迹，歌颂了他率领周人营建都邑、拓垦土田的创业精神。《绵》描述了周文王之祖父太王（古公亶父）始迁岐周、以开王业的丰功伟绩，歌颂了周民族艰苦创业、由小而大、兴旺发达、绵延不绝的光荣历史。《皇矣》主要歌咏了周文王伐密、伐崇的胜利，颂扬了文王继承先祖遗烈、发展壮大周民族的伟大功绩。《大明》则颂扬了文王、武王父子的非凡功德，着重赞颂了武王伐商的辉煌胜利。从《生民》到《大明》五篇作品，合而观之，适成一组史诗。它们虽然简朴，却像是用粗线条较为完整地勾画出了周民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史迹，无愧为周民族的英雄史诗。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毛诗正义》卷十七《生民序》）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大雅·生民》第五、六章）

《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十七《公刘序》）

公刘者，后稷之曾孙也。夏之始衰，见迫逐迁于豳，而有居民之道。……召公惧成王尚幼稚，不留意于治民之事，故作诗美公刘以深戒之也。（同上郑玄笺）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大雅·公刘》第三章）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大雅·公刘》第五章）

《绵》，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毛诗正义》卷十六《绵序》）

此（按：指《绵》）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追述太王始迁岐周，以开王业，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六《绵》首章注）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大雅·绵》前四章）

《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毛诗正义》卷十六《皇矣序》）

此诗（按：指《皇矣》）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朱熹《诗集传》卷十六《皇矣》首章注）

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朱熹《诗集传》卷十六《皇矣》题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毛诗正义》卷十六《大明序》）

二圣（按：指文王、武王）相承，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同上郑玄笺）

一章言天命无常，惟德是与。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纣。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终首章之意。（朱熹《诗集传》卷十六《大明》题解）

（二） 不朽的价值

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真正的史诗少得可怜，因而《诗经·大雅》中保存下来的这一组史诗就显得特别珍贵。不仅如此，这一组史诗在写作上还各有特点，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如《生民》写后稷之诞生及其对农艺的天赋才能，颇富神话色彩，全诗无异于一篇糅合神话传说的《后稷传》。《公刘》刻画了一个深受人民爱戴，既忠厚善良，又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英雄形象，充满了讴歌英雄的激情。《绵》依次写了迁岐、定宅、授田、作庙、筑室、立门社、服混夷和文王受命继承先祖遗烈等事迹，叙事章法明晰。《皇矣》出色地描述了伐密、伐崇的两次大战，气势不凡。至于《大明》一诗，则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特别是成功地刻画了师尚父的英武雄姿，形象鲜明，感人至深。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菑（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大雅·生民》前四章）

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大雅·公刘》第一、二章）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庙。六章言治宫室。七章言作门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朱熹《诗集传》卷十六《绵》题解)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衝，以伐崇墉。

临衝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大雅·皇矣》第五、六、七、八章)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大雅·大明》第七、八章)

二　颂歌与怨刺诗

中国古代诗歌有所谓“美刺”的传统，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可谓开其端者。在《诗经》305篇中，歌功颂德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这类作品多属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在《颂》和二《雅》中保存最多。它们或颂帝王、歌天命，或颂战功、扬王威，或颂宴饮、赞嘉宾，虽也不无可取之处，但其思想意义及文学价值无足称道。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还有不少与颂歌异调的怨刺诗。比较而言，无论思想意义还是文学价值，怨刺诗均高于歌功颂德之作，是我们应予重视的一份文学遗产。

(一)颂　　歌

《诗经》中的歌功颂德之作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直接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些谀美之作不仅思想内

容无甚可取，在艺术上也是浅薄，空洞，呆板，枯燥的，没有多少价值可言。但应该看到，正是这一类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成了后世那些讴歌承平、粉饰现实的谀美之作的榜样和典范。

愚谓此诗（按：指《鲁颂·閟宫》）褒美失实，……盖《颂》中变格，早开西汉扬、马先声。（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八）

1. 颂帝王，歌天命

这一类作品，大都鼓吹上帝和天命，颂扬周王的功德，其目的是为周王统治的合理性寻求神学的支持，并借助于上帝的权威以慑服臣民，使之乖乖顺从，不敢反抗，以永保周王之天下。

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周颂·清庙》）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周颂·维天之命》）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周颂·天作》）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周颂·昊天有成命》）

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周颂·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世，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雅·文王》前四章）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於万斯年，不遐有佐！（《大雅·下武》第五、六章）

2. 颂战功，扬王威

这一类作品讴歌战争的胜利，赞美将领的功绩，颂扬武夫的威风，不乏自豪之感和英武之概。但其主旨仍为宣扬帝王威德，内容较为单调，描写亦较浮泛。

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鲁颂·泮水》第五、六、七章）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商颂·殷武》第一章）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大雅·江汉》前二章）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大雅·常武》第一、四、六章）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小雅·出车》第三章）

3. 颂宴饮，赞嘉宾

这一类作品颂宴饮之欢，歌嘉宾之乐，反映了王公贵族们的享乐生活，有一定认识意义。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第三章）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小雅·南有嘉鱼》首章）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小雅·宾之初筵》首章）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小雅·鱼藻》）

（二）怨 刺 诗

在《诗经》的二《雅》及《国风》中，保存了一些尖锐辛辣的怨刺诗。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与歌功颂德之作恰相对立。它们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揭露了激烈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种种丑行。就时代而言这些作品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其中一些作品，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闵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矛盾，或针砭昏君，或斥责佞臣，表现出作者系心国事、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忠心诚意。这在精神实质上，与歌功颂德之作实有相通之处。但它们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在客观上具有不容低估的认识价值。

在《诗经》的怨刺诗中，还有一些出自民间而经乐官整理后保存下来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锋锐的笔触，揭示了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揭露了统治者的污行秽迹，辛辣地讽刺和嘲笑了王公大人们肮脏的行径和无耻的丑态，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下层民

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怨刺诗乃是《诗经》的精华之一

1. 怨刺诗的由来

在儒家看来，怨刺诗即所谓"变风"，"变雅"，是王道衰落、礼崩乐坏、政教不行、人伦废丧的产物；其作"刺过讥失"，旨在"匡救其恶"。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和道德、伦理因素。怨刺诗的确是乱世的产物。不过就实质而言，毋宁说它们是生活于乱世之中的诗人们的怨愤的倾诉、不平的心声！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之。（《毛诗正义》卷一《毛诗序》）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汉书·礼乐志》）

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郑玄《诗谱序》）

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朱熹《诗集传序》）

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自邶、鄘以至曹、桧，

无国无之，可谓盛矣。岂若后世之为诗者，于朝廷则功德祥瑞，于阜野则月露风云，而甘出于无用者哉！……《风》、《雅》有变，以民风君德而言，可也。民风君德变矣，而有刺诗，则变而不失其正。《葛屦》之诗曰："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然则诗人自不讳刺，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胡可以不察耶？（程廷祚《青溪文集》卷一《诗论六》：《刺诗之由》）

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岂其本原固有不同者与？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体，故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作为诗歌以美之。……或于颂美之中，时寓规谏，忠爱之至也。其流风遗韵，结于士君子之心，而形为风俗。故遇暗主乱政，而欲救之，则一托之于诗。……然则刺诗之作，亦何往而非忠爱之所流播乎？是故非有爱君之心，则《天保》、《既醉》只为奉上之谀词；诚有爱君之心，则虽《国风》之刺奔刺乱，无所不刺，亦犹人子孰谏父母而涕泣随之也。（程廷祚《青溪文集》卷二《诗论十三》：《再论刺诗》）

2. 二《雅》中的怨刺诗

二《雅》中的怨刺诗大多是西周末年厉、幽时期及其以后的乱世之作。这些作品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较为出色者，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桑柔》、《瞻卬》，《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巧言》、《巷伯》等等，都不外乎闵时伤乱、愤世哀民之作。它们或针砭昏庸的国君，或讽刺暴虐的乱政，或指斥谗佞的奸小，或抒发深沉的怨愤，不仅深刻揭示了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诗人们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

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第一、二、五章）

《序》说以此（按：指《民劳》）为召穆公刺厉王之诗。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辞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然其忧时感事之意，亦可见矣。苏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维无良之人，将悦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后柔远能迩，而王室定矣。（朱熹《诗集传》卷十七《民劳》注）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而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大雅·板》前四章）

《序》以此（按：指《板》）为凡伯刺厉王之诗。今考其意，亦与前篇（按：指《民劳》）相类，但责之益深切耳。（朱熹《诗集传》卷十七《板》注）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第一、六、七、八章）

《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十八《荡序》）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

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大雅·瞻卬》第一、二、三、七章)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毛诗正义》卷十八，《瞻卬序》)

此(按：指《瞻卬》)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朱熹《诗集传》卷十八《瞻卬》注)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

……

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小雅·节南山》第一、二、五、六章)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威(灭)之。

……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小雅·正月》第一、二、八、十二、十三章)

此诗(按：指《正月》)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节，不以其时，既使我心忧伤矣。而造为奸伪之言，以惑群听者，又方甚大。然众人莫以为忧，故我独忧之，以至于病也。(朱熹《诗集传》卷十一《正月》注)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小雅·十月之交》前四章）

此篇（按：指《十月之交》）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毛诗正义》卷十二《十月之交序》郑玄笺）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太）甚！

……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第一、五、六、七章）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十二《巷伯序》）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汉书·司马迁传赞》）

时有遭谗而被宫刑为巷伯者，作此诗。（朱熹《诗集传》卷十二《巷伯》注）

3. 《国风》中的怨刺诗

二《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贵族文人之手，而《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民间，因而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国风》中的怨刺诗怨愤更强烈，讽刺更尖刻，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和斗争性。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怨责和讥刺，《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

《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等等，都无不在辛辣的讽刺中寓含深沉的怨愤，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不平的心声。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怨刺诗，无愧为文学史上很有意义的名篇佳作。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第一章)

《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毛诗正义》卷五《伐檀序》)

《伐檀》操者，魏国女之所作也。伤贤者隐弊，素餐在位，闵伤怨旷，失其嘉会。(《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八引《大周正乐》)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第一章)

《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毛诗正义》卷五《硕鼠序》)

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朱熹《诗集传》卷五《硕鼠》注)

新台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邶风·新台》)

《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二《新台序》)

旧说以为卫宣公为其子伋娶于齐，而闻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此诗以刺之。言齐女本求与伋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丑恶之人也。(朱熹《诗集传》卷二《新台》注)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鄘风·墙有茨》第一章)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按：即惠公庶兄，宣公子顽。)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左传·闵公二年》)

《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毛诗正义》卷三《墙有茨序》)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齐风·南山》)

十八年春，公(按：指鲁桓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左传·桓公十八年》)

《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毛诗正义》卷五《南山序》)

襄公之妹，鲁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与淫通。及嫁，公谪之。公与夫人如齐，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搚杀之。夫人久留于齐，庄公即位后乃来，犹复会齐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齐师。齐大夫见襄公行恶如是，作诗以刺之，又非鲁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同上郑玄笺)

此诗(按：指《南山》)前二章刺齐襄，后二章刺鲁桓也。(朱熹《诗集传》卷五《南山》题解)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陈风·株林》)

夏姬，郑穆公之女也，嫁于陈大夫夏御叔。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通焉。泄冶谏不听而杀之，后卒为其子征舒所弑。而征舒复为楚庄王所诛。(朱熹《诗集传》卷七《株林》题解)

三　真挚动人的婚恋诗

"《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国风》中，又尤以婚恋诗最为精彩动人。此所谓"婚恋诗"，包括《诗经》中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其突出特点是"各言其情"。爱情这一主题，像一条红线，几乎贯穿了历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我国文学的这一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正是从《诗经》发源的。值得注意的是，《诗经》

中的婚恋诗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甚高。这些作品无论是“男悦女之词”，还是“女惑男之语”；也无论是表追求、抒思慕、叙幽会、寄怀念，还是描述婚恋的悲剧、抒发内心的哀痛；都莫不情真意挚，感人至深，具有不朽的价值。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朱熹《诗集传》卷四《郑风》末注）

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曾歌颂其爱情的喜悦和痛苦的那些牧人，郎格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娅，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生活的奴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2—73页）

（一）热烈奔放的情歌

《诗经》中的婚恋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其中一些堪称热烈奔放的情歌。此类作品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可意情人的热切相思，或描述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一派欢快的情调。如《周南·关雎》、《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和《郑风》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溱洧》等，便是其中出色的佳作。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撼)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邶风·静女》)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郑风·野有蔓草》)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第一章)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周礼·地官·媒氏》)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此诗(按：指《溱洧》)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诗集传》卷四《溱洧》注)

(二)深沉执著的恋歌

《诗经》的婚恋诗中，还有一些可说是深沉执著的恋歌。此类作品或歌颂对爱情的忠实、专一，展现了主人公纯洁美丽的心灵；或表现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和对婚恋自由的执著追求，揭示了当时在礼法压迫下，婚恋的不自由给青年男女造成的内心创伤。如《王风·采葛》、《卫风·木瓜》、《郑风·出其东门》、《秦风·蒹葭》和《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之作。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王风·采葛》)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缟衣茹藘，聊可与娱。（《郑风·出其东门》）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齐风·南山》）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同上）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豳风·伐柯》）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柏舟》）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郑风·将仲子》）

（三） 痛苦哀伤的悲歌

热烈欢快的情歌令人愉悦，深沉执著的恋歌使人赞叹，痛苦哀伤的悲歌则激人同情和启人深思。以《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为代表的所谓"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在私有制度下夫权制的不合理，揭示了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倾诉了女主人公内心的哀怨和痛苦。在《诗经》的婚恋诗中，它们是感人至深的爱的悲歌。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邶风·谷风》）

《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毛诗正义》卷二《谷风序》）

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朱熹《诗集传》卷二《谷风》注）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卫风·氓》）

《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毛诗正义》卷三《氓序》）

四　农事诗、征役诗、爱国诗

《诗经》中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这些作品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它们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疾苦，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感情。既有描述农事活动和劳动生活的农事诗，也有抒写兵役、徭役之苦与征夫、思妇之情的征役诗，还有表现爱国感情及英雄气概的爱国诗。这些作品涉及面广，大多思想意义深刻，乃是《诗经》中很可宝贵的部分。

(一)农 事 诗

周代经济以农为主，因而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的农事诗在《诗经》中为数不少。《风》、《雅》、《颂》里都有此类作品。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晦(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

1. 《雅》、《颂》里的农事诗

《雅》、《颂》里的农事诗，大多赞颂农业所取得的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了祈求丰年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但其内容较为单调，文学价值亦颇有限。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颂·臣工》)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有积，万亿及秭。……（《周颂·载芟》）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周颂·良耜》）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甫田》第一、四章）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盖之以霢霂，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小雅·信南山》前三章）

2. 《国风》里的农事诗

《国风》里的农事诗，内容丰富，清新生动，是《诗经》中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值得重视。

（1）描绘劳动生活的“风习画”

《国风》中不仅有一些作品，往往借描写采集、樵苏之类与农事相关的劳动为比兴；而且另有一些作品，直接记录和描写了农事活动及劳动生活，描绘出一幅幅动人的劳动生活“风习画”。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等，便是这样的优美诗作。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召南·采蘩》)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同上)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鄘风·桑中》)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同上)

爰采葑矣，沬之东矣。(同上)

采苓采苓，首阳之巅。(《唐风·采苓》)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同上）

采葑采葑，首阳之东。（同上）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魏风·伐檀》）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豳风·伐柯》）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周南·芣苢》）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按：指《芣苢》），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

（2）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

《豳风》里的《七月》一诗，是历代传诵的不朽杰作。它反映了奴隶社会中从事农桑劳动的男女奴隶的繁重劳作和悲惨生活，客观上揭露了奴隶主贵族对奴隶们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表现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画图，可说是一首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豳风·七月》）

（二）征 役 诗

西周晚期，王室衰微，戎狄交侵，征战不休。平王东迁之后，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战争更是连年不断。征役繁重，民不聊生。苛酷的兵役、徭役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事靡盬"，终年行役，父母失养，夫妻离散，惨痛的人间悲剧一幕接一幕，人民心中的痛苦无穷无尽。这就难怪《诗经》中有那么多抒写兵役、徭役之苦和征夫、思妇之情的征役诗了。如《小雅》中的《北山》、《渐渐之石》、《何草不黄》，《国风》中的《魏风·陟岵》、《唐风·鸨羽》、《王风·君子于役》、《邶风·式微》、《卫风·伯兮》、《豳风·东山》等等，都是其中的出色之作。它们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矛盾，展现了征夫、思妇的内心世界，无愧为《诗经》中价值很高的部分。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小雅·北山》前三章）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武人东征，不遑朝矣！（《小雅·渐渐之石》第一章）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小雅·何草不黄》）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十五《何草不黄序》）

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朱熹《诗集传》卷十五《何草不黄》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尚）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尚）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尚）慎旃哉！犹来无死！"（《魏风·陟岵》）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毛诗正义》卷五《陟岵序》）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唐风·鸨羽》）

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朱熹《诗集传》卷六《鸨羽》注）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王风·君子于役》）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邶风·式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卫风·伯兮》）

《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毛诗正

义》卷三《伯兮序》）

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朱熹《诗集传》卷三《伯兮》注）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豳风·东山》）

（三）爱国诗

中华民族自来就有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每当外敌入侵，国有危难，人民总是奋起抗御、保家卫国，以鲜血和生命谱写爱国之歌.《诗经》中表现爱国感情和英雄气概的爱国诗，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如《小雅·采薇》中的主人公，舍其室家，抵御外侮，“不遑启居”，“载饥载渴”；但他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猖狂的猃狁侵凌之故。为了保卫家园，不得不奋起战斗，作出牺牲。又如相传为许穆夫人所作的《鄘风·载驰》一诗，描述诗人当祖国危亡之际，心忧如焚，急驰归唁；谋救家邦，求援大国。还有《秦风·无衣》一诗，可说是一支气势磅礴的战歌。它表现了当时人民同仇敌忾、勇抗外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些作品或细腻委婉，或激昂慷慨，全都充满了爱国热情，洋溢着堂堂正气！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小雅·采薇》第一、二、五章）

此遣戍役之诗。……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启居者，非上之人固为是以苦我也，直以猃狁侵凌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又风以义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矣。"（朱熹《诗集传》卷九《采薇》注）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闷？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鄘风·载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秦风·无衣》）

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朱熹《诗集传》卷六《无衣》题解）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经》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具有浩博的思想内容，而且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它以特具的艺术光辉彪炳文学史册，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是一部汇编而成的乐歌总集，其作者不一，内容

各异，故其艺术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而艺术成就也高下有别。如三《颂》及《大雅》中那些颂帝王、歌天命、赞祖宗、咏宴饮的歌功颂德的庙堂乐歌或官方乐歌，千篇一律，呆板枯涩，在艺术上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但除此而外，《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的那些优秀诗篇，无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闪耀着迷人的艺术光彩。概括言之，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一）朴实、自然的风格特征

《诗经》主要产生于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作为文学作品，它以艺术的形式体现了西周至春秋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性精神，表现出重人事、重实际、重现实的思想特征。反映在艺术风格上，尽管《诗》三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化，但就总体而论，却不能不说朴实而自然的艺术风格为其基调。

这一艺术风格直接表现为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真率地表达感情。《诗经》中的作品，大多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紧贴现实生活，不作无病呻吟，感情真挚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不少作品富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乡土情调。作者善于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刻画那些颇富特征的细节或生活侧面，抒发淳朴真挚的内心感情。作品不事雕琢，自然而然从心田流出，仿佛天籁之音。这种朴实、自然的风格美闪耀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较为突出地体现了上述特征的作品，主要有《国风》中的《豳风·七月》、《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鄘风·柏舟》、《卫风·氓》、《召南·摽有梅》、《王风·黍离》、《王风·君子于役》、《齐风·东方未明》，以及《小雅》中的《大东》、《北山》、《无羊》、《十月之交》等等。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召南·摽有梅》）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暮)。（《齐风·东方未明》）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第四章）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第四、五、六章）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小雅·无羊》前三章）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前人从《诗经》305篇作品中，归纳出了所谓“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不仅是对《诗经》艺术技巧的概括和总结，而且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具有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如何使主观情

志与特定的想象、理解融合而为客观化的艺术形象，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认为，从《诗经》的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所谓“赋、比、兴”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正是解决这一重要问题的有效手段。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不仅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民族特色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我国诗歌艺术宝库的杰出贡献。

1. 赋、比、兴的定义

关于“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虽然有人认为，“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风、雅、颂”是《诗》的体制，二者有所不同。在“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赋”用得最多，但因其比较单纯、清楚，易于理解，少有歧见，故历来的争议大都集中在如何理解和阐释“比、兴”上。然而说法虽多，但都大同小异。其实，简而言之，“比”即比喻，乃咏彼而喻此；“兴”即起兴，乃咏彼而兴此；“赋”即铺陈，乃不用比、兴而直写其事。看来，朱熹之说较能得其精神。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

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挚虞《文章流别论》）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

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钟嵘《诗品·总论》）

大人尝言学诗者必分其义，如赋、比、兴，古之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关雎》注）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卷一《葛覃》注）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卷一《螽斯》注）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谢榛《四溟诗话》卷二）

"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上）

如据朱熹《诗集传》统计，全书1141章，其中赋727，比111，兴274，兼类（即兴而比，赋而兴之类）29。赋居最多数，占63.7%，超过比兴的总和。（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论"赋"的艺术》注）

2. 赋、比、兴的运用

在《诗经》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表现手法，其特点为"敷陈"、"直言"。用于叙事写景，则铺叙直陈；用于抒情，则直抒胸臆。赋之为用，在《诗经》中俯拾皆是，其中且有通篇用赋的佳作。如《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北山》、《无羊》，《国风》

中的《豳风·七月》、《秦风·无衣》、《郑风·将仲子》、《王风·君子于役》、《鄘风·载驰》、《邶风·静女》等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所谓“赋体诗”。比、兴手法的运用，在《诗经》中也极普遍，其例不胜枚举。但通篇用比的所谓“比体诗”却不多，仅有《周南·螽斯》、《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数例而已。由于“兴”乃“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受其性质和作用所决定，故无通篇用“兴”之作。赋、比、兴虽然各有特点，但又不可截然分割。三者往往交相为用，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构成《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周南·螽斯》)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豳风·鸱鸮》)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鹤鸣》)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首章)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邶风·北风》首章)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小雅·苕之华》首章)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魏风·葛屦》首章)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召南·鹊巢》首章)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卫风·淇奥》第三章)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大雅·板》第六章）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小雅·小宛》第三章）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大雅·荡》第六章）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邶风·柏舟》第三章）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同上第五章）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曹风·蜉蝣》第三章）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郑风·大叔于田》首章）

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毛诗正义》卷一《召南·鹊巢》郑玄笺）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鸷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同上）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释皎然《诗式·用事》）

赋、比、兴非判然三体也。诗始于兴，兴者，动也。……兴者，诗之情。情动于中而发于言为赋。赋者，事之辞。辞不欲显，托于物为比。比者，意之象。故夫铺叙括综曰赋，意象附合曰比，感动触发曰兴。非但欢娱为兴，喜怒哀乐皆本于兴。（郝敬《毛诗原解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上）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

《诗》有"赋、比、兴"三义，然初无定例。如《关雎》，毛传、朱传俱以为

"兴"。然取其挚而有别，即可为"比"，取因所见感而作，即可为"赋"。必持一义，深乖通识。（毛先舒《诗辨坻》卷一）

《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刘熙载《艺概·赋概》）

（三）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

《诗经》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是其艺术成就的又一重要标志，历来被奉为典范。它在词汇、句式、章法、修辞和韵律等方面，都有不少创造性的成就，对促进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文学的进步，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 丰富的词汇

《诗经》词汇丰富，表现力强。早在孔子时代，它已被用作学习语言知识和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对于我国书面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诗经》起了重大的作用。

（1）实词和虚词的运用

《诗经》中不仅准确、鲜明、生动地运用了丰富多采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大量虚词，扩大了语言的表现功能，标志着语言艺术的新发展。特别是语气词的巧妙运用，促成了音节的铿锵和谐，有助于表达语气和情态，对后世文言文和诗词曲的语言艺术影响甚大。

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齐风·著》）

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王风·君子阳阳》）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柏舟》）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唐风·绸缪》）

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唐风·采苓》）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周南·卷耳》）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召南·驺虞》）

"已焉哉！""谓之何哉！"慨之深也。"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加"乎而"二字为助者，悔之深也。"其乐只且"，美之深也。(成伯玙《毛诗指说·文体第四》)

《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洪迈《容斋随笔》五集卷四《毛诗语助》)

周诗使用了2949个单字，其中不少是一字数义，如根据字义计算，约有3900多单字。这些单字构成了众多的词汇。

周诗中所使用的名词是很丰富的。仅以表示生物的词类计算，其中关于草本植物的有100种；关于木本植物的有54种；关于鸟类的有38种；关于兽类的有27种；关于昆虫和鱼类的有41种。……

周诗中所使用的动词也是很丰富的。仅以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就有按、攘、抱、携、指、掺、挟、挹、握、提、拊、拾、掇、采、拔、抽、捣、搔、投、折、授、搏、招、击等50多个。(杨公骥《中国文学》第四章《周诗的文学成就和历史价值》)

(2)重言、双声、叠韵的运用

所谓"重言"，即"叠字"，乃由两个相同的字所组成；所谓"双声"、"叠韵"，分别指由声母相同或韵部相同的两个字所组成的词，又称"联绵字"。在《诗经》中，大量重言和双声、叠韵的巧妙运用，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韵律美，成为《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

雨雪瀌瀌，见晛曰消。(《小雅·角弓》)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周南·葛覃》)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召南·草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卫风·硕人》第四章)

窈窕、参差、辗转、雎鸠。(见《周南·关雎》)

顷筐、崔嵬、虺隤、高冈、玄黄。(见《周南·卷耳》)

窈纠、懮受、夭绍。(见《陈风·月出》)

涕泗、滂沱、菡萏、辗转。(见《陈风·泽陂》)

逍遥、翱翔。(见《桧风·羔裘》)

觱发、栗烈、仓庚、蟋蟀、肃霜、涤场。(见《豳风·七月》)

鸱鸮、绸缪、拮据、蓄租、漂摇。(见《豳风·鸱鸮》)

伊威、蟏蛸、町疃、熠燿、洒扫。(见《豳风·东山》)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

用复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上)

以某所见，叠韵如两玉相扣，取其铿锵；双声如贯珠相联，取其宛转。(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诗谈杂录》)

《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王国维《人间词话》)

2. 灵活的句式

《诗经》句型以四言为主，其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四言二拍的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是基本适应的。尽管如此，《诗经》305篇的句型却并非一律。诗人们为了更好地适应内容表达和感情抒发的需要，往往灵活地变换句型，使之错落有致，长短相宜。《诗经》中固然大都为四言句型，但从一言以至于八言的句型也错杂其间。这对后世各型诗体的产生，无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此外，诗人们还善于熟练地选用各种句式，借助句式的多样变化，以恰当而完美的形式表情达意，从而在无形中扩大了四言句的容量，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其常用句式有：陈述式、感叹式、问答式(包括设问、反问)、对话式、肯定式和否定式等。

（1）各类句型

四言为《诗经》基本句型，其例毋庸赘举；其余各类句型，且略举一二。

一言：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

二言：

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

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小雅·鱼丽》)

三言：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召南·江有汜》)

叔于田，乘乘马。(《郑风·大叔于田》)

五言：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召南·行露》)

六言：

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豳风·九罭》)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豳风·七月》)

七言：

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豳风·七月》)

八言：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魏风·伐檀》)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七月》)

(2)各种句式

《诗经》所用句式，多而灵活。其中，陈述式和感叹式随处可见，无烦示例；问答式、对话式、肯定式和否定式，且略举一二。

问答式（包括设问、反问）：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齐风·南山》）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卫风·河广》）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陈风·衡门》）

对话式：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郑风·女曰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之鸣，苍蝇之声。"（《齐风·鸡鸣》）

肯定式和否定式：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卫风·氓》）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

3. 复沓的章法

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形式是《诗经》篇章结构的显著特点。《诗》305篇原皆入乐，复沓的章法正是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最佳形式。这种形式主要表现为一首诗往往分为若干章，各章字句大体一致，仅仅变换少数词语，以适应反复咏唱的需要。据统计，运用这种形式的作品，以《国风》、《小雅》为多。复沓的章法不仅有助于记忆和传诵，而且有一唱三叹、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这种形式显然是来自民间的艺术创造，体现了民歌的艺术特征。如《国风》中的《周南·芣苢》、《周南·樛木》、《周南·桃夭》、《召南·摽有梅》、《召南·驺虞》、《郑风·式微》、《鄘风·柏舟》、《鄘风·桑中》、《卫风·木瓜》、《王风·采葛》、《郑风·将仲子》、《郑风·萚兮》、《郑风·风雨》、《郑风·子衿》、《魏风·陟岵》、《魏风·十亩之间》、《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小雅》

中的《鱼丽》、《南有嘉鱼》、《鹤鸣》、《青蝇》等等，都是出色地运用复沓章法的典型实例。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樛木》）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郑风·萚兮》）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小雅·青蝇》）

一章的句数，一篇的章数，固然是多寡不定，然于此有可注目者，即在一篇之中，各章的句数齐一者占着大多数。……因为《诗》都是用曲调唱的，而大概每章返复于同一旋律歌唱者为多，所以在诗形上多取这种形式，这没有什么可怪的。并且最原始的诗形，他的歌辞也是每章取着返复叠用类似的言辞的体裁。例如《周南·樛木》三章，即其典型的作品。……三章之中，仅只变化押韵之字而已。对于像这种诗的术语，还没有定，在清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论旨》中称之为叠咏，姑且借用此语吧。……这种体裁在《国风》中最多，《小雅》次之，《大雅》与《颂》中极少。据我粗略的调查，《国风》160篇中，此体有133篇，《小雅》74篇中，此体有42篇；《大雅》31篇中、此体有5篇；《颂》40篇中，此体有2篇。而此体之诗，以一篇由二章构成与三章构成者最多。……我推定二章及三章叠咏体为《国风》之典型的诗形。（［日本］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第三章《诗学》）

4. 巧妙的修辞

《诗经》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和加工的书面语，具有准确、鲜明、精练、生动的特点，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其所以如此，还得力于诗人们巧妙的修辞。除了精于锤炼词语和善于选用多种句式而外，诗人们还随时运用各种修辞格，使作品摇曳生姿，异采纷呈。常用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借代、夸张、衬托、对比、对偶、引用、拟声、排比、层递，以及辞格的连用和兼用等等。

（1）比喻

所谓“赋、比、兴”中的“比”，即含比喻之用，其例无庸赘列。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郑风·有女同车》）
尹氏大师，维周之氐。（《小雅·节南山》）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周南·兔罝》）

（2）比拟

拟物为人，或拟人为物，均为比拟。《诗经》中的比拟，既有物的人格化，也有人格的物化。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曹风·蜉蝣》）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桧风·隰有苌楚》）

（3）借代

借代亦称“换名”。《诗经》中的借代，往往以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地名或其所着衣物代称之。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卫风·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

（4）夸张

《诗经》中运用夸张之处甚多，其方式或极力扩大，或尽量缩小，都用得恰到好处。

崧高维嶽，骏极于天。（《大雅·崧高》）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大雅·假乐》）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大雅·云汉》）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鲁颂·泮水》）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大雅·绵》）

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刘勰《文心雕龙·夸饰》）

（5）衬托

衬托的作用，在于突现正面或反面的人或物，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或用旁衬，或用反衬，都是为了突出所写的中心。《诗经》作者深得此道，用得颇为成功。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鄘风·相鼠》）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邶风·谷风》）

（6）对比

《诗经》作者善于从鲜明的对比中，深刻揭示问题的实质，表

现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卫风·氓》）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同上）
其室则迩，其人甚远。（《郑风·东门之墠》）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王风·兔爰》）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小雅·大东》）

（7）对偶

《诗经》中的对偶乃出于自然，并非强为之者；但其立意之妙，对偶之工，不能不令人赞叹。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邶风·柏舟》）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鄘风·鹑之奔奔》）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小雅·伐木》）
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大雅·抑》）

（8）引用

引用前人之言入诗，无异于将前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予以诗化，从而为诗作增光。《诗经》中引用之例虽不多，但深得引用之妙。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大雅·板》）
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

（9）拟声

《诗经》中颇多拟声之词，其特点是惟妙惟肖，颇有传神之妙。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

坎坎伐檀兮。(《魏风·伐檀》)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小雅·鹿鸣》)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10) 排比

《诗经》中不乏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相关的排比句。排比之用，增强了诗歌的语势，有助于情感的抒发。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小雅·天保》)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同上)

(11) 层递

《豳风·七月》一诗，按时序的递进叙事状物，即成功地运用了层递的修辞手段。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七月》)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同上)

(12) 辞格的连用和兼用

在《诗经》作品中，修辞手法的运用不是孤立的，往往呈现出综合运用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辞格的连用和兼用。如《卫风·硕人》第二章，描绘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即连用比喻、对偶，又兼用排比；《小雅·北山》之四、五、六章，连用排比、对比；《鄘风·柏舟》第三章，则既连用比喻，又兼用排比、对偶。修辞格的综合运用，体现了《诗经》作者高度的语言艺术功力。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第二章)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邶风·柏舟》第三章)

5. 和谐的韵律

《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是节奏鲜明、韵律和谐，富于音乐美。但这非出人为，而是成于自然。在这自然而然形成的和谐音韵中，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诗经》的和谐韵律无疑是伟大的艺术创造，它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取法的艺术典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
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寐寤歌，永矢弗过。
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寤宿，永矢弗告。(《卫风·考槃》)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郑风·清人》)

子之还兮，遭我乎猺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猺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猺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齐风·还》)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齐风·著》)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懆)兮。(《陈风·月出》)

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

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兮。

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桧风·素冠》）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夫诗必有韵，诗之致也。《毛诗》之韵，不可一律齐也。盖触物以摅思，本情以敷辞。从容音节之中，宛转宫商之外。如清汉浮云，随风聚散，蒙山流水，依坎推移，斯其所以妙也。……总之，《毛诗》之韵，动乎天机，不费雕刻，难与后世同日论矣。（陈第《毛诗古音考》卷前附《读诗拙言》）

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古诗用韵之法》）

里谚童谣，矢口成韵，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犹能知之协之也。（江永《古韵标准例言》）

《三百篇》者，古音之丛，亦百世用韵之准。稽其入韵之字，凡千九百有奇：同今音者十七，异今音者十三。（同上）

二 《诗经》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经》不仅占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以至罩上神圣的光圈，以掩盖它的本来面目，利用它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但这都掩没不了它自身的光辉。《诗经》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屹立于2500年前那个特定时代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理所当然地成为后世诗人、作家崇奉、仰慕的典范。由《诗经》所奠定的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

一代进步的诗人、作家，开拓了一条我国古代文学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它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优美、和谐的语言艺术，为后世诗人、作家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启发和昭示他们沿着《诗经》所开拓的道路前进，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刘勰《文心雕龙·乐府》）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同上）

（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钟嵘《诗品》卷上《古诗》）

（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魏陈思王植》）

（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洋洋乎会于《风》《雅》。（钟嵘《诗品》卷上《晋步兵阮籍》）

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

《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李白《古风》其三十五）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六）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白居易《新乐府序》）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元稹《乐府古题序》）

东、西二京，人文勃郁。韦孟诸篇，无非二《雅》；枚乘众作，亦本《国风》。迨夫建安、黄初，云蒸龙奋。陈思藻丽，绝世无双，揽其四言，实《三百》之遗。（胡应麟《诗薮》）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刘熙载《艺概·诗概》）

李（白）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同上）

乐府之出于《颂》者，最重形容。（同上）

乐府有陈善纳诲之意者，《雅》之属也，如《君子行》便是。（同上）

后世乐府近《风》之体多于《雅》、《颂》，其由来亦已久矣。（同上）

第四章　史家之文

我国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大概至迟在商代，便已设立了专司记事的史官。史家记事之文绵绵不绝，日益发展。自殷商迄战国，史家之文从类同甲骨卜辞的钟鼎彝器铭文发展到洋洋大观的史传散文，由简而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为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记人、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

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周礼　春官》）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同上）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同上）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

第一节《尚　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这部文献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资料，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兼记叙和论说的散文集。它为后代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尚书》的名称及其性质

1．《尚书》的名称

《尚书》原本称《书》，汉代以后被列入儒家主要经典"五经"之一，故又称《书经》。一般认为，"尚"与"上"通，所谓《尚书》即"上古之书"。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荀子·君道》)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颜师古注曰："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汉书·武帝纪》)

《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王充《论衡·须颂篇》)

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孔颖达疏)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2. 《尚书》的性质

《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其所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乃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政府的文告，主上的誓言，君王的命令和贵族的诫词。

（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书》者，政事之纪也。（《荀子·劝学》）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

《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汉书·艺文志》）

《书》以广听，知之术也。（同上）

《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刘知几《史通·六家》）

《书》似乎是"三代"时候底"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但我颇疑心它并没有成书。凡春秋或战国时人所引《夏志》、《周书》等等，和现在所谓《逸周书》者，都是这一类的东西。……还有一层，《周书》即无伪篇，也只是粉饰作伪的官样文章，采作史料必须慎之又慎。（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中编）

《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是称六体。然其中有《禹贡》，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二）关于《尚书》的编订成书

今本《尚书》包括所谓虞、夏、商、周之书，旧说原有100篇，

乃经孔子所编纂，并为之序，言其作意，此说实不足信。《尚书》是汇编而成的典籍，它辑录了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在流行的过程中，难免有所增益删改。其成书年代难以确考，但在《国语》、《左传》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已见称引，或直称《书》，或称《虞书》、《夏书》、《殷书》、《周书》，或只引篇名，可见此书在先秦时以多种形式广为流传，非止一种，其文字也不尽一致。至于由何人辑为定本，亦难确知。孔子也许是"编次其事"者之一，但未必是最后的定稿者。而且此书即使当时有定本，那定本也可能非止一种。

1. 所谓《尚书》经由孔子编纂之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孔子世家》)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籑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

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王充《论衡·正说篇》)

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王充《论衡·须颂篇》)

《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刘知几《史通·六家》)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以

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

2. 先秦典籍称引之例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盘庚》曰："国之臧，则惟女众。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国语·周语上》）

《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济也。"（《国语·周语中》）

《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国语·周语中》）

《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左传·文公十八年》）

《周书》曰："惠不惠，茂不茂。"（《左传·昭公八年》）

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左传·昭公十七年》）

《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

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墨子·七患》）

《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贤中》）

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皇帝清问下民，有辞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德威维威，德明维明。'……"（同上）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孟子·梁惠王上》）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孟子·梁惠王下》）

《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

《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孟子·万章下》）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荀子·劝学》）

《诗》、《书》故而不切。（同上）

《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

（三）关于《尚书》今、古文之分

从汉代以来，《尚书》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是秦始皇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故秦博士济南伏生所保存、传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有28篇。古文《尚书》则是汉武帝时陆续发现，因用秦汉以前的"古文"书写，故名。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后皆亡逸，现仅存篇目，佚文见《汉书·律历志》等。至于今本《十三经注疏》中所载《古文尚书》实属伪造，断不可信。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治《尚书》不先考今、古文之别，必至茫无头绪，治丝益棼。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非徒争门户也。（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经》）

（今、古文）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皮锡瑞《经学历史》三《经学昌明时代》）

1．今文《尚书》的由来及其传人

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史记·晁错列

传》)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汉书·艺文志》)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汉兴，……言《书》自济南伏生。……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张生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霸、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汉书·儒林传》)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王充《论衡·正说篇》)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卫宏《古文尚书序》)

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遭秦灭学，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隋书·经籍志》)

《书》有今文、古文之异，何哉？晁错所受伏生《书》，以隶写之；隶者，当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书；科斗者，仓颉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真《古文书》不传。(吴澄《书纂言》目录序)

《今文尚书》之传始于伏生，盛于三家，歇于永嘉之乱。(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

2. 古文《尚书》的来龙去脉

古文《尚书》相传为汉武帝末(一说景帝时)发现于孔子住宅壁中，较今文《尚书》多16篇，由孔安国所献。此外，汉代流行的古文《尚书》还有西汉成帝时东莱张霸伪造的百两本和东汉杜林所传的漆书古文本。但在汉代以后，这些古文《尚书》本全都失传了。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列传》)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汉书·艺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

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乃黜其书。(《汉书·儒林传》)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景十三王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书·景十三王传》)

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传见之久，人遂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王充《论衡·正说篇》)

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卫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徐巡）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杜林传》)

初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

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3. 伪古文《尚书》的出现与辨伪

伪古文《尚书》乃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共25篇，与伪《孔安国尚书传》同时出现。此书除所谓孔安国自序外，又将伏生本今文《尚书》28篇分为33篇，并入其中，合为46卷、58篇献上朝廷。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为此本。唐初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修五经正义，于《尚书》独采此本，并经当时政府颁布发行，于是此本大行于天下。自宋吴棫、朱熹始疑其伪，至明梅鷟作《尚书考异》，定其为伪作。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惠栋作《古文尚书考》，终于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宣告了梅赜所献25篇所谓古文《尚书》全属伪作，所谓孔安国之《传》、《序》亦属伪作。因此，我们现在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28篇。

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隋书·经籍志》)

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按：今唐修《晋书》无此文)。(《尚书正义》卷二孔颖达疏)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本题汉孔安国传。其书至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奏于朝，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等为之疏。……《孔传》之依托，自朱子以来递有论辩，至国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其事愈明。(《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一)

古文之伪，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二)

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棫始发其覆，朱子继之，……其后吴澄、归有光、梅鷟愈推愈密，……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尚书余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皮锡瑞《经学通论》一《书经》)

(四)《尚书》的时代

伪古文《尚书》出于东晋，乃后人所伪造，断非先秦之作。至于今文《尚书》28篇，作为先秦古籍，是可信的。一般认为，其商、周之书虽也难免经过后人损益，但较为可靠；至于所谓虞、夏之书，恐系春秋战国时人所作，并非真正的虞、夏之书。尽管如此，因其时去古未远，且其记述必有所据，并非凭空杜撰，故亦值得重视。

28篇的前4篇——《尧典》(包括今本《舜典》)、《皋陶谟》(包括今本《弃稷》)、《禹贡》、《甘誓》——向来叫做《虞夏书》，一般人以为不是唐、虞史官不能做得那么好，一二学者却因此发生了莫大的怀疑。……其实我们只根据那篇首一句，认做后人追述的便好了。……那四篇是周人追述的。把时代移后了2000年，却不曾指摘某篇是伪书。

28篇除了前四篇以外，从《汤誓》到《微子》叫做《商书》，从《牧誓》到《秦誓》叫做《周书》，真伪绝无问题，年代可照向来的说，分明看做商、周的作品。(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中如《汤誓》，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至《商书》中之《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之《牧誓》、

《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诸篇，皆当时所作也。（王国维《古史新证》）

《书》似乎是三代时候底"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因为它常常被人称引，于是"托古"的人们不免要来伪造了。现在的28篇中，有历史底价值的恐怕没有几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中编）

在现今传存的《尚书》中，所谓《虞书》和《夏书》都是战国时的儒者假造的，已经成为了定论。就是《商书》，除掉殷末的几篇而外，也都大有问题。……凡是殷代的旧有的典籍如果有对至上神称天的地方，都是不能信任的东西。那样的典籍在《诗经》中有《商颂》，在《尚书》中有《商书》。……除掉《微子》和《西伯戡黎》的两篇是在《卜辞》的年代范围以外，其余的都是不能相信的。……《高宗肜日》一篇也是不可信的。……《洪范》那篇文章其实是子思氏之儒所作的，其出世的时期在《墨子》之后和《吕氏春秋》之前。……关于天的思想周人也是因袭了殷人的。周初的彝铭《大丰簋》和《大盂鼎》，和《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等11篇，以及《周颂》的前几章都是很明显的证据。……这两项彝铭可以说是第一等的证据，因为在铭词中自己表明了自己的年代，便是前者是武王时代的，后者是康王时代的。我们根据着这两个证据，同时可以安心着信赖《周书》中的十几篇和《周颂》，虽然免不了是有些讹变和脱佚，但大体上是周初的文章，因为它们的文笔和思想都相同。（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二 《尚书》的思想特点

今文《尚书》28篇，按时代区分，包括所谓"虞书"、"夏书"各2篇，"商书"5篇和"周书"19篇。时代跨度颇大，内容相当丰富，其记事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但就其思想倾向看来，则主要反映了奴隶社会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从《尚书》的记载中，不难看出这一政治观念的

演变过程。可以认为，神权政治观念基本上构成了《尚书》的思想核心。此外，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借鉴前代的统治经验，也是《尚书》的一大思想特点。

（一）由"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的政治观念的演变

《尚书》所反映的神权政治观念，大体可分商、周两个阶段。在殷商时代，主要强调天命神授，认为"天"和"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天子是代天行令的人，因而极端崇尚天帝神权，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周代，由于殷王朝的被推翻，现实的斗争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因而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重视并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即上天意志的体现，"敬德"亦即"敬天"。与此同时，周初统治者还提出了"罚"，以所谓"明德慎罚"作为"敬天保民"的补充。这在《周书》中反映较为突出，体现了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

1. 殷商统治者崇尚天帝神权，强调"天命神授"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书·汤誓》）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同上）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同上）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商书·盘庚上》）

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同上）

予迓续乃命于天。（《商书·盘庚中》）

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同上）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商书·盘庚下》）

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商书·高宗肜日》）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天弃我，……天曷不降威？……"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商书·西伯戡

黎》)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商书·微子》)

殷时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的时候又称为"天"。……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上帝能够命令，上帝有好恶，一切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都是由天所主宰，这和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但这殷人的神同时又是殷民族的宗祖神，便是至上神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郭沫若《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2. 周代统治者修正传统宗教神学，提出所谓"敬德保民"与"明德慎罚"

王若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周书·大诰》)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敬明乃罚。……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周书·康诰》)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周书·酒诰》)

予罔厉杀人。……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书·梓材》)

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周书·召诰》)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周书·多士》)

周公若曰："君奭，……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周公)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周书·君奭》)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周书·立政》)

王曰："……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于五极。咸中有庆，受王嘉师，监于兹祥刑。"(《周书·吕刑》)

(二)重视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前代统治经验

《尚书》思想内容的另一大特点是重视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在《周书》中反映尤为突出。周代统治者从殷末周初的动乱中吸取了教训，增长了见识，并认真思考了前代盛衰兴亡的原因，自觉地借鉴其经验教训。他们不仅产生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新的政治观念，而且提出了用人、理政的原则、方法和勤勉治国、力戒安逸享乐的主张。这些观念、原则和主张，对后代都有较大的积极影响。

王曰："……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周书·康诰》)

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书·酒诰》)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书·召诰》)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

于帝之迪，乃尔攸闻。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今至于尔辟，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呜呼！……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周书·多方》）

1．借鉴前代经验教训，提出用人、理政的原则

上古时代，特别是夏、殷两代，在用人与理政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记取。《尚书》对此有所反映，特别是《周书·立政》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任人以贤的原则和一系列用人、理政的标准和方法。较之前人，显然是一大进步。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虞书·皋陶谟》）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商书·盘庚上》）

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周书·洪范》）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

"呜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乂。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

书·立政》)

2. 吸取前代兴亡的教训，提出勤勉治国、力戒逸乐的主张

《周书》多讲历史经验，多讲民生疾苦，重视以古鉴今，强调勤勉无逸，其思想深度高于《商书》。这样的思想内容，在《酒诰》、《无逸》等篇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周书·康诰》)

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在今后嗣王酣身，……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周书·酒诰》)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周书·无逸》)

三 《尚书》的文学价值

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尚书》远远说不上是文学作品；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尚书》中确实存在不少文学的因素。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集，其本身就具有奠基的意义。更何况《尚书》的文章独具特色，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启发意义，其价值是不

容忽视的。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刘知几《史通·断限》）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

《易》、《诗》、《书》、《仪礼》、《春秋》……皆圣贤明道经世之书。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世文章，从是出焉。（李耆卿《文章精义》）

（一）体现了初步的艺术技巧和一定程度的形象性

《尚书》的文章已具有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虽为"记言"之作，却并不显得单调。它在一些篇章中还适当地使用了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段，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此外，它那古朴质实的文章风格，也是独具特色的。

1. 多样的表达方式

《尚书》之文运用了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并且各有特点。

（1）记叙

《尚书》中不乏记叙之文，其特点是简明扼要。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虞书·尧典》）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同上）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盘庚敩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书·盘庚上》）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书·多士》）

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周书·顾命》）

（2）描写

《尚书》中亦有描写之文，虽用笔不多而颇见生动。

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虞书·皋陶谟》）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周书·牧誓》）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周书·金縢》）

（3）议论

议论乃《尚书》之所长，大多要言不烦而剀切中肯。

（盘庚）曰："我王来，既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商书·盘庚上》）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周书·酒诰》）

（4）抒情

抒情之笔亦见于《尚书》，皆直抒胸臆而富于感染力。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周书·无逸》）

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周书·君奭》)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即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周书·顾命》)

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周书·秦誓》)

2. 适当的修辞手段

《尚书》的一些篇章已能适当运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段，以增强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其取譬设喻贴近现实，富于生活气息；排比的特点则是简古紧凑，大体整齐而又错落有致。

(1)比喻

《尚书》之文颇善运用比喻，其特点是通俗生动，生活气息浓烈。

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商书·盘庚上》)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同上)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同上)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同上)

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商书·盘庚中》)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周书·牧誓》)

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周书·大诰》)

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周书·康诰》)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周书·梓材》)

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厥若。(《周书·洛诰》)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周书·君奭》)

(2)排比

《尚书》中颇多排比之句，紧凑整齐而错落有致，好似一气呵

成。

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虞书·皋陶谟》）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同上）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夏书·禹贡》）

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书·无逸》）

3. 质朴的文章风格

《尚书》文章，风格质直古朴。其文多属"记言"，往往直抒胸臆，慷慨陈词，不事雕琢，亦少藻饰，迥别于后代之文。

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扬雄《法言·问神》）

《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刘知几《史通·六家》）

《书》之记言，非上告下，则下告上也。寻其实质，此类皆论事之文。（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宗经第三》）

其文质朴，亦佶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

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惟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同上）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夏书·甘誓》）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商书·汤誓》）

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商书·盘庚上》）

王曰，又曰："时予！乃或言尔攸居。"（《周书·多士》）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周书·费誓》）

（二）佶屈聱牙的语言特点

文字古奥艰涩，语句拗口难读，即所谓"佶屈聱牙"，是《尚书》文章在语言上的突出特点。词汇的古僻，句法的别扭以及不用或少用虚词和关联词，乃是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标志。

《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

（《尚书》）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难读；平正者经史官之润色，佶屈者记矢口之本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原注：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案《尚书》所记，即当时语言。（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宗经第三》）

《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1. 文字古奥艰涩

底绥 敩 猷黜 起信险肤 王用丕钦 胥及逸勤 世选尔劳 佚罚其惟致告（以上见《商书·盘庚上》）

猷 越尔御事 弗吊 降割 洪惟我幼冲人 大历服 弗造哲迪民康 敷贲 越兹蠢 殷小腆诞敢纪其叙（以上见《周书·大诰》）

厥基永孚于休 遏佚 庸释 格于皇天 矧曰奔走 用乂厥辟 咸刘厥敌 迪见冒收罔勖不及 耉造德不降 肆其监于兹 无疆惟休 猷裕在亶 弗戡 笃棐时二人 丕冒（以上见《周书·君奭》）

2. 语句拗口难读

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商书·盘庚上》）

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商书·盘庚下》）

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同上）

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周书·大诰》）

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周书·康诰》）

（三）古老的文体

《尚书》的文体自成一家。所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实为我国古代散文体式的最早形态。这种文体自春秋末年以后，虽已不在社会上流行，但它对汉代以后的官方文告撰制显然还有影响。在文体发展史上，《尚书》有其特殊的地位。

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

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刘知几《史通·六家》）

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书》体六，今存者三（原注：存者三，诰、誓、命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

或谓文本无体，……殊不知《无逸》、《周官》，训也，不可混于诰；《多士》、《多方》，诰也，不可同于训，此文之体也。（同上）

四　关于《逸周书》

《逸周书》又称《汲冢周书》，原名《周史记》、《周书》，是一部与《尚书》相类的散文著作。此书内容驳杂，可谓杂史；其文亦自具特点，有一定文学价值。

《周书》七十一篇（原注曰：周史记）。（《汉书·艺文志》）

《周书》十卷（原注曰：《汲冢书》，似仲尼删《书》之余）。（《隋书·经籍志》）

又有《周书》者，（浦起龙注：谓世所传《汲冢周书》）与《尚书》相类。（刘知几《史通·六家》）

（一）成书及时代

关于《逸周书》的成书及时代，历代学者所论不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此书乃战国时期的拟古之作，且系纂辑而成之书，并非出于一人一时。名为《周书》，除较为集中地记载了西周文、武、周公等的有关史实外，却也记有后代之事。但此书基本上属于先秦著作，则是没有疑问的。

《周书》者，……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浦起龙注曰：一误作

"其")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参同。斯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案隋、唐《经籍志》、《艺文志》皆称此书得于晋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称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若此，则晋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刘向及班固所录并著《周书》七十一篇，且谓孔子删削之余。而司马迁记武王克殷事盖与此合，岂西汉世已得入中秘，其后稍隐，学者不道，及盗发冢，乃幸复出邪？篇目比汉但阙一耳，必班、刘、司马所见者也，系之汲冢，失其本矣。书多驳辞，宜孔子所不取。抑战国处士私相缀缉，托周为名，孔子亦未必见。(李焘《逸周书考》)

(《汲冢周书》)晋五经博士孔晁注。……盖以仿孔安国《尚书》，相传以为孔子删《书》所余者，未必然也。文体与古书不类，似战国后人依仿为之者。(陈振孙《书录解题》卷二)

此书(按：指《逸周书》)出汲冢，多类兵书，后多类周诰。然伐商迁雒之事，多与今《尚书》合，而文无一语相合。将战国之士仿而为之欤？然不可晓也。(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二)

观其属辞成章，体制绝不与百篇相似，亦不类西京文字。是盖战国之世逸民处士之所纂缉，以备私藏者。(黄蚧《逸周书序》)

《汲冢周书》甚驳杂，恐非先秦书。意东汉魏晋间诡士所作，反剿《礼记》、《史记》群书以文之。文义古雅者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郑瑗《井观琐言》卷一)

《周书》不出汲冢也。……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于灵王以后。……特战国以后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

(《逸周书》)当仍旧名，不得系之汲冢。……其文辞湛深质古出左氏上，所不必论；若《酆谋》、《世俘》诸篇，……往往夸诞不雅驯，疑衰周战国之士，以意参入之。(姜士昌《逸周书序》)

《周书》之作，盖在战国秦汉之间。(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之三)

愚观此书，虽未必果出文、武、周、召之手，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

《逸周书》若干篇，真赝参半，然其真之部分，吾侪应 认为与《尚书》有同等之价值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二)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逸周书》虽说与《尚书》相类，但实际上却有所不同；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二者都颇有差异。此书原为71篇，今存者并《序》实为60篇。其文长短不等，文体不一，内容和思想驳杂。有的篇章夸饰怪诞，颇类传说，具有一定文学价值。其内容的扩大和文风的特点体现了史家之文的发展。

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条下颜师古注)

今按：自《度训》至《器服》，凡七十篇，合《序》为七十一篇，中亡《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考德》、《月令》共十一篇。尚存六十篇。(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志第十卷·艺文志》)

其书存者五十九篇，并《序》为六十篇，较《汉志》篇数，亡其十有一焉。注之者晋五经博士孔晁，每篇题云，某某解弟几，此晁所目也，旧但云某某第几。(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

1. 内容和思想驳杂

《逸周书》主要记载周代史实，特别是关于西周文、武、周公等的言论、事迹，有较为突出的记述。如《大匡》、《程典》、《酆保》、《大开》、《小开》、《文儆》、《文传》、《克殷》等等篇章，都是周代史实的记述。但除此而外，也有政论文章，如《度训》、《命训》、《常训》、《文酌》等；还有论兵法之文，如《大明武》、《小明武》等；至于谥法、祭祀、天文、节令、地理山川、车服制度等亦有所记述。这些文章的思想倾向也不尽一致，明显地呈现出“杂”的特点。

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上失其道，民散无纪，西伯修仁，明耻示教，作《文酌》。……文王在酆，命周公谋商难，作《酆保》。……周将伐商，顺天革命，申谕武义，以训乎民，作《武顺》、《武穆》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车三百五十乘以灭殷，作《克殷》。……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辨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车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于焉大备。（《逸周书·周书序》）

《周书》者，……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刘知几《史通·六家》）

世所传《逸周书》者，……其书虽颇有格言明义，或本于圣贤，而间杂以道家、名、法、阴阳、兵权谋之旨。……殆非儒者所道。校书者宜出之六艺，入之杂家，乃为当耳。（姚鼐《辨逸周书》）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中》）

《克殷》篇所叙，非亲见者不能。《商誓》、《度邑》、《皇门》、《芮良夫》诸篇，大似今文《尚书》，非《伪古文》所能仿佛。……《酆保》为保国之谋，《武称》著用兵之难，《常训》之言性，《文酌》、《文传》之言政，俱不悖于孔、孟。而说者或诮为阴谋，或讥其偾戾，呜呼！岂知是书者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

2. 文章自具特点，较前有所发展

《逸周书》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较之《尚书》有所扩大，而且其文章本身亦较《尚书》有所发展。尽管此书各篇文章体制不一，文学价值亦参差不齐，一些文章内容粗略，文字枯燥乏味，无甚可取；但确有一些文章或议论剀切，或记叙生动，颇具形象性，感染力较强。有的曾被认为“怪诞”之作，如《太子晋》、《程寤》等，颇类

传说，实含小说因素，具有较浓重的文学色彩。正是这些文章，体现了史家之文在《尚书》基础上的发展。

（1）议论剀切，记叙生动

《逸周书》中颇多说理之文，且不乏议论剀切明畅者。如《史记》篇历陈前代兴亡教训，《常训》篇论述明王立政奉法，都已较《尚书》同类文章有所发展。至于《命训》、《酆保》、《文传》等篇，已颇似战国后期文章；其遣词命意，与《荀子》、《韩非子》之文多有相似之处。书中以记叙为主的文章亦颇有特色，如《职方》篇分述各方地理物产，与《尚书》中相类之文《禹贡》有所不同。《克殷》篇则记叙生动，颇具形象性和感染力，是一篇较为出色的文章。

其文辞湛深质古出左氏上，……吾观《文传》、《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时训》、《官人》、《王会》、《职方》诸篇，其陈典常，垂法戒，辨析几微，铨叙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浅闻之士所能仿佛者。（姜士昌《逸周书序》）

（《逸周书》）上翼六经，下笼诸子，宏深质古，……辞特深奥。（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

福莫大于行义，祸莫大于淫祭，丑莫大于伤人，赏莫大于信义，让莫大于贾上，罚莫大于贪诈。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万民，民用而不失。……以赏从劳，劳而不至；以法从中则赏，赏不必中；以权从法则行，行不必以知权。权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终。（《逸周书·命训》）

内备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四蠹：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说以服之，三群巧仍兴以力之，四神巫灵宠以惑之。……呜呼敬哉！视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不修，国乃不固；务周四蠹、五落、六容、七恶，不时不允，不率不绥，反以自薄。（《逸周书·酆保》）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人君之行，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䠗，以成鸟兽之长。……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

失其时。……人各修其学，而尊其名，圣人制之。……无杀夭胎，无伐不成材，无堕四时，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积者王，有五年之积者霸，无一年之积者亡。……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则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逸周书·文传》)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大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逸周书·克殷》)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鸡狗鸟兽，其谷宜稻。……(《逸周书·职方》)

(2)颇多夸饰，类于传说

《逸周书》中还有一些文章，如《太子晋》、《世俘》、《王会》、《程寤》(逸文)以及《克殷》等篇，其记述颇多夸饰之辞，有如传说故事。此类文章，实含小说因素，带有创作性质，乃属文学色彩较浓者。

其书载有太子晋事。……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太白，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

若《酆谋》、《世俘》诸篇，记武王谋伐殷，与克殷俘馘甚众，往往夸诞不雅驯。(姜士昌《逸周书序》)

《程寤》、《太子晋》篇，说尤怪诞。(姚鼐《辨逸周书》)

《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今本《逸周书》中惟《克殷》《世俘》《王会》《太子晋》四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余文不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逸周书·太子晋》篇记师旷见太子，聆声而知其不寿，太子亦自知“后三年当宾于帝所”，其说颇似小说家。（同上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一作“魔”、“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逸周书·世俘》）

太子晋行年十五，……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大师将来，甚喜而又惧。吾年甚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度。”……师旷束躅（按：原注“孔曰：束躅，踏也。”）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大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王子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逸周书·太子晋》）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逸周书逸文·程寤》）

第二节 《春　　秋》

《春秋》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史实。在先秦史家之文中，它是继《尚书》之后的一部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它不仅是后世编年体史书之祖，而且在散文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玄注：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礼记·玉藻》）

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作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辞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者也。（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

一 《春秋》概说

（一）《春秋》的名称及体例

1. 《春秋》的名称

《春秋》一名，本为周代史书较为通用的名称。鲁国史书即名《春秋》。相传孔子据此修订而成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亦以《春秋》为名，于是《春秋》变为专名。因属儒家所谓"六经"之一，故又称《春秋经》。

……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墨子·明鬼下》）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

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同上）

2．《春秋》的体例

《春秋》开创了编年体的先例。它按鲁国国君"十二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顺序，分年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严格而系统地表现出史实发展的时间关系。它以鲁国为主体，兼及他国。其记事不仅清晰地展现了时代背景，而且揭示了同一时代此一史实与彼一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体例的产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言于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疏）

（二）《春秋》的作者和时代

1．《春秋》的作者

历来认为，孔子是《春秋》的作者。而实际上，今所见《春秋》

乃鲁之《春秋》，为鲁国不同历史阶段之史官集体所撰。孔子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加工修订，使之成为授徒的教本，从而开创了私家著述的先例。因此可以说，《春秋》是孔子依鲁史修订而成的著作。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

仲尼厄而作《春秋》。(《汉书·司马迁传》引司马迁《报任安书》)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汉书·司马迁传赞》)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己丑卒。(《史记·孔子世家》)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庚子，孔子生。(《春秋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

《公》、《谷》全体释经，此言何以入传？当由二家经师附记于旁，后乃误入正文尔。其始附于二十二年"公会诸侯于沙随"之下，一本误脱，而误补于二十一年"公会诸侯于商任"之下，上文相似，易于致误。一本误，则各本皆误；一传误，则二传并误。正当引《史记》以纠二传，岂应信《公》、《谷》以难《世家》耶？（崔适《史记探源》卷六《三十世家·孔子世家》）

2. 《春秋》的时代

《春秋》既经孔子修订而成，自然应属孔子时代。一般认为，《春秋》应为孔子晚年之作。按"绝笔于获麟"之说，则《春秋》成书当在孔子逝世前二年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钼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孔子世家》)

公羊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徐彦疏)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年代问题，开头就已讲明是孔子做的，当然就是孔子时代。但孔子编的书，到何时才成功，向来说"绝笔于获麟"，那么，《春秋》是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纪前481年成书的。……我们比较的还是相信获麟绝笔之说为佳。(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二 《春秋》的特点

《春秋》不仅开创了编年之体，而且其内容、叙事、语言都很有特点，明显地较《尚书》有了新的发展。

(一)内容："微言大义"

《春秋》既经孔子修订而成，必然体现孔子的思想倾向。具体而言，便是遵循周制，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反对"邪说暴行"，志在"拨乱世反之正"。这种鲜明的政治意图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便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

是以孔子明王道，……兴于鲁而次《春秋》，……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

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君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刘知几《史通·惑经》）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一作"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刘知几《史通·六家》）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刘知几《史通·曲笔》）

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

（二）叙事：简要严谨

《春秋》叙事"简而有法"，既简明扼要，又谨严有方，历来被文章家奉为典范。这一特点，不同于《尚书》的"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刘知几《史通·六家》）。这不仅是私家著述简练有序的体现，而且是在写作上已有了长足进步的明显标志。

是以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而劝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辩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

龟镜。(刘知几《史通·叙事》)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同上)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同上)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

孔子的《春秋》文章简单，年代明瞭，许是一种创作，前此没有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三)语言：凝练含蓄

《春秋》不过18000余字，却记载了242年的史实，其语言之凝练含蓄，历来为人称道。《春秋》叙事的简要严谨，实亦得力于此。所谓"一字褒贬"，即《春秋》语言特点的集中体现。与《尚书》语言相较，《春秋》已明显地由"佶屈聱牙"一变而为明白晓畅，标志着散文的发展和进步。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春秋经·隐公元年》)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隐公元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春秋经·僖公十六年》)

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六年》)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春秋经·定公二年》)

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春秋公羊传·定公二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鹢之辞是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春秋》)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范宁《春秋谷梁传序》)

《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刘知几《史通·叙事》)

《春秋》立义至精，辞极简严而不赘也。(胡安国《春秋传·隐公四年》)

《公羊传·鲁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可见不修的《春秋》和已修的《春秋》是不同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极力恭维《春秋·鲁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和"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一段的妙笔，虽未引不修的《春秋》原文，但可知孔子笔削是很用心不苟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第三节 《国　　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也是《春秋》之后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从散文的发展看来，作为史家之文，《国语》自具特点，较《尚书》和《春秋》又有了一些新的进步。

一 《国语》概说

（一）作者及成书

《国语》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不可确知。尽管历来相传此书是春秋时期与孔子同时或稍前的左丘明所作，但不少学者持有异议。实际上，此书乃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一地。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国语》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它可能与左丘明的传诵有一定关系，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排比润色，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写成书。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见《汉书·司马迁传》所引司马迁《报任安书》）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汉书·艺文志》）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

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其渊原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韦昭《国语解叙》）

《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又多乖刺，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以广异闻耳。（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陆淳谓（《国语》）与《左传》文体不伦，定非一人所为，盖未必然。范宁云："左氏富而艳"，韩愈云："左氏浮夸"；今观此书，信乎其富艳且浮夸也，非左氏而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

今考二书（按指《国语》、《左传》）虽相出入，而事辞或多异同，文体亦不类，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今《国语》避汉讳，谓鲁庄严公，又果左丘明之作否耶？（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二）

《国语》出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说为近古。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迄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合。中有与《左传》未符者，犹《新序》、《说苑》同出刘向，而时复牴牾，盖古人著书各据所见之旧文，疑以存疑，不似后人轻改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

《国语》作自何人，说者不一，然终以汉人所传左丘明作为有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五)

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吾谓不然。……若《国语》所载，亦多为《左传》采录，而采之非必丘明也。又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

《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卷之三)

(二)名称和体例

1. 名称

《国语》分别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史事，而以记言为主，故名为《国语》。有人认为，《国语》与《左传》同一作者，而《左传》乃传《春秋》之书，故称之为《春秋内传》，而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其实，二书作者既非一人，内容亦自成体系，各为一家，故所谓内、外传之称，显然不妥。

《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汉书·律历志》)

《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同上)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王充《论衡·案书篇》)

《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刘熙《释名·释典艺》)

(《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韦昭《国语解叙》)

案《国语》二十一篇，《汉志》虽载《春秋》后，然无《春秋外传》之名也。《汉书·律历志》始称《春秋外传》。王充《论衡》云："《国语》，《左氏》之外传

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刘熙《释名》亦云："《国语》亦曰《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考《国语》上包周穆王，下暨鲁悼公，与《春秋》时代首尾皆不相应，其事亦多与《春秋》无关，系之《春秋》，殊为不类。至书中明有《鲁语》，而刘熙以为外国所传，尤为舛迕。附之于经，于义未允。《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左史之遗。今改隶之杂史类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

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卷之三)

《史记》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辞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同上)

《国语》载列国君臣朋友相论语，故谓之"语"。(董增龄《国语正义·国语叙疏》)

2. 体例

《国语》始创国别史之体。全书共21卷，分国记载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越(2卷)八国的史事。它上起周穆王，下迄鲁悼公，包括的时代大体为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约前967—前453)。

《国语》家者(浦起龙释：此是国别家，惟分封分割之代有之。)，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班固《艺文志》有《国语》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书篇次与《汉志》同。盖历代儒者析简并篇，互有损益，不足疑也。要之，《艺文志》审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

二 《国语》的思想特点

《尚书》多载训诫之文，《春秋》多寓褒贬之言，《国语》则多记教诲之语。其目的虽然都在善善恶恶，最终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其所记者大都是从中能够引出某种教训的言和事。较之“政府档案”般的《尚书》训诫之文和专于客观史实的笔录中寄寓褒贬的《春秋》之文，《国语》在继承的前提下显然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国语》在思想内容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重民”、“尚礼”、“崇德”等。《国语》的思想观念固然不纯，但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倾向。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国语·楚语上》）

（一）重　　民

《国语》在讲民、神关系时，基本上是民神并重而先民后神；在讲君、民关系时，则是以民为主。这种“重民”的思想特点，较之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由“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1. 民神并重，先民后神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于民？”

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国语·周语

上》)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对曰："……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内史过归，以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以逞其违，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国语·周语上》)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共祀。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国语·鲁语上》)

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周语中》)

2. 论及君民，以民为主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周语上》)

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

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国语·鲁语上》）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外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国语·楚语上》）

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国语·楚语下》）

子西叹于朝，蓝尹亹曰：“……今吾子临政而叹，何也？”子西曰：“阖庐能败吾师。阖庐即世，吾闻其嗣又甚焉，吾是以叹。”对曰：“子患政德之不修，无患吴矣。夫阖庐……朝夕勤志，恤民之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是故得民以济其志。今吾闻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纵过而翳谏，……夫差先自败也已，焉能败人！子修德以待吴，吴将毙矣。”（《国语·楚语下》）

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汙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国语·周语下》）

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国语·周语中》）

（二）尚　礼

所谓“礼”，乃指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包括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等。《国语》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尚礼”思想，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体现了它的基本倾向。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闑门与之言，皆不踰阈。……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国语·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闻之曰："季氏之妇可谓知礼矣。爱而无私，上下有章。"(同上)

襄公曰："……夫仁、礼、勇，皆民之为也。……奉义顺则谓之礼，……"(《国语·周语中》)

靡笄之役也，郤献子伐齐。齐侯来，献之以得殒命之礼，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礼，为君之辱，敢归诸下执政，以整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礼，矜其伐而耻国君，其与几何！"(《国语·晋语五》)

赵文子为室，斲其椽而砻之，张老夕焉而见之，不谒而归。文子闻之，驾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对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侯砻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备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何敢以告。"……(《国语·晋语八》)

过卫，卫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礼焉。宁庄子言于公曰："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国语·晋语四》)

(负羁)对曰："臣闻之：……礼宾矜穷，礼之宗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同上)

公孙固言于襄公曰："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谘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礼矣。树于有礼，必有艾。《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同上)

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国语·鲁语上》)

(三)崇　德

《国语》重在教诲，故其所记，多与国之兴衰或事之成败密切相关，富于政治色彩。这就意味着，自春秋以来，史家已能比较自觉地借鉴历史的经验，通过有选择的史事的记述，借以表达或暗寓自己的一些观点。《国语》一书，不仅反映了鲜明的"重

民”、“尚礼”思想，而且还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崇德”倾向。所谓“崇德”，即推崇高尚的伦理道德，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据《国语》看来，国君的品德修养如何，乃是决定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一大关键，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国语》中记有不少关于“忠、信、仁、义、智、勇、孝、惠”之类较为系统的品德观念的论述，这不仅标志着在道德伦理观念上较之商周时代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折射出春秋以至战国时期已然“礼崩乐坏”、“君德浅薄”的鲜明时代特征。

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战国之时，君德浅薄。（刘向《战国策书录》）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若民不怨而财不匮，令不偷而动不携，其何事不济！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节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国语·周语上》）

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

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象

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且夫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耸，成也；言无远，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国语·周语下》)

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国语·周语下》)

栾武子欲战，范文子不欲，曰："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称晋之德，诸侯皆叛，国可以少安。……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国语·晋语六》)

(范文子)曰："……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墉也，其坏也无日矣。"(同上)

国大而有德者近兴。(《国语·郑语》)

齐桓、晋文……心类德音，以德有国。(《国语·楚语上》)

三 《国语》的文学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国语》具有不小的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展现了那个时代政治变化的轮廓。它虽以记言为主，但也注意写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的精神面貌。较之《尚书》与《春秋》，《国语》显然已大有进步。此外，《国语》在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不乏虚构和想象；文章的结构也有所创新；其语言大体平实畅达，风格则不尽一致。这些特点，体现了史家之文的新的发展。虽然总的看来，《国语》的文学成就尚不及《左传》，但其少数篇章则又有所过之。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国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柳宗元《非国语序》)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昔左氏罗集国史实书以传《春秋》，其释丽之余，溢为《外传》，实多先王之明训，自张苍、贾生、马迁以来，千数百年，播诵于艺林不衰。世儒虽以夸浮阔诞者为病，然而文辞高妙精理，非后之操觚者可及。（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黄省曾语）

（《国语》）其所著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高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班班详核，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弛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王世贞语）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节"也。（刘熙载《艺概·文概》）

（一）长于记言，言中见人

《国语》重在记言，也长于记言。与同以记言为主的《尚书》相较，《国语》以能于记言中见人取胜。它不仅叙及300多个人物，远非《尚书》可比；而且在其所叙人物中，已有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感人形象。如《晋语》中的重耳、骊姬、子犯，《吴语》中的夫差，《越语》中的勾践，便颇富文学色彩。《国语》在人物描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显示了它的文学价值。

1. 重耳的形象

晋文公重耳，是《国语》中着墨较多的一位重要人物。作者通过一连串若断若续的小故事，把人物置于矛盾斗争之中，揭示其性格特征和成长历程，出色地描绘了一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围绕重耳这一中心人物，作者还描写了其妻姜氏、其舅父子犯的形象，虽着墨不多，但颇为传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狐偃(按即重耳之舅子犯)曰："无卜焉。夫齐、楚道远而望大，不可以困往。……若以偃之虑，其狄乎！夫狄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今若休忧于狄，以观晋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乃遂之狄。(《国语·晋语二》)

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日，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著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皆以为然，乃行，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遂适齐。

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而已矣。曰："民生安乐，谁知其他？"

桓公卒，孝公即位，诸侯叛齐。子犯知齐之不可以动，而知文公之安齐而有终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与从者谋于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言于公子曰："从者将以子行，其闻之者吾以除之矣。子必从之，不可以贰，贰无成命。《诗》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先王其知之矣，贰将可乎？子去晋难而极于此。自子之行，晋无宁岁，民无成君。天未丧晋，无异公子。有晋国者，非子而谁？子其勉之！上帝临子，贰必有咎。"

公子曰："吾不动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君国可以济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公子弗听。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

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礼享之，……既飨，楚子问于公子曰："子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公子再拜稽首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旄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又何以报？"王曰："虽然，不谷愿闻之。"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载璧，曰："臣从君还轸，巡于天下，怨其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质。(《国语·

晋语四》)

2. 夫差的形象

吴王夫差也是《国语》中描写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作者写夫差刚愎自用，不听诤言，一意孤行，终于由盛而衰，自取灭亡，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与此相对，作者还成功地描写了诤臣申胥的形象，两相映照，互为衬托，使得夫差形象更为突出。作者对夫差自杀前的一番描写，显然对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项羽之死有所启发。

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越之在吴，犹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败吴，于其心也㤤然，服士以伺吾间。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王其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今王将很天而伐齐，夫吴民离矣。体有所倾，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王其无方收也。越人必来袭我，王虽悔之，其犹有及乎？"

王弗听。十二年，遂伐齐。齐人与战于艾陵，齐师败绩，吴人有功。……

吴王还自伐齐，乃讯(按：一说当为"谇")申胥曰："……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处以念恶，出则罪吾众，挠乱百度，以妖孽吴国。今天降衷于吴，齐师受服。……敢告于大夫。"

申胥释剑而对曰："……今王播弃黎老，而孩童焉比谋，曰：'余令而不违'。夫不违，乃违也。夫不违，亡之阶也。夫天之所弃，必骤近其小喜，而远其大忧。……员不忍称疾辟易，以见王之亲为越之擒也。员请先死。"遂自杀。将死。曰："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鴺，而投之于江。……

于是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三战三北，乃至于吴。越师遂入吴国，围王台。吴王惧，使人行成，……(越王)乃不许成。因使人告于吴王曰："天以吴赐越，孤不敢不受。……寡人其达王于甬句

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辞曰："天既降祸于吴国，不在前后，当孤之身，实失宗庙社稷。凡吴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视于天下！"夫差将死，使人说于子胥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国语·吴语》)

(二)情节结构，有所创新

《国语》全书包括243则长长短短的故实，各含繁简不等的情节。其中尚有不乏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虽曾被责为"荒唐诬妄"，但正是这些"不实"的描写，体现了《国语》在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此外，《国语》因重教诲，其所记载，往往不忘从中引出某种教训，故无论文章长短，大都前因后果记述明白。一些篇章已是线索清楚，层次井然，结构完整，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的发展。

1. 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

于记言中展现故事情节，于情节中糅合虚构与想象，以及一些充满幽默风趣的生动记述，是《国语》在情节构思上的艺术创新。这不仅是《尚书》与《春秋》所无，而且也是《左传》有所不及的。

左氏《国语》，……其说多诬淫。(柳宗元《非国语序》)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参之《国语》以博其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钼麑自杀前之慨叹，……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钼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譟，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钼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孔丛子·答问》篇记陈涉读《国语》骊姬夜泣事，顾博士曰："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博士对

曰："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故凡若晋侯骊姬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可掩焉。"学究曲儒以此塞夥涉之问耳，……骊姬泣诉，即俗语"枕边告状"，正《国语》作者拟想得之，陈涉所谓"好事者为之词"耳。……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

（1）含有虚构和想象的情节

《国语》中记叙的若干情节，分明含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类同"创作"。

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曰："吾闻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宽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谓君惑于我，必乱国，……盍杀我，无以一妾乱百姓。"公曰："夫岂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骊姬曰："妾亦惧矣。吾闻之外人之言曰：为仁与为国不同。……苟利众而百姓和，岂能惮君？以众故不敢爱亲，众况厚之。……凡民利是生，杀君而厚利众，众孰沮之？杀亲无恶于人，人孰去之？……若大难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惧曰："若何而可？"骊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公曰："不可与政。……尔勿忧，吾将图之。"骊姬曰："……君盍使之伐狄，……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若胜狄，则善用众矣，求必益广，乃可厚图也。……君其图之！"公说。是故使申生伐东山，……申生胜狄而反，谗言作于中。（《国语·晋语一》）

灵公虐，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如死。"触庭之槐而死。（《国语·晋语五》）

（2）富于幽默与风趣的故事

《国语》中记述了一些生动活泼的小故事，幽默而风趣，引人入胜。

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按：指重耳)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国语·晋语四》)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国语·晋语九》)

赵简子田于蝼，史黯闻之，以犬待于门。简子见之，曰："何为？"曰："有所得犬，欲试之兹囿。"简子曰："何为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不顺。主将适蝼而麓不闻，臣敢烦当日。"简子乃还。(同上)

2. 文章结构上的发展创造

《国语》旨在说教，而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故其记言叙事，往往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层次清晰，结构完整，这无疑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国语·周语上》)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国语·周语上》)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惧忓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

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

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国语·鲁语下》)

(三)语言畅达，风格不一

《国语》的语言特点是平实自然，明白流畅，不但与《尚书》语言的"佶屈聱牙"大不相同，而且也有别于《春秋》语言的凝练含蓄。其所用词汇大都明白易懂，不像《尚书》似的古奥晦涩；其所用句式也比较贴近口语，很少别扭难读者。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应用，使之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可以说，在平实畅达的语言特点上，《国语》全书是基本一致的。

然而《国语》各篇文章的风格却并不一律。《周语》、《鲁语》颇重文辞，较为典雅，略与《左传》风格近似；《晋语》多记谋略，事胜于辞，且不乏幽默风趣之笔；《楚语》则讲究修饰，文章较有气势。而尤为特异者为《吴语》、《越语》，文笔恣放，描写精彩，刻画战争场面，有声有色，较之他篇，风格迥异。这不但证明了《国语》一书确实非出一人之手，而且也许还是南、北文风有所不同的一个佐证。

柳宗元称《越语》尤奇骏，岂特《越》哉？自《楚》以下类如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

1. 语言特点平实畅达

《国语》以记言为主，较为通俗自然，其语言略近口语，故具平实畅达之特点。

除《晋语》用晋方言，《楚语》用楚方言，为当然者外，《国语》中用楚方言者十一条，齐方言者三条，吴越方言者二条。用楚方言为多，当系楚人作品。兼用少数吴、越方言，因吴、越距楚较近。又用远在北方之齐方言，当有特别原因。(卫聚贤《国语之研究》，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

（景）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钟不和。（《国语·周语下》）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国语·鲁语下》）

2. 文章风格不尽一致

《国语》非出一人之手，分记八国史事，故其文章各具特点，风格颇不一律。其中尤以《吴语》、《越语》最为特异，显然别具一格，引人注目。

《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语）

《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卷之三）

《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刘熙载《艺概·文概》）

《越语下》文体、思想均不与各篇同，当系《国语》中最后一篇。（卫聚贤《国语之研究》，转引自张心澂《伪书通考》上册）

吴王昏乃戒，令秣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系马舌，出火灶，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挟经秉枹。十旌一将军，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阵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裳、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乌羽之矰，望之如墨。为带甲三万，以势攻，鸡鸣乃定。既陈，去晋军一里。昧明，王乃秉枹，亲

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釦以振旅，其声动天地。晋师大骇不出，周军饬垒。(《国语·吴语》)

于是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泝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踰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越师遂入吴国，围王台。(同上)

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兒，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

第四节 《左　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典范。它大约与《国语》同时或稍后成书，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出现了不少新的特点，标志着史家之文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左传》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愧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家杰作。

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赞》)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王充《论衡·案书篇》)

《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朱彝尊《经义考》

卷一六九引贺循语)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春秋左氏》，“三传”之雄霸也。(刘知几《史通·鉴识》)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刘知几《史通·摸拟》)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刘知几《史通·烦省》)

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通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五《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一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诸问题

关于《左传》的作者、名称、性质、成书年代及其流传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必须首先弄清。

(一)《左传》的名称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除此之外，它还有《左氏春秋》、《春秋古文》、《左氏》、《左氏传》、《古文春秋左氏传》以及《春秋内传》等诸多名号。《左传》于两汉之际一再立于学官，于唐代列入“九经”，宋以后则为著名的“十三经”之一。

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史记·吴世家》)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国语》，《左氏》之外传也。(王充《论衡·案书篇》)

汉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谷梁》。平帝始立《左氏》。后汉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因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二）《左传》的性质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它之被称为《春秋左氏传》，据《汉书》所记，乃始于汉哀帝时的刘歆。按儒家经学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乃汉代官学之通例。于是，此书被认定为解《春秋》之“传”，与《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同一性质，故并称《春秋三传》。其实，就在刘歆同时，一般学者即持异议，认为此书“不传《春秋》”。关于此书性质，历代多有争议。现在看来，此书不传《春秋》，并非经学著作，而实为一部自成一家的编年纪事体史书。它虽不能说是“依经作传”，但其记事之详赡多有助于说明《春秋》，故也不能说与《春秋》毫无关系。此书原与《春秋》各自单行，至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合为一书。

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正经》）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王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

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刘知几《史通·六家》）

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公》、《谷》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史故也。（叶梦得《春秋传序》）

《左氏》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然因其舍经而别载行事，可以验其曾见当时国史，故读《春秋》者不可以废《左氏》。（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一）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上）

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左氏传》之名，盖始于刘歆《七略》。（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下）

现在通称《左传》，其实绝对不是原名，原名只是《左氏春秋》，和孔子的《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一样，自成一家之言。……《春秋左氏传》是刘歆杜撰的名词，《左传》是后人的简称。所以现在《左传》这部书是真的（其中也有些伪），《左传》这个名词是假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三）《左传》的作者

《左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作。左丘明大约与孔子同时。司马迁称其为“鲁君子”，班固说他是“鲁太史”，后儒亦有谓其为“孔子弟子”者。至唐代，赵匡始谓“左氏”并非左丘明。其后学者对于《左传》作者颇多异说，有谓子夏所作者，有谓吴起所作者，更有今文派经学家，直指此书乃刘歆所伪造。现在看来，《左传》

作者实难确指。可以认为，它与《国语》一样，并非成于一人之手。但此书既以《左氏》为名，则它与"左氏"必有某种关系，说它的大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大概是比较可信的。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氏传》三十卷(原注曰：左丘明，鲁太史)。(《汉书·艺文志》)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

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篇》)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啖子(按即啖助)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

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其事既无明文，……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唐赵氏虽疑之，而不能必其说。今考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叶梦得《春秋考》卷三)

左氏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理或当然。(赵汸《春秋师说》卷上)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姚鼐《左传补注序》)

刘歆颠倒五经，使学士迷惑。……欲迷惑《公羊》义例，则多缘饰《左氏春秋》以售其伪。……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凡"书曰"之文，皆歆所增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卷上)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上》)

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春秋古文》)

《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章炳麟《春秋左传读·隐公篇》)

具有著者的本能及环境者为子夏。……子夏之本能，长于文学、军事，《易》、《诗》与《左传》著者相同，故著者为子夏。……《左传》传者系卫左氏人吴起。……此书由左氏人传，故名《左氏春秋》。刘歆引传文以解经，窜入解经之语，故称《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简称《左氏传》。杜预简称《左传》。(卫聚贤《左传的研究》)

(《左传》)到底是什么人做的，卫君(按指卫聚贤)说是子夏，不能武断、最多只能说有可能性。……有些激烈的今文家，又说《左传》全是刘歆伪造的。我们折衷的说，不承认刘歆伪造《左传》之说，而断定《左氏》是战国初年人做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四)《左传》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

1. 《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是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但其记事起自鲁隐公

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比《春秋》增多27年。其末尾一段记事，已涉及韩、魏、赵三家灭知伯事；而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在书中亦屡见，足证《左传》作者已见上述史实，其书之成当在此后。此外，书中还有“郑其先亡”、“郑先卫亡”、“毕万之后必大”以及“初，毕万筮仕于晋”时，卜人辛廖所谓“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之类的预言。这些预言大多应验，显然为后人傅会之语。因此，可以认为，《左传》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与《国语》之成书同时或稍后。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末段）

（吴公子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吴公子札）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同上）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左传·昭公三年》）

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浑罕曰：“……郑先卫亡，偪而无法。……”（《左传·昭公四年》）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左传·闵公元年》）

《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

《左氏》这书是当三家将分晋，田氏将篡齐而未成功时的产品。三家分晋比田氏篡齐早一点，是西纪前403年，做《左氏》的似乎没有看到三家分晋。所以《左氏》成书至迟不过西纪前402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2.《左传》的流传

《左传》成书之初，即已流传于三晋之间。《汲冢书》中有《师春》一卷，记卜筮事，与《左传》无异，可证其在魏国之流传。《战国策》与《韩非子》中亦有相关记载，可为其流传于赵、韩之证。汉兴，《左传》流传于民间。河间献王在河间国内即立有《左氏春秋》博士，而汉代中秘书的《春秋左氏传》，则为北平侯张苍所献。平帝时，《左氏》始立于学官，其后复经兴废。至晋杜预分经附传，合而释之，号称《春秋经传集解》。至隋唐即专用杜预之《集解》，于是《左传》盛行，《公羊》、《谷梁》渐废。至于后儒所勾勒的传授系统，所述虽详，但不尽可信。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晋书·束皙传》)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战国策·楚策四》)

《书》曰："居安思危。"(《左传·襄公十一年》)

《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韩非子·奸劫弑臣》)

冬，楚子围将聘于郑，……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左传·昭公元年》)

(崔杼)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公踰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汉书·景十三王传》)

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许慎《说文解字叙》)

平帝始立《左氏》。后汉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蔽固

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因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自是《左氏》大兴。（同上）

据《战国策》载虞卿说曰："《春秋》：'于安思危'"此可校今本《左传》"居"字之误。《荀子》书中载"赏不僭，刑不滥"等语，全本《左传》。又说宾孟事及叶公事，又《报春申君书》引《春秋》楚围、齐崔杼二事，亦与《左传》合。何云不传左氏之学？（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

二 《左传》的民本思想

《左传》与《国语》成书的时代较为接近，又都与左丘明的传诵有一定关系，因此，分别称之为《春秋》内、外传固然不妥，但也毕竟说明这两部书存在着某种一致性。除了所记内容互有交叉，反映时代大体相同而外，二者在思想倾向上，也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左传》较之《国语》，在思想上确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而民本思想的更加鲜明、突出，便是其主要表现。

（一）民为神之主，民为邦之本

在《左传》的记事中，明确地表达了民重于天、神的观念，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见解；并且以不少生动的史实，表达了民重君轻、民为邦本的观点。较之《国语》的"民神并重，先民后神"和"论及君民，以民为主"的思想特点，《左传》的观点显然更为明确，体现了在《国语》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观点，与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下》）的思想，已经较为接近了。

1. 民为神之主

春秋时期，神权政治日趋没落，人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左传》中明确提出了“民，神之主也”的观点，表现出对天命神权思想的背离，标志着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左传》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季梁）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左传·桓公六年》）

司马子鱼曰：“……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

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僖公十六年》）

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左传·昭公十八年》）

2. 民为邦之本

春秋时期，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诸侯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无不矛盾尖锐，斗争激烈。这时候，不仅神

权衰落，君权也大受冲击。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民”的力量得到充分显示，地位大大提高。于是，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逐渐认识到了“民”在取得和维护政权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左传》的记事中，对此有较为真实而深刻的反映。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现象，更是大变革时代的政治特征。《左传》指出了这一特征，并通过记事表达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吸取了现实斗争的深刻教训之后所得出的清醒认识。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吴公子光)抽剑刺王，……遂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吾谁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

(二)得民则兴，失民则亡

春秋时期严酷的斗争现实和无数血的教训，使当时一些具有明见达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识到了得民则兴、失民则亡这一真理。《左传》通过大量史实的记叙，对此作了鲜明的反映。据《左传》所记，人心的向背不仅是统治者个人成败的决定因素，而且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左传》作者以倾向鲜明的笔触揭示了这一点，正是民本思想的突出表现。

1. 恤民者兴，残民者亡

《左传》中记叙了不少恤民者兴、残民者亡的典型史实。作者还借一些历史人物之口，论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深刻道理。尽管作者在记述中对于那些残民而亡者不免时有惋惜之情流露，但其总的思想倾向无疑是进步的。

秋，宋大水。……(宋公)对曰："孤实不敬，……"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左传·庄公十一年》)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左传·昭公三年》)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

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 民心向背关系着战之胜负、国之兴亡

春秋时期，列国兼并；"强陵弱，众暴寡"。战争频仍，亡国众多。《左传》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并以大量的史实，揭示了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亦即是否得民心，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兴亡。这无疑是《左传》民本思想的又一突出表现。

晋郤克、卫孙良夫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焉。廧咎如溃，上失民也。(《左传·成公三年》)

(荣季)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子玉)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芳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王弗听。吴子怒，……灭徐。(《左传·昭公三十年》)

公曰："国胜君亡，非祸而何？"(逄滑)对曰："……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吴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吴，其何日之有？"(《左传·哀公元年》)

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败我也。今闻夫差……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同上)

(三)尊重民意，重视舆论

《左传》的民本思想还突出地表现为对民意的尊重和对舆论

的重视。作者不仅多处借历史人物之口论述了尊重民意、重视舆论的重大意义，而且还在史实的记述中不时引用一些当时广为传诵的民谣、民谚，借以表达民情。

师旷侍于晋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僖公五年》）

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同上）

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詢之，曰："亲逐而君，尔父为厉。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左传·襄公十七年》）

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同上）

（四）思想矛盾及其局限

《左传》的思想观念大体上与《国语》一致，但它的民本主义显然较《国语》的重民思想有所进步和发展。《左传》每每称引孔子之言以为褒贬，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所以，此书的编撰者在思想上

存在着的矛盾及其局限，大体上和当时的儒家思想倾向是相一致的，但也有所区别。一致的地方是：维护旧的礼制，非议革新；区别的地方是：称道鬼神占卜，宣扬迷信。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左传·昭公七年》）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1. 维护旧的礼制，非议革新

《左传》维护旧的礼制，宣扬血缘宗法，故对当时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革新措施不满，乃借时人之非议予以贬责，表现出鲜明的保守立场。此外，作者一方面无情揭露暴君的丑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弑君"。这不仅是维护旧礼制的必然表现，而且也反映了作者的进步倾向与保守思想的矛盾。

君子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无乃不可乎？"（《左传·隐公三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郑先卫亡，偪而无法。政不率

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左传·昭公四年》）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左传·昭公六年》）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晋灵公不君。……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宣公二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崔子）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 称道鬼神占卜，宣扬迷信

《左传》对鬼神、占卜，报应之事，屡屡称道，不厌其烦。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的思想及其“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的观点，显然有所背离。这无疑是《左传》中落后、迷信思想的反映。其所以如此，大概因为此书与《国语》一样，都出于宫廷史官的传诵。“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安书》），这就难怪此书要对妖鬼、神怪、占卜、报应之事津津乐道了。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公十四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左传·文公十四年》）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左传·成公十年》）

三　《左传》的散文艺术

《左传》之文，洋洋大观，历来备受推崇。就散文艺术而论，它确已趋于成熟、完善，无论叙事、写人、记言，都有不少新的成就，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后世作家往往将它视为典范，奉为圭臬，不是没有理由的。

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刘知几《史通·申左》）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刘知几《史通·载言》）

《左氏》不独修饰安顿有痕迹，且有腔调蹊(蹊)径，于三代之文，特为近时。（程廷祚《青溪文集》卷十《复家鱼门论古文书·附尺牍》）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

《左氏》情韵并美，文彩照耀。（刘大櫆《论文偶记》）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刘熙载《艺概·文概》）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絜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一）叙事：简洁生动，工巧严谨

《左传》散文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长于叙事。《春秋》虽属记事之作，但其文简略，往往只用提纲挈领式的三言两语，记述大事梗概，而无详情细节的描叙，好似记录"流水帐"，故有所谓"断烂朝报"之讥。《左传》则不同，其叙事文约而事丰，简洁而生动。与《春秋》的记事相较，实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国语》一书，虽与《左传》有相似之处，但它以记言为主，记事则颇零散，远远不如《左传》构思之工巧严谨和结构之细致完整。

（《左传》）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闵。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刘知几《史通·杂说上》）

《左传》家者，……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刘知几《史通·六家》）

较之左氏之记载，《春秋》洵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引王安石语，陆佃《陶山集》卷一二《答崔子方秀才书》记安石语较详）。（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

《经》之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同上）

1. 出色的叙事技巧

《左传》工于叙事。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使其叙事精妙优美，达到了微而显、婉而辩、精而腴、简而奥的辩证统一，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崇高评价。《左传》一书中，记叙简明生动，结构严谨完整的篇章举不胜举，如“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晋灵公不君”（宣公二年）等；即如原来分散记叙，而由后世选家辑为一篇的“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四年、五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子产治郑”（襄公三十年、三十一年）等，也都是历代传诵的散文名篇。这些作品，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

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辂（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

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则有士会为政，晋国之盗奔秦(浦起龙释：政善可知)；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浦起龙释：安集可知)。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则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浦起龙释：勇闷可知)；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浦起龙释：感悦可知)。斯皆言近而皆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晦之时义，不亦大哉！(刘知几《史通·叙事》)

《传》中议论之精，辞令之隽，都经妙手删润，然尚有底本，至叙事全由自己剪裁。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顺叙，有倒叙，有实叙，有虚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预叙，有补叙，有类叙，有串叙，有摊叙，有簇叙，有对叙，有错叙，有插叙，有带叙，有搭叙，有陪叙，有零叙，有复叙，有问叙，有夹叙，有连经驾叙，有述言代叙，有趁文滚叙，有凌空提叙，有断案结叙。(冯李骅《左绣》卷首《读左卮言》)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刘熙载《艺概·文概》)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同上)

《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同上)

2. 卓越的战争描写

尤为出色的是，《左传》特别善于描写战争，这是它的叙事艺术的集中表现。对当时著名战役，如秦晋韩之战(僖公十五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七年)，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齐晋平阴之战(襄公十八年)，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齐鲁清之战(哀公十一年)等等，都有非常出色的描写。

《左传》之写战争，不仅结构完整，情节动人；而且运笔灵活，不板不滞，善于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揭示

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显得波澜起伏、多彩多姿。这样的战争描写，不仅是前所未有，而且也是后所难及的。

比较典型的实例如记齐鲁长勺之战的"曹刿论战"（庄公十年）。此文与《国语·鲁语上》所载"曹刿问战"内容大体一致，但两相比较，可见《左传》之文不仅记战时之情，而且记了战前之问和战后之论。《国语》则仅记战前之问，却显得冗长、芜杂，远不及《左传》所记之精炼、扼要、传神。《左传》描写战争之成功，由此可见一斑。

《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刘熙载《艺概·文概》）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今将惠以小赐，祀以独恭。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将何以战？……。"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国语·鲁语上》）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二）写人：形形色色，百态千姿

古之史官，有所谓记事、记言之分。实际上，往往事中有

言，言中见事，二者要严加区分是很难的。事与言，都出于人，没有人就无所谓事与言，故记事记言皆必记人。然而做到以人为中心，记其言，叙其事，这在文学发展史上，就无疑是意义重大的质的飞跃了。

诚然，《左传》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编年史，它还并非以人物为中心，但它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的人物，为数不少。作者往往能如实地把这些人物摆在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一个个各具性格特征的动人形象。如老谋深算、虚伪奸诈的郑庄公，野心勃勃、强横"汰侈"的楚灵王，出类拔萃、有所作为的子产，学识超群、稳健保守的叔向，德高望重、明达机智的晏婴，历经艰险、终成大业的重耳，勇于进取、厉行改革的吴王阖庐，忍辱负重、志在雪耻的越王勾践等等，都无愧为血肉丰满、形神毕具的生动形象。《左传》在描写人物形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散文艺术的新发展。

1. 写重耳

《左传》写晋文公重耳避骊姬之乱，出亡十九年，历经狄、郑、卫、齐、宋、曹、楚、秦诸国，备尝艰难困苦，经受种种磨炼，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终于称霸诸侯。作者写出了重耳的性格和品质，揭示了他在斗争中成长的历程，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国君形象。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遂奔狄。……公子取季隗，……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姜

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且辞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犹在，女其行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 写子产

子产是《左传》作者以浓墨重彩着力描写的一位颇见光辉的政治家形象。作者写他崭然露头角，即一鸣惊人，不同凡响，表现出政治家所独具的远见卓识。写他迎难而上，受命相郑，雄心勃勃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政、外交措施，使郑国一时间由乱而定，由弱而强，受到了四方诸侯国的敬重。写他一生以"救世"为己任，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治郑20余年，功绩卓著，深得郑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作者选取了一系列颇为典型的事件，将人物置身于矛盾斗争之中，主要通过富于特征性的人物自身言行的描述，刻画了这样一位勇于革新、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的动人

形象。

郑子国、子耳侵蔡，获蔡司马公子燮。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曰："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曰："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将为戮矣！"（《左传·襄公八年》）

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产曰："……《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左传·襄公三十年》）

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子皮以为忠，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郑子产作丘赋。……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不迁[illegible]。"（《左传·昭公四年》）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传·昭公六年》）

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三)记言：典美博奥，委婉含蓄

《左传》散文艺术的又一突出成就表现在记言方面。尽管此书以记事为主，但其记言仍占很大比重，并且形成了不同于以记言为主的《尚书》和《国语》的新特点，体现了散文艺术的新发展。

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斗争尖锐，外交活动空前频繁；行人往来聘问，不能不非常讲究外交辞令。《左传》大量采录了这些精彩纷呈的外交辞令，再加润色，使之更为丰润富艳，形成了典美博奥、委婉含蓄的艺术风格，代表着《左传》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辞宗丘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刘知几《史通·言语》）

《左氏》尚礼，故文。（刘熙载《艺概·文概》）

论事调谐，叙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论入叙，故觉谐多涩少也。（同上）

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尚有大于是者，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矣。

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祇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傍也。……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

1. 言之有"文"，独具风格

《左传》之所以能够广布长流，深受历代学人推崇，在很大程

度上乃是得力于它的言之有“文”。此所谓“文”，即指其语言不仅简洁凝练、委婉含蓄，而且典美博奥、丰润富艳。《左传》的语言独具风格，自成一家，取得了不朽的艺术成就。

《左氏》艳而富。（范宁《春秋谷梁传序》）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原注：如僖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狄，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季札观乐而谈国风，其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原注：如郯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是厚诬之类是也），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原注：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晋士渥浊谏杀荀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濮，有忧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犹无城下之盟；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之类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刘知几《史通·申左》）

《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或以为战国时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体。战国文字粗豪，……《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大抵其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耳。（赵汸《春秋师说》卷上）

2. 委婉含蓄的外交辞令

《左传》所载外交辞令，言简而意深，委婉而有力，无愧为此书中流光溢彩的美文。这些外交辞令，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中，都曾经实实在在地发挥过作用，无疑是经受过实践检验的言辞。录入《左传》，又经锤炼、加工，于是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这样的美文，在《左传》中实在是不胜枚举的。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成十三），子产献捷（襄二十五），臧孙谏君纳鼎（桓二），魏绛对戮杨干（襄三）是也。（刘知几《史通·言语》）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覈诸？至如“鸲鹆”、“鹑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同上）

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刘熙载《艺概·文概》）

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同上）

辞命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同上）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左传·僖公四年》）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第五节 《战国策》

《战国策》不仅是战国之史，而且是纵横家言。它既是一部历史著作，又是杰出的散文汇编。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家之文的发展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书汇集、保存了战国时代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尽管有不少"增饰非实"之辞，真伪参半，不可尽信，但仍具有不容低估的史学价值。特别是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它取得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出色成就，不愧为一部光照后世、影响深远的散文杰作。

(《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战国策书录》)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刘知几《史通·六家》)

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所著书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也哉！今《战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李文叔《书战国策后》)

此先秦古书，其叙事之备，太史公取以著《史记》，而文辞高古，子长实取法焉。学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诵之。(耿延禧《战国策括苍刊本序》)

《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而有苏、张纵横之说。(鲍彪《战国策注序》)

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老苏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左传》文采甚盛，《战国策》变而质健，实乃《史记》权舆。……盖子长《史记》实学《国策》，其格法时相出入。(张士元《书战国策后》)

姜西溟言"周秦之文，莫衰于《左传》，莫盛于《国策》。"人以为诡激，吾以为知言。（谭献《复堂日记》二）

《战国策》者，经学之终而史学之始也，其书宜无人不读。（于鬯《战国策注序》）

一 《战国策》概说

《战国策》一书，名称不一，作者难定，性质亦多异说。

（一）《战国策》的名称、作者及其成书

《战国策》在未经编校成书之前，尚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西汉成帝时，刘向受诏领校秘书，乃将所见各本加以整理、汇编，除去重复，得33篇，集为一书，并定其名为《战国策》。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故定为此名。但也有学者认为此所谓"策"，非指"策谋"，而是"简策"之意。

《战国策》经刘向之手编校成书。刘向乃其编校者而非作者。实际上，此书并非出于一人一手、一时一地，故其作者不可确指。但从此书具有鲜明的"纵横"色彩看来，它可能出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或习纵横术者之手。至于近人罗根泽等力辨此书为楚汉之际"善为长短说"的蒯通所作，虽有论证，但缺乏根据，学者多不从。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

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及至从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

即简而为名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刘知几《史通·六家》）

《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以相人说韩信，而《索隐》以为《汉书》及《战国策》皆有此文；是则唐时《战国策》尚有蒯通说信之说，唐以后人始删去之也。《战国策》而有蒯通之说，疑即《通传》所谓"论战国权变，亦自序其说"者也。其书号曰"隽永"，与中书本号"长书"、"修书"者亦相似，"修""长"皆"永"之义也。《史记》名为《长短说》，亦即中书本号或曰"短长"者是也。以此言之，《战国策》即蒯通所作八十一首甚明！刘向校中书余卷，错乱相糅，因除去四十八首，为三十三篇耳！（牟庭《战国策考》，见钞本《雪泥书屋杂志》卷之二）

考《史记·田儋列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然则《战国策》盖即蒯通所论述者也？……此书盖作始于蒯通，重订于刘向。（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

《史记·淮阴侯列传》详载蒯通说韩信自立之言，司马贞《索隐》谓"案《汉书》因及《战国策》皆有此文。"……考《汉书·蒯通传》曰："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盖战国说士权变之言，实质为所谓长短之说，而巧譬善喻，极为隽美，故曰《隽永》。……而《艺文志》无《隽永》之书。盖《传》据史料，迻录史料之言；《志》核以存书，而当时已无《隽永》之名，不知即所谓《国策》，所谓《短长》也。（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补证》）

（二）《战国策》或"史"或"子"之争

关于《战国策》一书的性质，或"史"或"子"，说法不一。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历代史志及《四库全书》亦归之于"史"部。宋代晁公武认为"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始于《郡斋读书志》中将其改入"子"部纵横家。

马端临等赞同此说。他们的意见都不无道理，但各执一端，未免偏颇。其实，此书本来就是一部贯串着纵横家思想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它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合集。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汉书·艺文志》："春秋家"）

《战国策》三十二篇，刘向录。（《隋书·经籍志》："史部"）

（《战国策》）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一）

《战国策》十三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二《经籍考 卷三十九·纵横家》）

案《汉艺文志》，《战国策》与《史记》为一类，历代史志因之。晁公武《读书志》始改入子部纵横家，《文献通考》因之。……《战国策》当为史类，更无疑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

广圻于是书，寻绎累年，最后于《叙录》所云……恍然而知《战国策》实向一家之学。（顾广圻《战国策札记后序》）

二 《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内容较为驳杂，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所反映。然而尽管驳杂，倾向却也鲜明。此书所记主要人物大多为战国时代活跃于各国政治舞台之上的谋臣策士、说客游士，作者对他们的言行、计谋大肆渲染，对他们的政治作用尽情鼓吹，纵横之势、长短之术、诡谲之计、诈伪之谋充溢全书。就总体而言，此书确实主要反映了鲜明的纵横家思想倾向。这与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的《国语》和《左传》大相径庭，因而此书历来颇受冷遇，并屡屡遭到后世那些持正统儒家观点的学者们的痛斥。

《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在政治思想、人生哲学、处事方针等方面，具体表现为崇"计"、重"利"、尊"时"，反映了鲜明的纵横家思想特征。

当此之时，……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刘向《战国策书录》）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曾巩《战国策目录序》）

《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李文叔《书战国策后》）

《战国策》三十三篇，刘向为之序，世久不传。……当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其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横，变诈百出。（王觉《题战国策》）

《国策》，……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鲍彪《战国策注序》）

嗟乎！吾读《短长》之书，然后信子舆氏之以仁义说齐梁，为深切事情而不可易也。夫战国之亡以策士，策士之亡战国，则以利也。（朱鹤龄《战国策钞序》）

《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陆陇其《战国策去毒跋》）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九流之学）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一）崇"计"——策略至上的政治思想

在《战国策》作者的笔下，策士的谋略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并被称颂为威力无穷的法宝，表现出策略至上的政治思想特征。以这一思想为主导，《战国策》贬低战争的作用，主张"以智（谋）服人"，突出宣扬外交的重要性，特别讲究游说的艺术。作者对纵横家的言行、计谋、思想、作风肆意渲染，热烈赞颂，体现出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作者以赞赏和歆羡的情调，描绘了策士们的诈谲翻覆和以腾说而致富贵的情景。在《战国策》中，只要是计能售，策能行，作者便一概予以颂扬，似乎计谋策略的得逞便是最高的理想境界。这无疑是唯利是图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

1． 崇尚计谋，贬低战功

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中作者"论断辞"）

蔡泽曰："……今君（按：指范雎）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

苏秦说齐闵王曰："……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故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已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计听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章末作者"论断辞"）

2. 重视外交，讲究游说

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为大王计，莫若安民无事，请无庸有为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赵策二 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公孙弘可谓不侵矣。昭王，大国也。孟尝，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可陵，可谓足使矣！（《齐策四·孟尝君为从》章末作者"论断词"）

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赵策二·秦攻赵》）

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齐策六 齐闵王之遇杀》）

安陵君因使唐且使于秦。……唐且曰："……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

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齐策三·孟尝君在薛》章末作者"论断辞"）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刘知几《史通·言语》）

3. 颂扬以腾说而致富贵的纵横家

（苏秦）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熿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后数日，（范雎）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蔡泽，其人

辩士。臣之见人甚众，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曰:"……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秦策五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

魏王将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子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废矣。如此，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信，因而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魏策一·魏王将相张仪》)

(二)重"利"——争利求名的人生哲学

纵横家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思想，这显然与重"义"而非"利"的儒家针锋相对。他们奉"利"、"名"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求"扬名"为杀身的报偿。这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的进军"已打进了政治、思想的领域，图财赢利的商人意识渗透了纵横家的思想。他们为了向上层统治阶级去争一席之地，不择手段，顽强奋争。他们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向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挑战，公然以不信、不廉、不孝自命，明确宣称"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这种以争利求名为奋斗目标的新的人生观，分明是对传统观念的叛逆。《战国策》一书的作者对此一味颂扬，其歆羡之情，溢于言表；如此心心相印，证明了他们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战国策》被后代一些持正统儒家观点的封建文人斥之为"畔经离道之书"。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

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谭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贵则就之，贫贱则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请以市谕：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愿君勿怨。”（《齐策四·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

（张仪）对曰：“……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孟尝君）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至楚》）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政姊闻之，曰：“弟至贤，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今死而无名，……夫爱身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聂政之所以名施于后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诛，以扬其名也。（《韩策二·韩傀相韩》）

（苏秦）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曰：“……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何也？（李梦阳《刻战国策序》）

(三)尊"时"—— 明时审势的处事方针

战国纵横家靠计谋、游说为资本，以求名得利为目的，因而特别重视明时审势。他们对"时势"的尊重，可谓非比寻常。他们以实现计谋、策略为出发点，把看准机会、认清形势从而抓住有利的时机当作决定事情成败的前提条件。《战国策》不厌其烦地描述了纵横家对"时势"的尊重，反映了尊"时"的思想倾向。

苏秦说齐闵王曰："……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秦客卿造谓穰侯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今攻齐，此君之大时也已。……"（《秦策三·秦客卿造谓穰侯》）

谓穰侯曰："……德强齐，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时也已！"（《秦策三·谓穰侯》）

客请奉阳君曰："……定身封，德强齐，此百代之一时也！"（《赵策一·齐攻宋奉阳君不欲》）

希写曰："臣以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贾。"……曰："……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通"价")，而谨司(同"伺")时。……"（《赵策三·希写见建信君》）

君子闻之曰："……安陵君可谓知时矣！"（《楚策一·江乙说于安陵君》）

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晚之时失也。（《宋卫策·卫人迎新妇》）

三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但从史学的角度看来，

此书杂采不少纵横说士简练揣摩、引锥刺股之类的夸辞、拟作，真伪参半，年月难辨，不可尽信，这就大大减低了它的史学价值。比较而言，它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则显得更大、更突出。

《战国策》生动地反映了战国时期尖锐激烈的斗争形势，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战乱频仍的民间疾苦。就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论，《战国策》在先秦著作中堪称出类拔萃。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它与以论说为主的诸子散文相较，显然自具特色；而与同属史家之文的《国语》、《左传》相较，无论在叙事的生动、描写的细密、人物形象刻画的成功、语言艺术的圆熟、文体的多样化以及寓言文学的独树一帜等方面，《战国策》都显示出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愧为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太史公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

其（按指苏秦）说六国辞有与当时事不合者，皆辩士所增饰也。（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三）

《国策》之书，……夸从亲之利，以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吴师道《国策校注序》）

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剑而起"，何也？其辞固多夸矣！（《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末吴师道注语）

予谓《策》纪多设词，如诸子之寓言，非可以实事求之。（谭献《复堂日记》五）

《国策》多寓言，不必尽求以事实。（同上六）

《战国策》一书，不知何人所作。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吴曾祺《战国策补注叙附例言》）

《战国策》原为史类之一书，由今观之，吾人可云，其书大半是小说。（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战国策考研录》载胡怀琛语）

（一）姿态各异的人物群像

《战国策》打破了"编年"的限制，它以人物的游说活动为记

叙的中心，并以此统率记言、叙事。特点是：它描写人物的面非常广泛，上自国君、太后，下至平民百姓；老者"年九十余"，少者年方"十二"；公子王孙、武将谋臣、说客策士、嬖臣宠姬，无不收罗于篇中，而且所写人物各具姿态。《战国策》的这一特色，在书中出现较多的"士"、"国君"、"太后"等三类人物形象系列里表现尤为突出。如策士形象中苏秦的坚韧倔强，张仪的奸险狡诈，陈轸的圆滑机智，公孙衍的老谋深算，都称得上是个性鲜明、形象生动。描绘出形形色色、百态千姿的人物群像，是《战国策》文学成就的主要标志之一。

1. 苏秦的形象

自称"东周之鄙人"的苏秦，为了改变自身的阶级地位，执著地追求"势位富贵"。他蔑视传统，顽强"进取"，勤奋刻苦，大胆自信。他积极地奔走游说，孜孜不倦地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必成事功的精神。苏秦的形象，称得上是战国时期"倔强的、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典型代表。《战国策》着意塑造的这一形象，不仅有作者理想的闪光，而且确实熔铸有新鲜的时代精神。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

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文公卒，易王立。齐宣王因燕丧

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苏秦为燕说齐王，再拜而贺，因仰而吊。齐王桉戈而却曰："此一何庆吊相随之速也？"对曰："人之饥所以不食乌喙者，以为虽偷充腹，而与死同患也。……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制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曰："然则奈何？"对曰："圣人之制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王能听臣，莫如归燕之十城，卑辞以谢秦。……"齐王大说，乃归燕城。以金千斤谢其后，顿首涂中，愿为兄弟而请罪于秦。（《燕策一·燕文公时》）

2. 张仪的形象

张仪是战国纵横家中与苏秦齐名的头面人物，也是《战国策》中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之一。作者善于通过对张仪自身言行的动态的描叙，在一系列矛盾、斗争中展示其性格特征。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诡计多端，巧舌如簧，出尔反尔，奸险狡诈的人物形象。

张仪之残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为之请相于秦。张子谓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将以为国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为请相于秦。臣闻其言曰：'王欲穷仪于秦乎？臣请助王。'楚王以为然，故为请相也。今王诚听之，彼必以国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秦策一·张仪之残樗里疾》）

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唯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大齐王；唯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大齐王。……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秦策二·齐助楚攻秦》）

3. 陈轸的形象

《战国策》中的陈轸是一个特色鲜明、闪射着智慧光彩的人物形象。作者突出地描写了他与众不同的言行，表现了他机智圆滑、善于应对、料事明切、颇富远见的特点，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战国策士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感人形象。这一形象具有智慧超群、机敏脱俗的美的特征。在后世作家所描写的智慧型人物形象如《史记》中的张良、陈平，《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等的身上，不难发现有与陈轸神似之处。

陈轸去楚之秦。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王曰："轸安敢之楚也？"……轸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楚与不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情输楚王，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楚与不。"……轸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轸为？忠尚见弃，轸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为然，遂善待之。（《秦策一·陈轸去楚之秦》）

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曰："不谷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秦策二·齐助楚攻秦》）

4. 公孙衍的形象

公孙衍（犀首）也是《战国策》中头角峥嵘的一位人物。作者突出表现他与张仪、甘茂、田需、史举、田文、周宵等人邀宠

争权、尔虞我诈的重重矛盾，揭示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倾轧翻覆的斗争，从而展现了公孙衍善于耍弄权术的本领和他长于阴谋暗算的特点。老谋深算的公孙衍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策士形象。

魏王将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韩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地，则韩之南阳举矣。子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废矣。如此，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信，因而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魏策一·魏王将相张仪》）

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需不善。季子为衍谓梁王曰："王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也。牛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国必伤矣！愿王察之。"（《魏策一·公孙衍为魏将》）

犀首见梁君曰："臣尽力竭知，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田需从中败君，王又听之，是臣终无成功也。需亡，臣将侍；需侍，臣请亡。"（《魏策二 犀首见梁君》）

史举非犀首于王。犀首欲穷之，谓张仪曰："请令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衍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王闻之而弗任也。史举不辞而去。（《魏策二 史举非犀首于王》）

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魏策二·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

（二）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文辞美妙，历来备受推崇。有人称颂它"上薄六经"、"下绝来世"，有人甚至封它为"文辞之最"。具体而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具有生动形象、敷张扬厉、明畅通俗三大特色，这三大特色融为一体，便形成了辩丽横肆的独特艺术风格。较之《国

语》语言的平实自然和《左传》语言的委婉含蓄，《战国策》的语言风格显然别是一家。它在语言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它已攀上了时代的高峰。

《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哉！（李文叔《书战国策后》）

《战国策》三十三篇，……爱其文辞之辩博。……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辩丽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王觉《题战国策》）

《国策》，衰世之文乎？……然雄辩变幻，自是宇宙间一种好文字。以故太史公多祖之，而回视《左》、《国》亦谅浅矣。（《战国策谭棷》附录载姚三才语）

春秋战国王侯文士之词，淳古玄奥，妙夺化工，莫知师传，无从拟议，初学熟读，潜玩自然，神与意会。譬之吸沆瀣，餐朝霞，不惟可以洗涤尘襟，亦将变易肺腑矣。（《战国策谭棷》所载胡汝嘉语）

文之快者每不沉，沉者每不快，《国策》乃沉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

《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

《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沉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刘熙载《艺概·文概》）

1. 特色之一：生动形象

战国策士崇尚功利，他们的说辞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为了达到游说的目的。他们非常善于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娓娓动人，如此增强说辞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手法为巧用比喻和博引史事。这样的精彩篇章，在《战国策》中实在是举不胜举。

（1） 巧用比喻

《战国策》中的比喻多以动物、植物、人体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所习见的其它事物，作为表现观念的具体形象，令人有某种亲切感。其喻意则大多令人一目了然、心领神会，很少有晦涩难解之处。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夫齐，罢国也，以天下击之，譬犹以千钧之弩溃痈也。（《秦策二·陉山之事》）

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秦策三·范雎至》）

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诚舆瓢，瓢必裂。今秦国，华阳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国必裂矣。（《秦策三·应侯谓昭王》）

断齐、秦之要（同"腰"），绝楚、魏之脊。（《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

当是时，卫危于累卵。（《秦策四·或为六国说秦王》）

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齐策二·秦攻赵长平》）

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

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王曰："子来！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黍、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齐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

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苏秦）对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楚策三·苏秦之楚三日》）

（2）博引史事

借古证今，引史为说，也是《战国策》中常用的手法之一。引述史事即再现过去曾有的现实。策士们为了阐明某种观点或主张，常常借助史事的引述，把已成历史的人物和事件、经验或教训重新展现出来，仿佛张挂出一幅幅鲜明的历史画图，通过生动的形象，令人深受感染，从而得到启示和教益。

范雎谢曰："……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已一说而立为太师。……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臣何忧乎？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漆身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秦策三·范雎至》）

蔡泽曰："主固亲忠臣，不过秦孝、越王、楚悼。君之为主，……不过商君、吴起、大夫种；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窃为君危之。……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会，有骄矜之色，畔者九国。吴王夫差无適（通"敌"）于天下，轻诸侯，凌齐、晋，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启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秦第三·蔡泽见逐于赵》）

2. 特色之二：敷张扬厉

《战国策》之文，雄隽奇伟，明快犀利，气势横放，辩丽恣肆。章学诚所谓"其辞敷张而扬厉"，正好道出了这一特色。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能先立地步"。即指战国策士游说时能知己知彼，居高临下，往往站在优势地位上，主动出击。故其文论形势，析利害，破敌说，陈己见，无不气势恢宏，语语中的。《战国策》语言之壮伟恢奇、敷张扬厉，主要即得力于此。二是善于"措辞求奇"。其主要表现为巧妙地综合运用比喻、

夸张、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这些都体现了作者运用语言艺术的功力已经达到了圆熟而高妙的境地。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战国说士之言，其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刘熙载《艺概·文概》)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有亿兆之数。(《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

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3. 特色之三：明畅通俗

《战国策》叙事简明条达，语言大都明白如话，具有明畅而通俗的特色。因为策士们出于功利的目的，其说辞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让人一听就懂。否则，纵然是最为得意的“奇策妙计”，如不能被人理解，岂非枉费心机！《战国策》的语言非常接近当时人民群众的口语，是从口语中吸取原料，再经加工提炼而成。因此，绝少生僻的词汇、别扭的句式或奇特怪异的表达方式。它还常常按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诗》、《书》、成语和民间谣谚，把古语、今语、口语、警策语等自然、和谐地熔为一炉，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齐策一·邹忌脩八尺有余》）

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秦策三·秦攻邯郸》）

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秦策五·谓秦王》引逸《诗》）

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齐策六·田单将攻狄》引“齐婴儿谣”）

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间居》引“谚”）

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

纵横出自行人，短长诸策，实多口语，寻理本旨，无过数言，而务为纷葩，期于造次可听。溯其流别，实不歌而诵之赋也。秦、代、仪、轸之辞，所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云尔。（章炳麟《文学说例》）

等是人言，出诸唇吻，而据实而书，不更润色者，则曰"口说"；……迁、固所录，若蒯彻说信，伍被谏安，仍其本语，无所增损，如鞫狱之录辞，此所谓"口说"也。……策士飞箝之辩，宜与宋儒语录、近人演说同编一秩，见其与文学殊涂，而工拙亦异趣也。（同上）

（三）独树一帜的寓言文学

《战国策》中载有约70则寓言故事。它们闪射着迷人的文学光彩，富有经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它们散见于各策之中，虽大多没有独立成篇，只是各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无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倘若把它们分离出来，未尝不是形完神备的文学佳构。《战国策》中的寓言故事遍见各策，数量较多，涉及面广，取材不拘。其作大都随物赋形，即事寓意，长短适度，灵活多样，不愧为基本成熟的寓言文学。《战国策》寓言以鲜明的纵横家色彩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卓然屹立于先秦寓言文学之林。它们脍炙人口，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无疑是《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的又一主要标志。

1. 鲜明的纵横家色彩

《战国策》中遍载"出奇策异智"的"从横短长之说"，而散见其中的寓言故事则无疑是策士们用心最苦、用力最勤的部分。他们或袭改传说，或创制新篇，都无不灌注了他们的心血，并且自然地打上了鲜明的纵横家的思想烙印，呈现出独具的风貌和特有的色彩。具体说来，便是充分体现了纵横家崇"计"、尚"贤"、重"利"、尊"时"的思想倾向。正由于此，《战国策》寓言始能独标一格，迥然有别于先秦其他寓言。

今山泽之兽，无黠于麋。麋知猎者张罔（网），前而驱己也，因还走而冒人，至数。猎者知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今诸侯明知此多诈，伪举罔而进者必众矣。舍之，王勿据也。（《楚策三·秦伐宜阳》）

齐大夫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韩策二·齐令周最使郑》）

有两虎诤（争）人而斗者，管庄子将刺之，管与止之曰："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今两虎诤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无刺一虎之劳，而有刺两虎之名。"（《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

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意也。（《秦策三·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

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蚤（同"早"）晚之时失也。（《宋卫策·卫人迎新妇》）

2. 动人的艺术魅力

《战国策》中的寓言故事具有独立存在和世代流传的价值，并在实际上赢得了古今中外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它们具有一种超时空的神奇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形象与意义的遥相呼应和故事与哲理的和谐统一。

（1）形象与意义的遥相呼应

由于《战国策》中寓言故事的产生往往取决于当时客观现实的需要以及游说者主观的意识，所以它们难免具有某种以适合目的

为主要标准的主观任意性。无论是改头换面的传说，还是独出心裁的创作，都服务于当时说明某种抽象事理的需要。形象的寓言故事被用来论述或说明某种抽象的事理，使外在形象与内在意义达到暂时或部分的协调。这就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呼应的关系。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楚策一·荆宣王问群臣》)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

（2）故事与哲理的和谐统一

《战国策》中的寓言故事并不仅仅表现为形象与意义互为呼应，实际上，人们在欣赏那些历代传诵的佳作时，往往抛开了与形象相呼应的本来意义，而赋予它们以新的含义。这是因为，形象往往大于思想，作品的客观认识意义往往大于作者的主观意图。《战国策》寓言更为突出也更有价值的一个特点是故事与哲理的和谐统一。哲理性寓于故事性之中，因而能够发人深思，启人觉悟，长人智慧，给人教益。这是它们富于艺术魅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纆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千里之行。"(《韩策三·段干越人谓新城君》)

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齐策一·靖郭君将城薛》)

楚有祠者，赐其舍人一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

第五章　诸子之文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无私人之师，亦无私家之著述。春秋以后，王官之学乃散于民间，于是私人之学兴起，私家著述亦相继出现。战国之时，百家争鸣，处士横议。各家出其所学，自由论辩，于是著书立说，一时蔚为风尚。所谓诸子百家，无不以散文为武器，发愤著述，以阐明事理，陈说主张。其文多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风。诸子之文由语录体到对话体再到较为系统完整的长篇大论，其发展进程历历可见。它以雄放奇骏、异彩纷呈的特色与洋洋大观、光耀后世的史家之文相映生辉。正是辉煌的先秦史家之文与诸子之文共同成就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黄金时代。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余荣矣。……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刘熙载《艺概·文概》）

古者官师合一，私家无学。及王道既微，官失其守，始有私家之学。……至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乃悬格以待学者，而诸子专家，于是乎起矣。（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

第一节　《论语》、《墨子》

先秦诸子之中，孔子、墨子分别为儒家、墨家的开山祖师。儒、墨二家，时称“显学”，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此二家的主要代表著作是《论语》和《墨子》。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

非子·显学》)

此二士(按指孔子、墨翟)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吕氏春秋·当染》)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有度》)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王充《论衡·案书篇》)

一 《论 语》

(一)《论语》其书

《论语》是一部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典籍，也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是儒家崇奉的经典，也是先秦诸子之冠冕。

1. 《论语》的名称及其意义

《论语》之名为编纂者所定，并非后人所加。关于这一书名的意义，后来虽有异说，但一般认为，所谓"论"，即论次编纂之意；"语"即指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语。语经论纂，故称《论语》。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

夫《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王充《论衡·正说篇》)

《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刘熙《释名·释典艺》)

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

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卢校云："法"疑"秩"之讹），谓之《论语》。（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章炳麟《文学总略》）

2. 《论语》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论语》是一部编纂而成的书。其作者非止一人，也非出于一时。此书成于多人之手，既有孔子弟子之笔墨，亦有其再传、三传弟子之笔墨。著笔或先或后，其间相距数十年之久。按此书所记，有重见之语，有传闻异辞，文体、称谓亦有所不同，可知记述非一人，论纂亦非一次。一般认为，此书大约在战国初年，由孔子之弟子后学编纂成书。

《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序》）

《论语》者，……郑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柳宗元《论语辩·上篇》）

《论语》只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记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孔子再传、三传弟子记的。（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

今按《论语》所记，有重见之语，（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重见于"学而篇》及《阳货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重见于《学而篇》及

《里仁篇》。而其辞略异)有传闻异辞，误一为二而重见之事，(如畏于匡及厄于桓魋，当为一事，……)则记者撰者均非一人可知。且《上论》与《下论》文体、称谓均不相同，羼附增续，痕迹显然。则其论纂不止一次，不在一时。又可知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年七十三而卒，则尔时曾子仅二十七耳；而《论语》记曾子临终时告孟敬子之言，且举孟敬子之谥，孟敬子之卒，当又后于曾子矣。故《论语》论纂成书，最早当在孔子卒后五六十年矣。记述非一人，论纂非一次，其撰人实已无从考定。各家所说，多出臆度。(蒋伯潜《诸子通考》)

(二)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他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捧为“万世师表”。由于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具有多面性，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天命观，反对犯上作乱，严格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等，符合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的共同利益，故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从中寻求思想武器，利用孔子来为自己服务，于是他的学说也就成了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导力量，无论在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对后代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延长，是与儒学所起的作用分不开的。

1. 生平事迹

孔子一生，初尝从政，继而周游，终则设教、著述。其从政未能遂愿，周游到处碰壁。著述虽称“述而不作”，但贡献卓著；而设教则业绩辉煌，乃其一生最伟大之成就。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贫

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2. 思想特征

（1）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天"有人格、有意志，俨然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他讲"命"和"天命"，认为"天命"不可抗拒；但他所讲的"命"，与传统思想中当作至上的人格神的意志的"命"，已经有所不同。他"不语怪、力、乱、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鬼神的态度显然将信将疑，因而不免闪烁其辞，其中多少含有唯物论的因素。此外，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在认识论上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 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上)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 季氏》)

(2)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与"礼"。所谓"礼"，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其根本点是尊卑贵贱有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所谓"仁"，不仅指主观的道德修养，即"克己"、"爱人"，也指客观的伦理教化，即按照周礼所规定的秩序 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亦即所谓"复礼"。"克己复礼"即为"仁"。"仁"与"礼"，互为表里。"仁"是目的，"礼"是实现"仁"的保证。在孔子看来，通过"克己复礼"，即可使"天下归仁"，可见"仁"在孔子心目中，还是涵盖主、客观的一种理想境界。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孔子维护奴隶制等级制度的政治立场。

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上）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同上。按：此则又见《论语·雍也》）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三）《论语》的文学价值

《论语》是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从文学的角度看来，作为诸子散文之冠冕，它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并在实际上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言简意赅，含蓄隽永

《论语》多记孔子语录，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它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体系。它以简练形象、雍容和顺、意味深长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议政论道之语、循循善诱之教和评文说艺之见。其文言简意赅，含蓄隽永，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彩。凝练的语言包孕着深刻的思想，使之富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1）议政论道之语

《论语》中所记孔子的议政论道之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它们有的不过三言两语，有的则如政治短评，也有专题论政的篇

章。其特点主要是坐而论道，简要凝练，生动形象，富于感情色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同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同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论语·里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同上）

（2）循循善诱之教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创设规模宏大的私学，公开收徒讲学，当亦始于孔子。在丰富的教学实践中，孔子建立了系统的教育理论，总结出不少可贵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论语》生动地记述了孔子诲人

不倦、因材施教的大量言行，充分体现了孔子在教育方面处处坚持循循善诱的特点。从简单应答的三言两语，到反复论辩的侃侃而谈，其文富于变化，言辞娓娓动人。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上）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3）评文说艺之见

《论语》中记有孔子评说文学艺术的一些言论，反映了孔子的

文艺观。这些评文说艺之见虽不系统，但非常深刻。它们不但在当时堪称超越前人、凌驾同代的高见，而且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记述颇有文采且富于变化，用语简练含蓄而余味无穷，不愧为《论语》中颇富特色而又脍炙人口的篇章。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同上）

《论语》无意为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厌语助字之多。（郑瑗《井观琐言》卷二）

2. 人物形象，鲜明具体

《论语》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它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的形象。孔子是《论语》一书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等方面的静态的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等方面的传神的刻画，从而使孔子的形象鲜明具体地凸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外，《论语》还围绕着孔子这一中心，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爽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

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微子》等篇所写隐逸者的形象，也都鲜明生动，具体传神，具有非比一般的感染力。

（1）孔子及诸弟子的形象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同上）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同上）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同上）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同上）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同上）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

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论语·先进》）

（2）隐逸者的形象

在《论语.微子》等篇中，还比较集中地刻画了一些隐逸之士的形象。这些隐逸之士，不满于当时的黑暗现实；他们怀才隐居，不与统治者合作，选择了逃避恶浊社会，以求洁身自好的道路。这与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的人生态度恰相背离。

《论语》通过他们之间关系的描写，既生动地刻画了这些隐逸之士的形象，同时也更加丰富了中心人物孔子的形象。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论语·宪问》)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同上)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同上)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3．语录文体，影响深远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语录"作为一种文体，乃《论语》所首创。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文辞贴近口语，通俗、自然、浅显，因而令人有亲切之感；第二，所录要言不烦，多非

长篇大论，因而令人有精粹之感；第三，大多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因而令人有真实之感。当然，语录体毕竟属于散文文体发展史上的早期形态，它的不成熟、不规范、简单化和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难免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文体并非没有生命力，事实上，它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在它之后，《孟子》、《墨子》中可见语录之存，而《庄子》、《荀子》，《韩非子》中亦有语录之遗。汉代扬雄的《法言》、隋代王通的《中说》，直摹《论语》之体。至于宋代程颢、程颐的《二程语录》、朱熹的《朱子语类》，以及明、清的一些语录体著作等等，也都不外乎是仿效《论语》文体之作。此外，《论语》语录体对后世的影响，还波及《世说新语》之类的笔记、小说。甚至到了现代，也不能忽略语录体的存在。

(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汉书·扬雄传赞》)

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阮逸《文中子中说序》)

惟此书(按指扬雄《法言》)摹仿《论语》，徒为貌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

《世说新语》三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本名《世说新书》，后相沿称《新语》，遂不可复正。其书取汉至晋轶事琐语，分为三十八门，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四)

《中说》十卷。旧本题隋王通撰。……书凡十篇，字字句句，皆刻画《论语》、师、弟亦互相标榜，自比孔、颜。(《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

《二程粹言》二卷。宋杨时编。乃其自洛归闽时，以二程子门人所记师说，采撮编次，分为十篇。(同上)

《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宋咸淳庚午导江黎靖德编。初，朱子与门人问答之语，门人各录为编。……靖德乃裒而编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

《居业录》八卷。明胡居仁撰。乃其所著语录，分十二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

《枫山语录》一卷。明章懋撰。凡分四类：曰学术、政治、艺文、人物，而附以拾遗。卷帙不多，而言皆切实近理。(同上)

《榕村语录》三十卷。国朝李光地撰。……有光地所自记者，有子弟门人所记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四)

晋隆和(三六二)中，有处士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同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颇盛行，……至隋而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俊。(同上)

二 《墨　子》

(一)墨子其人与《墨子》其书

1. 墨子其人

墨子名翟，鲁国（一说宋国）人，一说墨非其姓，以勤劳瘠黑得号，墨家学派创始人，我国先秦时期重要思想家之一。其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于孔子之后，活动于战国初期。他出身于手工业者，能制造机械，也通晓军事，曾率同弟子们帮助宋国防御楚国的进攻。他早先曾学过儒家学说，后分裂出来，自创墨家学派。这一学派有严密的组织，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不尚空谈，积极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宗教色彩颇浓。战国时期，墨家影响甚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且有若干宗派。但秦汉以后，墨学衰微，墨家竟后继无人了。

(1)生平与名号

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

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吕氏春秋·高义》)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别录》云："今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在七十子之后也。（见同上所载司马贞之《索隐》）

（墨子）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

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或曰宋人，盖生于周定王时。……卒盖在周安王末年，当八九十岁。（孙诒让《墨子传略》）

墨子名翟，姓墨氏。鲁人也。……其生卒之年，无从确知。但其时代，当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且亦为寿考人云。（蒋伯潜《诸子通考·墨子略考》）

墨非其姓，以日夜勤劳，面目瘠墨得号。故其道近释氏之小乘，西方之天主。（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

（2）墨学及流传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

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淮南子·主术训》）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使学者以裘褐为衣，以跂屩为服，日夜不休，以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亦道尧、舜，又善守御，为世显学。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孙诒让《墨子传略》）

墨家钜子，盖若后世儒家大师，开门授徒，远有端绪，非学行纯卓者，固不足以当之矣。（孙诒让《墨学传授考》）

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同上）

2. 《墨子》其书

《墨子》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亦非墨子自撰。它是一部包括墨子言论及墨家各派学说的著作，由墨子弟子、门人及其后学

记录、整理、汇编而成。

此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至宋世已亡9篇。今存两种版本：一"道藏"本，53篇；一"四库全书"本，63篇。此书内容较为驳杂，体例亦不尽一致。一般认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篇比较集中、完整地保存了墨子思想的真相，乃《墨子》宗旨所在，为全书之核心，亦为墨学之纲要。

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

《墨子》七十一篇。(《汉书·艺文志》)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同上)

《墨子》七十一篇，见《汉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十篇，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毕沅《墨子叙》)

《墨子》十五卷。旧本题周墨翟撰，然书中多称"子墨子"，则其门人所记也。原本七十一篇，今佚八篇。其说为孟子所辟，不行于世。然其书则历代著录，列为九流之一。观其近理乱真之处，然后知儒、墨异同之所以然，则亦不必废观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

墨子自己并不曾著书，现存的《墨子》这书是汉人所纂集的，其中有些是墨家弟子的著录，有些还不是墨家的东西，所以我们还不好抱着一部《墨子》便笼统地来谈墨子。要谈墨子本人，最好是根据《墨子》书中的左列10篇：(一)《尚贤》(二)《尚同》(三)《兼爱》(四)《非攻》(五)《节用》(六)《节葬》(七)《天志》(八)《明鬼》(九)《非乐》(十)《非命》

这10篇是各有上中下三篇的，而每三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是一番谈话的三种纪录。……这10篇各具三篇，正是墨家三派各派的底本汇辑。

因此在这10篇之中所含有的思想，正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墨子思想的真相。在这10篇以外的东西呢，那就只好认为是后来的附益或者发展了。……这10篇是墨子的"十诫"——是他的10种主张，10种教条。（郭沫若《青铜时代·墨子的思想》）

（二）《墨子》的散文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墨子》的影响不及《论语》，也不如其他先秦诸子。但在诸子之文中，《墨子》的文章显然独具一格；它以自身的鲜明特点在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地位。

1. 尚实尚质，言之无文

《墨子》之文，意显语质，言多不辩；重视实用，不讲文采。这是与墨子思想崇尚质实，富于现实性、针对性和功利性相适应的。墨家唯恐"以文害用"，故不事文采。其文虽然反复论辩、不尚空谈，却未免"言之无文"，因而也就"行而不远"。《墨子》对后代散文影响不大，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2. 讲究逻辑，明辨是非

《墨子》之文，极善辩驳。在《非命上》中，有所谓"三表"（在《非命》中、下篇中，亦称"三法"）说，提出论证问题应有

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本之于历史事实，二是原察百姓之见闻，三是观察政治实践的效验。这就是说，要引证史实和古代文献以及百姓的现实经验（见闻），并以现实政治的实践效果来加以检验。很显然，这是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中理性精神的大大发扬。它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进步和发展。这样的论证方法不仅前代所未有，而且同代也罕见，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然而考《墨子》所载，其引述史实多取自古书，或得之传闻，不尽可靠，亦难尽信。但其文讲究逻辑而逻辑严密，在分析、议论、驳论等方面，显然对后来的《荀子》、《韩非子》之文有所影响。此外，墨家讲究论辩的目的，乃在明辨是非。其文大都有所为而发，针对性极强，因而旗帜鲜明，决不含糊，具有观点明确，是非分明的特点。

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按：通"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墨子·非命中》）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是以天下乱。此其故何以然也？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下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子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

子墨子言曰："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

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子墨子曰："若以众之耳目之请以为不足信也，不以断疑，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若苟昔者三代圣王足以为法，然则姑尝上观圣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若鬼神无有，则武王何祭分哉？……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又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是故子墨子曰："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墨子·明鬼下》）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审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墨子·小取》）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淮南子·氾论训》）

3. 文体因革，承前启后

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散文，是早期散文不成熟的形态。因其目的在记录师言以免产生歧异之说，故文不成篇，乃纂辑而成。《论语》所记，多为孔子一人言论。因为孔子讲学，弟子记言，问者略而授业者详，故《论语》有如孔子之语录。《墨子》散文则在此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文体已经呈现出由"对话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趋势。这在《尚贤》、《兼爱》、《非攻》、《明鬼》、《非乐》等篇中，有突出的表现。其特点是：首先，各篇出现了简明扼要的标题。此标题并非可有可无，也非如《论语》似的任取文章首句用作篇名，但其篇名与全篇内容实不相干；而是

犹如一根红线，贯串全篇，实有概括全篇中心思想的作用。其次，《墨子》中亦载墨子之语录，但这些语录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围绕中心论题，互相被连缀成一个整体；就每段语录而言，都是该篇文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再次，《墨子》文章谋篇布局已初具章法，颇有自觉为文的倾向。其文纲目昭然，层次分明，已构成颇具规模的完整篇章；但各篇中仍屡见“子墨子曰”、“夫子曰”或“子墨子言”，说明在形式上仍未完全跳出“语录体”、“对话体”的格式。这显示了《墨子》文体有因有革，它的出现，无疑是散文文体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文体的成熟程度而论，《墨子》似乎晚于《孟子》，而与《庄子》大体相当。这是值得重视的。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

第二节 《老子》、《庄子》

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代表人物。但老、庄之并称，起自魏晋。《老子》、《庄子》则是道家一派的主要代表著作。在先秦诸子之文中，《老》、《庄》之文各具风采，独树一帜，文辞美富，仪态万方，不仅在当时堪称佼佼者，而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

晏，何进孙也。……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三国志·魏书·何晏传》）

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庄周述道以翱翔。（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参之《庄》、《老》以肆其端。（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一 《老　子》

（一）《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

《老子》又称《道德经》，传说为老子所著。而关于老子其人究竟是谁，却又颇多异说。一般认为，老子即李耳，字聃，故又名老聃，春秋时鲁国人，大约与孔子同时而长于孔子，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但据后世学者考证，《老子》一书并非出自老子，而是成于后人之手。有如《论语》之为孔子语录，《老子》一书也大体上荟萃了老子的语录并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但其成书晚于《论语》，大约于战国前期由道家后学纂辑、整理、加工而成。今存《老子》共81章，分上、下二篇。上篇37章，又称《道经》；下篇44章，又称《德经》；合称《道德经》。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不分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同。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庄子·天运》）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礼记·曾子问》）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原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汉书·艺文志》）

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颜师古注：谓《道德经》也），薄仁义，非礼学。（《汉书·扬雄传赞》）

《老子道德经》二卷（原注：周柱下史李耳撰）。（《隋书·经籍志》）

《老子》二卷，《道经》、《德经》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阳，一字聃。（宋濂《文宪集》卷二十七《诸子辩》）

《曾子问》、《庄子》、《韩非子》里的材料，却完全符合，可以证明下列的三点：（子）老聃和老子是一人。（丑）老聃较在孔子前。（寅）《道德经》是老聃的遗言。（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

细考老子即是老聃，略先于孔子，曾经教导过孔子，在秦汉以前的人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是绝好的证据。……《韩非子》有《解老》、《喻老》诸篇，所解所喻均和今本《老子》无甚出入。……《老子》一书，其文笔和内容——如并言"仁义"，如言"万乘之主"等——的确不是春秋末年人所能有，因知其书必系晚出。……老子确是孔子之师老聃，《老子》书也确是老聃的语录，就和《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墨子》是

墨翟的语录一样。……《老子》虽然不是老聃的手笔，但其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老聃的创见，秦、汉以前的人都是我们的证人。（郭沫若《青铜时代·老聃、关尹、环渊》）

《老子》决非出于一人，作于一时，而为战国时人条录道家传诵之格言（原注：《老子》中韵语，当为口耳相传之格言），采自他书之精语，荟萃成书，托之老子。（蒋伯潜《诸子通考》）

（二）《老子》的思想特征

《老子》五千言，文约而意丰。其文谈玄论道，义蕴深邃，具有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

1．天道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

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为核心。据统计，“道”在《老子》五千言中出现过70多次，足见其重要性。以“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乃老子之首创。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的普遍原则和根本规律。“道”的提出，标志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大大提高。老子反对上帝有知、天道有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产生，意味着天上神权的动摇，而这正是地上王权衰落的反映。它无疑是春秋末期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但《老子》所提出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未免有绝对化的倾向，含有明显的消极因素，反映了它的局限性。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老子》四章）

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

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老子》十六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二十一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五章)

2. 朴素可贵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中处处有辩证法思想的闪光。老子观察了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情况，认识到社会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发现了事物无不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既是当时社会不断变革的客观辩证法的深刻反映，也是当时人们认识世界日益深化的表现。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具有自发而朴素的特征，是不彻底、不完备的。如老子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性，忽视其斗争性，含有走向形而上学相对主义的可能性。他脱离了条件讲变化，无异于宣扬循环论。这些消极因素，有碍于他的朴素辩证法的正常发展。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自见，

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老子》二十三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八章)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3. 无为而治的社会政治思想

老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之于人世社会，便自然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老子不讲礼义而讲无为，但他并未忘怀政治，而仍欲治天下，不过是想以"无为"作手段，达到"无不为"的目的罢了。因此，在《老子》一书中，有不少激烈的政治评论和社会批评，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与此相应，《老子》描述了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提出了"小国寡民"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生活在战乱、困苦之中的人民，迫切要求过宁静、安乐生活的愿望，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批判。但这一主张毕竟违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是保守落后的思想。至于所谓"绝圣弃智"与"愚民"的主张，虽也含有对乱世的愤慨和对西周以来礼乐文化的批判，但这种不加区别地否定一切文化的主张，显然是对文明的反动；而其"愚民"政策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用，则大大

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十九章)

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同上四十八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七十四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十五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十五章)

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三)《老子》的散文艺术

《老子》散文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标一格。其文简洁明畅，琅琅可诵；寓理于形，启人深思，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1. 韵散结合的特殊文体

《老子》文体异于诸子。它虽然也像语录，大多三言两语，但与《论语》的纯散文体有所不同。它的文句大体整齐，有的全

是韵语，有的则是韵散结合。其押韵无一定之式，大多随文成韵，较为自由，字数亦不拘一格。其用韵规则不一，有似《诗经》者，亦有似《楚辞》者，可见南北文化融合之趋势。但《老子》毕竟属于“文”而非“诗”，其韵语不能入乐，并且其文多数仍为不押韵之散体。如果仅从形式着眼，这种散韵结合的文体似乎颇类今之“散文诗”。这种文体对《庄子》、《荀子》、《韩非子》中以散为主、间用韵语的文章颇有影响，对后世骈文的形成和赋体的韵散结合，也是有所影响的。

（1）大体整章有韵者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见前所引)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老子》三十九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

（2）韵散结合者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

（3）有似《诗经》者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老子》七十一章)

(4)有似《楚辞》者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二十章)

2. 寓理于形的表现手法

善以具体形象表现抽象哲理，几乎是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的特点。《老子》运用这一手法，可谓得心应手，并有其独特之处。它往往以人所共知而习用，在当时也许还算是先进的某些具体事物如车、风箱、射箭等为喻，而将深刻的哲理融寓其中，目的在于提供论据，起到深化论点的作用，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单纯的比喻。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五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

3. 凝练精妙的口语格言

《老子》的语言极其凝练，而又非常通俗生动。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谚语、格言、警句，可以认为是经过高度提炼并作了艺术加工的人民群众口语的精华。《老子》之所以被誉为“五千精妙”，在很大程度上即得力于此。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九章）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

二 《庄　子》

以学术的眼光看来，《庄子》是先秦道家一派的主要代表著作；而从文学的角度着眼，则毋宁说它是先秦诸子散文之翘楚。它以超尘脱俗的思想，峥嵘浩荡的议论，汪洋恣肆的文风和恢恑憰怪的形象在文学史上高张其帜。它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高出于晚周诸子，而且对后世作家、作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征至怪于齐谐。（李白《大鹏赋》）

（苏轼）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庄子》为书，虽恢恑憰怪，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运，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每奇之。（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释题》）

（庄子）著书10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但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郭沫若《庄子与鲁迅》）

庄子的古今独步的文笔，的确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就是晚年来反对庄子最力的鲁迅，他也很称赞庄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过庄子的思想。……但鲁迅是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闻一多也同样把庄子思想扬弃了。（郭沫若《历史人物·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

（庄子）立意每异想天开，行文多铿锵有韵，汉代的辞赋分明导源于这儿，一般的散记文学应该推他们为鼻祖。足以和他分庭抗礼，在韵文方面当数屈原，在散文或当推司马迁吧。（郭沫若《庄子与鲁迅》）

（一）庄周与《庄子》

1. 庄周其人

据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记，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曾为蒙之漆园吏。其生活时代大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而其生平事迹则难以详考。又据《庄子》一书所记，可略知其一生贫困，鄙薄富贵，拒入仕途，安居陋巷而不显于世。他是先秦道家一派代表人物，后世以之与老子并称，同奉为道家之宗。唐玄宗时，大兴道教，始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为《南华真经》。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宋人有曹商者，……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庄子·列御寇》）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外物》）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

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往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庄子·山木》）

天宝元年，……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旧唐书·玄宗纪》）

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新唐书·艺文志》）

2. 《庄子》其书

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庄子》一书有52篇。然而今存者仅33篇，包括内篇7、外篇15、杂篇11，可见为残本，已非其本来面目。一般认为，内篇乃庄周自著，外篇、杂篇则为其门人后学所著。其实，《庄子》一书并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究竟何篇为庄周自著，不可确指。司马迁曾谓其作《渔父》、《盗跖》、《胠箧》等篇，而这几篇却又都是杂篇、外篇中的文章。因此，虽然《庄子》一书作者非止一人，内容难免杂而不纯，但它毕竟是庄子一派文章的纂辑，可以认为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思想。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庄子》五十二篇（原注：名周，宋人）。（《汉书·艺文志》）

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苏轼《庄子祠堂记》）

窃意但其内七篇是庄氏本书，其外、杂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无可质据，未敢以为然也。大抵《庄》、《列》书非一手所为，而《列子》尤杂。（郑瑗《井观琐言》卷一）

"内篇"断非庄生不能作，"外篇"、"杂篇"则后人窜入者多。（焦竑《焦

氏笔乘》卷二）

自七篇外，不惟不主一家，或亦不出一时。……《让王》、《盗跖》、《渔父》、《说剑》，吾定其为庄作。使非庄作，则《骈拇》、《马蹄》诸篇亦不敢定为庄作也。（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

“外篇”非庄子之书，盖为庄子之学者，欲引伸之，而见之弗逮，求肖而不能也。以“内篇”参观之，则灼然辨矣。……盖非出一人之手，乃学庄者杂辑以成书。（王夫之《庄子解·外篇》）

外、杂二篇，不纯乎庄子之笔，或门人附入，或后人伪托，学者当分别观之。（吴世尚《庄子解》卷四）

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经象删去，不可见矣。……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意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姚鼐《庄子章义序》）

《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庄子》一书，内篇是庄周所作，外篇乃后人注解庄周之书，抄书的人抄了内篇，又把注解一并抄下，统名之为《庄子》。但是内篇、外篇内容、文体俱不相同，一见可以瞭然，绝不能认为出自一人之手。（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我的意思，以为《庄子》是战国秦汉间“论道之人”（原注：“道家”一名似出汉人所撰）所作的单篇文字的总集。（顾颉刚《答钱玄同论〈庄子〉真伪书》，见《古史辨》第一册）

五十二篇本之《庄子》，其内容盖极庞杂。因此书本非庄子自著，亦由庄子之后学记纂而成，且纂辑亦非一次，羼附者固不少也。今仅存三十三篇之本，容亦有所亡佚，但大部乃经崔譔、向秀、郭象诸注家删移增损而成。今晋人所注五本，仅存郭注一本，则《庄子》之本来面目如何，已不可复睹矣。（蒋伯潜《诸子通考》下编《诸子著述考》）

（二）《庄子》的思想特征

就学术渊源而论，庄子的道家学说与老子一脉相承，但又有较大的发展变化。无论在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方面，庄子思

想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1. 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本于老子，却又与老子有所不同。他继承了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但对其消极面作了更大的发挥。庄子也讲"道"，认为"道"是"先天地生"，无始无终，实有而无形，自然而永恒。实际上，他之所谓"道"，乃指人的主体精神。在他看来，世界只不过是人的主体观念的产物，是神秘莫测的，不可知的。他崇尚自然，宣扬天道无为，否定人对自然界的作用，认为"安之若命"乃"德之至也"，从天道自然无为滑进了宿命论的泥潭。庄子的认识论是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他否认事物差别，否认是非标准，否认客观真理，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论。庄子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表明，它是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

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

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庄子·秋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同上)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同上)

2. “无所用天下为”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上，如果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老子是以“无为”而达“有为”，那么庄子则是“不为”。老子虽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而治”之论，实乃“入世”之说。而庄子则自“无为”入于虚无，其“无所用天下为”之论，显系“出世”之说。但与老子一样，庄子并未真正忘怀政治，而是心系天下。《庄子》一书中，仍多愤激之言。其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较之《老子》犹有过之。庄子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比厌恨，选择了消极逃避的道路。他把老子所谓“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思想推向极端，鼓吹毁绝一切文明的蒙昧主义，勾画出一幅所谓“至德

之世”的社会蓝图，梦想回到“同与禽兽居”的洪荒时代。这无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社会大倒退，是极其消极落后的。但其说充满愤激之情，毕竟含有对抗现实的意味。

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庄子·逍遥游》)

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庄子·人间世》)

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庄子·山木》)

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胠箧》)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同上)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

3. 追求自由与超脱的人生态度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

超脱。他从齐物我、齐生死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借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纯属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现实的"逍遥"之乐。然而现实毕竟不能超脱，精神也无绝对自由，因而他同时也主张"安时而处顺"，"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不仅充分反映了庄子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而且也透露了他油滑顺世的另一面。不过，透过庄子超尘入圣的人生理想的表层，即可见到其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原来，看似神秘怪诞、高深莫测的人生追求，只不过是庄子为解决客观现实与主观情志的矛盾而特意描绘的心灵幻影罢了。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同上）

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

彼，游方之外者也。……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同上）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

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约分之至也。(《庄子·秋水》)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庄子·养生主》)

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庄子·大宗师》)

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

(三)《庄子》的艺术成就

《庄子》散文的辉煌艺术成就，别说是"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即使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也可说是罕有其匹。它那意出尘外的构思，超群绝俗的想象，美妙奇幻的意境，汪洋恣肆的文风，不仅前所未见，而且后所难及。它开辟了散文艺术的新境界，促进了文学自身的新飞跃。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庄子》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1. 意出尘外的构思

为了表达追求绝对精神自由和彻底超脱现实的思想主旨，《庄子》散文的构思呈现出超尘绝俗的倾向。在庄子看来，天下黑暗而污浊，不能用实实在在、堂皇正大的言语与世人讲论，故倡言"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即采用异乎寻常的艺术形式，表现遗世绝尘的思想内容。因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庄子》更多地注目于寓言和神话。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加工改造，也不乏自出机杼的即兴创作。庄子尤擅形象思维，其文绝少干巴巴的说教。他把深刻的哲理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妄情节之中，在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里巧

妙地表现自己的真实思想。《庄子》中数以百计的寓言故事，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就一篇文章而言，往往是一个个故事环环相套，连缀而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述一个中心思想，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连环式的结构。据统计，《庄子》内篇七篇即如此连缀了近50则寓言故事。以《养生主》一篇为例，全文可分六段，第一段为全文之纲，总论养生之道。以下四段则分别讲述了《庖丁解牛》、《右师一足》、《泽雉》、《秦失吊老聃》四个寓言故事。最后一段以薪尽而火传为喻，总结全文，进一步说明顺应自然之道即为养生之要这一中心。《庄子》文章构思之妙，于此可见一斑。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天下》)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寓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曰："……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刘熙载《艺概·文概》）

2. 恢恑憰怪的形象

《庄子》散文的不朽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中恢恑憰怪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在《庄子》中层现叠出，异彩纷呈，令人眼界一新，神思飘飞，于惊奇骇怪中获得非凡的审美享受。《庄子》之文充分体现了文学的一大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在庄子一派人物看来，大辩不言，言不尽意；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他们特别强调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重视不带任何实用功利性的审美规律，往往把真实的思想不露痕迹地寄寓于千奇百怪的形象之中。因此，他们更多地运用想象与虚构，以极富神奇色彩之笔，描绘出众多惊世骇俗的超现实形象。诸如：其大无比的鲲鹏，吸风饮露的神人，似有若无的罔两与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庖丁，形体残缺的支离疏，七窍皆无的浑沌，望洋兴叹的河伯，志趣判若霄壤的鹓鶵与鸱，侃侃而谈死之乐的髑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痀偻丈人，运斤成风、出神入化的匠石，争地而战、伏尸数万的触蛮，其圆五尺的神龟……如此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形象，纷至沓来，争奇斗胜，把读者引入一个超越时间、空间，不辨上下古今的恢宏壮观的艺术境界。这是《庄子》特异的艺术魅力，也是它高于先秦诸子的一大艺术成就。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

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同上）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庄子·齐物论》）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庄子·人间世》）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庄子·秋水》）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则阳》）

明日，余且朝。君曰："渔何得？"对曰："且之网得白龟焉，其圆五尺。"……乃刳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筴。（《庄子·外物》）

（《庄子》）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刘熙载《艺概·文概》）

3. 汪洋恣肆的文风

庄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其作虽亦如同诸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但他极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庄子》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引人入胜，令人激赏，闪烁着迷人的艺术光彩。

庄子运用语言的功夫堪称炉火纯青。其为文得心应手，可谓意到笔随。《庄子》文中，随处可见穷形尽相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刻画；不管是鸟、兽、虫、鱼、灵龟、大树，还是风、云、山、水，神怪、异人，无不写得惟妙惟肖、绘声绘色。如《逍遥游》写

鲲鹏、斥鴳、神人、大树，《齐物论》写风、至人、庄周梦蝶，《养生主》写庖丁解牛，《人间世》写栎社树、商丘大木、支离疏，《大宗师》写真人、涸泉之鱼，《马蹄》写马，《秋水》写河伯，《徐无鬼》写匠石与郢人，《外物》写涸辙之鲋、任公子钓大鱼、神龟，等等，均可谓淋漓尽致、栩栩如生。此外，庄子又是一位讽刺大师。在其笔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天运》写丑妇效颦，《秋水》写井蛙自负、鸱得腐鼠，《则阳》写触蛮之争，《外物》写儒以诗礼发冢，《列御寇》写曹商"舐痔得车"，等等，无不词锋锐利、文笔辛辣。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庄子》汪洋恣肆的文风。

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庄子·逍遥游》）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庄子·齐物论》）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庄子·人间世》）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

之，雒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庄子·马蹄》)

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庄子·徐无鬼》)

任公子为大鉤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鉤，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庄子·外物》)

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庄子·天运》)

子独不闻夫埳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庄子·秋水》)

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嚇！"(同上)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同上)

第三节 《孟子》、《荀子》

孟子、荀子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而《孟子》、《荀子》二书则是《论语》之外重要的儒家著述。故历来学者多以孟、荀并称，《史记》亦合孟、荀为一传。此二家无论学术、文章，对后代影响都较大。但唐代韩愈扬孟抑荀，其后五代后蜀主孟昶始列《孟子》入石刻"十一经"，南宋朱熹则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明、清科举以"八股文"试士，又限以《四书》文句为题。于是《孟子》成为家弦户诵之"经书"，影响大过《荀子》。然而从散文的发展看来，《孟子》、《荀子》实在是自具特色、各有千秋的。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

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斯道也……，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原道》)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韩愈《读荀子》)

参之孟、荀以畅其支。(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四子》，"六经"之阶梯。(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谢墉《荀子序》)

昌黎之文，本于官礼，而尤近于孟、荀。(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

一 《孟 子》

(一)孟轲与《孟子》

1. 孟轲其人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或说字子舆、子车，盖出附会，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乃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裔。孟轲受业于孔子嫡孙子思(孔伋)之门人，故其学术思想渊源与孔子一脉相承。他始而设教，继而游说从政，曾历经齐、宋、滕、魏等国，齐宣王时，一度仕齐为卿。但因其主张被当时的统治者认为不合时宜，故到处碰壁，学不能用，于是停止周游，反邹终老。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西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赵岐《孟子题辞》)

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同上)

孟轲、荀卿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称，至今厥字不传。原因其故，皆由战国之士乐贤者寡，不早记录耳。(史鹗《三迁志》引《中论序》)

(王肃)《圣证论》云轲字子车，而此志无字，未详其所得。(《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轲字子舆，为齐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张守节《正义》)

孟子盖鲁公族孟孙之后，不知何时分适邹，遂为邹人。(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

下》）

（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同上）

（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孟子·公孙丑下》）

2. 《孟子》其书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向来有三种说法。一说为孟子自著，一说为孟子死后由其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所记纂，另一说则是司马迁认为此书乃孟子与万章之徒所合著。现在看来，司马迁之说较为可信。《孟子》一书虽非尽出孟轲手笔，其中自有公孙丑、万章之徒的记述，但孟子确曾亲自参与其事，此书也确实反映了孟子本人的思想和风格。

《孟子》今存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又各分上下。另有所谓《外书》四篇，实为后人所伪托，久已湮没不存。至于明人姚士粦所传、熙时子注之《孟子·外书》，就更是"伪中出伪"之作了。

（孟轲）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十一篇（原注：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汉书·艺文志》）

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其篇目则各自有名。孟子，邹人也，名轲，……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赵岐《孟子题辞》）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同上）

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韩愈《答张籍书》）

古之学君臣父子之道，必资于师。师之贤者，其徒数千人，或数百人，是以没则纪其师之说以为书，若孟轲者是已。传者犹以孟轲自论集其书，不云没后其徒为之也。（张籍《上韩昌黎书》）

《孟子》七篇，或云万章之徒所记，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诵法《论语》之书也。《梁惠王》与《公孙丑》之篇名，则亦章首字句，取以标名，岂有他哉！（章学诚《文史通义·匡谬》）

（《孟子》）大约是孟子弟子所编，曾经孟子看过，现行七篇也没有可疑为伪的地方。（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时代》）

《外书》四篇，经岐鉴别为伪，后无传者，遂亡佚。……至明季姚士粦所传《孟子·外书》四篇，则又伪中出伪，并非汉时之旧，更不足道。（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二）孟子的思想特征

1. 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死生有命”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孟子的天命思想具有道德的属性，这是他对孔子天命论的发展；孟子宣称“万物皆备于我矣”，这是他对孔子先验论的发展。孟子并从这些发展，进而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论，构成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基础则是他所谓的“性善”论。孟子认为“善”是人天生的本性，为人所固有；孝亲、忠君、敬长等等伦理行为，均出于人的本性；所谓“仁、义、礼、智”等道德纲常，也都是“我固有之也”。这种抽象的“性善”论，显然意在论证剥削阶级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充分证明他的哲学体系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

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同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同上)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同上)

孟子曰："莫非命也！……"(同上)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同上)

2. 施"仁政"、行"王道"的政治主张

孔子讲"仁"，孟子则以"仁义"并重，这无疑是对孔子仁学的丰富和补充。孟子以其"性善"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仁政保民和实行王道政治的主张。较之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思想，更加具体、系统，显然是一大进步。从"保民而王"的思想出发，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之论。这是产生于社会发生新变革的战国时期的新观念，闪射着耀眼的思想光芒；不仅在当时堪称惊世之论，而且对后代有着重大影响。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

(孟子)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齐宣王)问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三)《孟子》的文学价值

孔丘、孟轲并称"孔孟"，向来为儒家正统之代称；而《论语》、《孟子》同列《四书》，又都是儒家必读之经典。比较《论》、《孟》二书，不难看出，孟子的思想显然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孟子》一书的对话体形式，也分明是对《论语》语录体形式的仿效，并已把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而为长篇大论。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孟子》散文的成就和影响较《论语》已有过之；即使在所有先秦诸子中，《孟子》也可说是仅次于《庄子》的一部散文杰作。《孟子》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刻画了神情毕现的孟轲形象，体现了至精

至密的论辩艺术和气盛辞壮的语言风格，并且还提出了一些新颖独到的文论见解。

1. 神情毕现的孟轲形象

正如《论语》充溢夫子之风采，《孟子》也毕现孟轲之神情。《孟子》一书，以孟轲为中心，通过对其言行举止、神情语态的生动描写，充分展现了孟轲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出色地刻画了这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雄辩家、大儒者的感人形象。

（1）情感倾向

《孟子》中的孟轲，不仅具有自成体系的思想特征，而且表现出鲜明的情感倾向。其喜怒爱憎之情，在驳难答疑中溢于言表。且看：对残酷暴虐的时政，他愤怒斥责；对苦难深重的人民，他怜悯同情；对昏庸无能的国君，他冷嘲热讽；对好学深思的弟子，他诲语谆谆；对"先圣"孔子之辈，他无比崇敬、热烈赞颂；对杨、墨异端之流，他无情抨击、竟至痛骂……在这位雄辩家侃侃而谈的字里行间，奔涌着一股股浓烈的情感浪潮，充分展示了孟轲其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感人形象便鲜明地凸现在读者的眼前。

（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

不爱及其所爱。"公孙丑问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曰："以齐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同上)

(2)性格特点

《孟子》中的孟轲，还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大儒者形象。他忠于孔学，坚持理想，孜孜不倦，百折不挠；他充满自信，胸怀"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非凡气概；他正气凛然，傲骨铮铮，信念坚定，刚直不阿；他气度不俗，机智过人，倔强坚忍，直率可亲……这些特点，不仅鲜明地展现了孟轲这一大儒形象的个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战国乱世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之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性。因此应该说，《孟子》所刻画的孟轲形象是非常成功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按：指大禹、周公、孔子)者。……"(同上)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孟子·滕文公下》)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公孙丑下》)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齐人伐燕。或问

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同上)

2. 至精至密的论辩艺术

孟轲在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孜孜游说、滔滔雄辩。客观情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然。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轲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熏陶，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锤炼，成就了他的辩才。反映在《孟子》一书中，便是他那令人赞叹的析义至精而用法至密的论辩艺术。

围绕着施仁政、行王道这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轲在论辩中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既有纲领式的阐述，更有具体而入微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特别重视把握论辩中的主动权，总是居于有利的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图，层层进逼，步步深入，将对方引入自己的"埋伏圈"内，使其"就范"。他善于抓住所论问题的要害，掌握问题中的矛盾变化情况，鲜明而生动地进行论辩。此外，比喻手法的出色运用和寓言故事的适当穿插，也大大增强了孟子论辩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

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曰："……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公孙丑上》）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题辞》）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刘熙载《艺概·文概》）

（《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就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着一百五十九种譬喻。（李炳英《孟子文选·前言》）

3. 气盛辞壮的语言风格

孟子颇有知人之明，也不乏自知之明。他曾自谓“知言”，并称自己“善养吾浩然之气”。故其发而为文，气势充沛，词锋逼人，颇富阳刚之美。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其语言明白晓畅，不事雕琢，很少有生僻的词汇和别扭的句法，真可谓明朗而爽快，锋锐而壮美。《孟子》散文气盛辞壮的语言风格，历来备受称道。它在后世散文家的心目中被崇奉为典范之作，不是没有道理的。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

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赵岐《孟子题辞》)

缀虑裁篇，务盈守气。……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风骨》)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七篇之言，近而远，浅而深，疏畅条达而详允精密。不为钩深索隐，而肯綮盘错，通会无迹。(郝敬《读孟子》)

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刘熙载《艺概·文概》)

4. 新颖独到的文论见解

在《孟子》一书中，还有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论述，不失为新颖独到的创见。除了著名的"知言养气"说而外，孟子还就如何理解、评论诗、书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观点。此其中，既有对审美主体的强调，也有对审美对象和创作主体的重视。它们出于具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孟子之口，不仅是对儒家传统文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重大贡献。虽然其说不免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春秋以来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和战国之时"处士横议"的时代风气，孟子所提出的这些含义丰富的文论见解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影响深远的。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孟子·万章上》)

孟子谓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下》)

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说诗者，当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辞，文不显乃反显也；不可以辞害其志。……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孟子注疏》卷九上《万章上》赵岐注)

古今说诗者多矣，吾独有味乎孟氏"以意逆志"之言。(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虞东学诗序》)

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夫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顾镇《虞东学诗诗说·以意逆志说》)

然论其人，必先论其世者，何也？……苟不论其世为何世，安知其人

为何如人乎？余之论选诗，义取诸此，其六朝诗人列传，仿知人而作；六朝诗人纪年，又因论世而起云。（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

善哉，孟子之言诗也，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此其术，孟子亦言之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故四家诗皆有序。序者，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朱自清《诗言志辨》）

二《荀 子》

（一）荀况与《荀子》

1. 荀况其人

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荀卿，亦称孙卿。其生卒之年，无从考定，大约活动于公元前 298 年—前 238 年间，年寿颇高。概其生平，可谓生于赵，游于齐、秦，仕于楚，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楚李园杀春申君而荀卿废，遂终老兰陵。其一生行事亦与孔子、孟子相类：始则治学，继而周游、出仕，终则设教著书。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学术上集大成的一位人物。其弟子甚众，著名者有韩非、李斯、浮丘伯等。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荀卿）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

《索隐》)

荀卿又称孙卿。自司马贞、颜师古以来，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故改“荀”为“孙”。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或曰‘信都’，或曰‘申徒’，或曰‘胜屠’，然其本一司徒也。”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谢墉《荀子序后记》)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荀子·强国》)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荀子·儒效》)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荀子·议兵》)

客说春申君曰：“……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战国策·楚策四》)

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史记·吕不韦列传》)

(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史记·李斯列传》)

(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楚元王交字游，……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书·楚元王传》)

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汉书·楚元王传赞》)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赖以不绝者，荀卿也。(汪中《述学·补遗·荀卿子通论》)

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同上)

2. 《荀子》其书

《荀子》一书，今传32篇。一般认为，32篇中，《大略》、《宥坐》、

《子道》、《法行》、《哀公》、《尧问》6篇乃"弟子杂录"，其余26篇则为荀子手笔。也有人认为另有《仲尼》、《致仕》2篇亦属弟子杂凑，甚至有别家文字窜入者。现在看来，《荀子》一书虽非成于一时一地，其中确有荀子后学之作掺入，但基本上保存了荀子的思想，而且其中大部分乃荀子自著，是较为可信的研究荀子的原始资料。

《荀子》又名《孙卿子》、《孙卿新书》，唐杨倞为此书作注，又将刘向校定本所定各篇次序略加更动，始改其名为《荀子》。

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刘向《叙录》）

《孙卿子》三十三篇（原注：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汉书·艺文志》）

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杨倞《荀子序》）

此篇（按指《大略》）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荀子》卷第十九杨倞注）

此（按指《宥坐》）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同上卷第二十杨倞注）

今案读全书，其中大部分固可推定为卿自著。然如《儒效篇》、《议兵篇》、《强国篇》，皆称"孙卿子"，似出门弟子记录。内中如《尧问篇》末一段，纯属批评荀子之语，其为他人所述尤为显然。又《大略》以下六篇，杨倞已指为荀卿弟子所记卿语及杂录传记，然则非全书悉出卿手盖甚明。

《荀子书》初由汉刘向校录，名《孙卿新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孙卿子》。唐杨倞为作注，省称《荀子》。今遂为通名。（梁启超《荀卿及〈荀子〉》）

自《大略》、《宥坐》以下六篇乃"弟子杂录"，早成定论。……我断定《仲尼篇》也是"弟子杂录"。……《致仕篇》也有问题，……整篇不成条贯，显系杂凑，而且有从别的书里面摘录的文字。……《荀子》书事实上是由门人弟子纂辑而成。（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二)关于荀子思想的几个问题

荀况是继孟轲之后的一位儒家大师。他的学问渊博，涉猎广泛，阅历非凡，著述宏富。这些因素，使其思想较为驳杂。但总的看来，其思想属于儒家，接近于孔子的思想，而与孟子的思想有所不同。故《韩非子·显学》列以为儒家八派之一，韩愈《读荀子》称其"大醇而小疵"。他是先秦时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具有值得注意的若干新特点。

1. "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观

《荀子·天论》反映了荀况对于天人关系的新见解，是一篇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的哲学论文。荀况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信念，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无疑是大大超过前辈儒家传统思想的高见。它是荀况吸取了百家思想的精华之后而产生的创造性的认识，标志着对于天人关系认识的新飞跃。这一思想的产生，意味着上天权威的削弱和人王地位的下降。它反映了荀况思想的光辉，应予较高评价。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同上)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同上）

2． 关于“性恶论”

荀子与孟子都对“人性”作过探索。对于人的本体的重视，反映了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孔子虽曾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他对“人性”问题并无明确论述。孟子始明确提出所谓“性善论”；而仿佛与孟子有意对立，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荀子之说，否定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论，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作用，并重视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多少含有唯物的因素。不过，孟、荀各执一端，认识迥异，而结论却一致，即都注重学习。在孟子，认为人性善，故能学习；在荀子，则认为人性恶，故必须学习。他们的认识都不尽符合客观实际，并且都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同上）

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同上）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同上）

3. 所谓“法后王”的政治观

荀子主张实行“令行禁止”、“天下为一”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其主要思想为“隆礼”和“重法”。与此同时，他明确地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主张，与孟子“言必称尧舜”的“尊先王”的思想恰相对立，于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和争议。其实，荀子所谓“后王”，乃指周之文王、武王，即“先生”(尧、舜、禹、汤、文、武)中的最后之王；所谓“天下之君”，乃指君临天下的周天子。这与孔子所谓“吾从周”类似。荀子所谓“法后王”的“王者之制”，实含有向往周制的意义。当然，荀子取百家之长，在“复古”旗号之下，亦有革新内容在。因此，孟、荀虽有“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名义之别，实质上却并非大相径庭，何况荀子也曾有过“法先王”之说。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荀子·非相》)

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是大儒者也。(《荀子·儒效》)

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

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

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荀子·王制》)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同上)

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荀子·非相》)

基必施，辨贤罢，文、武之道同伏戏。由之者治，不由者乱何疑为？(《荀子·成相》)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

荀卿"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愚以为王氏似未达荀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闵战国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王"，与荀所言"后王"，皆谓周王，与孔子从周之义不异也。荀卿岂逆料李斯之仕秦，而令其用秦法哉？七国僭号，名虽王，实诸侯也。孰可以当"后王"之名？而荀子乃肯法之耶？方是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法后王"条）

他（按指荀子）的所谓"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所谓"先王"者，因先于梁惠、齐宣故谓之"先"，所谓"后王"者，因后于神农、黄帝故谓之"后"，如此而已。但孟子的"尊先王"还保有着托古改制的用意，如他的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便是绝好的例证。荀子则差不多老老实实的在想复兴"周道"了。（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4. 关于"人治"与"法治"

孔子兼讲"德"与"礼"，主张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荀子则兼讲"礼"与"法"，主张为政"隆礼重法"。不过，他在重视"礼治"与"法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人治"，明确地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这种强调"人治"的思想，是对前辈儒家传统观念的新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甚大。荀子把人的因素摆在首位，在《劝学》、《修身》、《不苟》、《性恶》、《君子》等篇中都反复强调重视个人的修养和品质。事实上，法由人制定，也要靠人去执行和维护，因而人的素质如何，确实关系重大。不过，荀子之强调人治，其主要意图还在突出所谓"君人"、"君子"的作用，替实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者造舆论，归根结柢是为所谓"一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则水圆。……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

（三）《荀子》之文的主要特色

诸子之文发展到了《荀子》，更趋成熟、完善。《荀子》的文章，已不再是语录或对话的连缀，而是自成体系的专题论文。这在文体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新的飞跃。就散文艺术而论，先秦诸子中成就较高者，当推《庄子》、《孟子》，而《荀子》则以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可以与之“鼎足而三”。

荀子的文章颇为宏富，……他以思想家而兼长于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传是他的弟子的韩非，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台柱了。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1． 学者之文，严谨周详

荀子是一位融汇贯通百家之学的大儒。出自这位大学者之手的《荀子》的文章，内容堪称博大精深，而形式则可谓严谨周详。具体表现为构思周密，论述详赡。如《劝学》、《不苟》、《王制》、《王霸》、《富国》等篇，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文往往有总论，有分论；层层深入，节节变化；中心突出，条达细密。这在先秦诸子之文中，是颇为出色的。其次是独立成篇，结构严整。《荀子》之文多系专题式学术论文。这种立意统一、体式宏伟的长篇巨制，不仅结构完整，全面系统，而且纲目昭然，条理明晰。它们标志着我国议论散文的成熟，成为后世论说文体的典范。尤为难得的是，《荀子》之文还长于正论反驳，善立善破。特别是驳论写法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论说文体的新发展；后经韩非发扬光大，

遂成论说文体之一宗，其意义不可小视。如《荀子·正论》，先标举“世俗之为说者”的一个反面论点，然后反复驳辩；引经据典，一驳到底。全篇各段除末三段直驳“子宋子”之说外，都是先引“世俗之为说者”的反面论点作为“靶子”，而后逐一驳正之。其主旨则在伸张自己的“正论”。此外，《性恶》也是《荀子》中一篇出色的驳论之作。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荀子·不苟》第一、二段）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胥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宣之耳哉！（《荀子·正论》第一段）

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刘熙载《艺概·文概》）

2. 长者之文，淳厚老练

读《荀子》之文，似觉听长者之说，循循善诱，谆谆而论，娓娓而谈。虽有辩说，而无《孟子》似的高谈阔论之概，亦无《国策》似的纵横捭阖之气；确乎不失儒者之风、长者之度。其艺术风格可谓淳厚老到，圆熟练达，谨严有度，明晰条畅。《劝学》最能反映荀文的这种风格，它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即反复阐述，孜孜为说，

细致周密地论述了“劝学”这一中心论题。与其风格相适应，荀文多用生动比喻，有时甚至是一连串大量类比，如《劝学》中，取譬设喻几占全文之半。但他不大用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道理。据统计，《荀子》32篇中，仅有寓言故事《蒙鸠为巢》（《劝学》）、《涓蜀梁》（《解蔽》）、《曾子食鱼》（《大略》）、《欹器》（《宥坐》）等寥寥数则而已。这是与其他先秦诸子如《庄子》、《孟子》、《韩非子》等大不相同之处。它体现了《荀子》文章典重淳厚的特点。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𫐓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𫐓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同上）

3．通才之文，博大精深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是集大成的思想家。他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集百家之大成。他融汇贯通百家学说，有继承，有批判，有发展，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其学无所不窥，无所不精。他在当时，无愧为大儒、通才。《荀子》一书充分体现了通才之文博大精深的特点，倘按其文章主要内容分类，几乎可说是应有尽有。如哲学专论有：《天论》、《荣辱》、《解蔽》、《正名》、《性恶》等；政治学专论有：《非相》、《仲尼》、《儒效》、《王制》、《王霸》、《君道》、《臣道》、《强国》、《正论》、《礼论》、

《君子》等；军事学专论有《议兵》；经济学专论有《富国》；教育学专论有《劝学》；学术史专论有《非十二子》；伦理学专论有《修身》、《不苟》；人才学专论有《致士》；音乐艺术专论有《乐论》。尤为难得的是，《荀子》中还出现了较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成相》与《赋篇》(包括五赋二诗)。以上仅就《荀子》前26篇大体分类如此，其实各类之间亦有交叉参互。于此可见，荀子之文的确是渊综广博，足称“宏富”。

(1)关于《成相》

《成相》是荀子学习民间文艺形式而创作的一篇韵文。关于“成相”之释，颇多异说。一般认为，“相”乃乐器，“成”即奏，“成相”犹言“击打吹弹乐器”，与今之“打起鼓”、“敲起锣”类似，为说唱文学中惯用的开场套语。此文“杂论君臣治乱之事”，表达了荀子的政治思想。全篇以“请成相”之开头语为标志，分三大段，共由56节组成。各节相对独立，又在同一政治主题下有所联系。每节五句，杂言体形式，其构成大体上是“3、3、7、4、7”。除第四句外，每句押韵。这种形式，有如后世之大鼓，弹词，在当时诚属独创之体。故其文学意味虽不甚浓，而开创之功应予重视。

“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礼记·乐记》“再成而灭商”句郑玄注)

“相”，谓送杵声。(《礼记·曲礼》“邻有丧，舂不相”句郑玄注)

“相”，拊也。所以辅相于乐，奏乐之时先击相。(《太平御览》五八四卷《乐部》引《风俗通》)

(《成相》)以初发语名篇，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故下云“托于成相以喻意”。……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荀子·成相》杨倞注)

“相”乃乐器，所谓舂牍。又古者瞽必有相，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篇首即称“如瞽无相何伥伥”，义已明矣。首句“请成相”，言“请奏此曲”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八引卢文弨语)

(孙卿)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而托之瞽矇之词，以避患也。(郝懿行《荀子补注》附录《与王伯申引之侍郎论孙卿书》)

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亦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请成相"者，请成此曲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八引俞樾语)

观荀卿作《成相篇》，已近于赋体，而其考列往迹，阐明事理，已开后世之联珠。(刘师培《论文杂记》第八条自注)

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荀子·成相》)

世之愚，恶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绌，春申道缀基毕输。(同上)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同上)

成相竭，辞不蹶，君子道之顺以达。宗其贤良，辨其殃孽。(同上)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同上)

请成相，言治方，君论有五约以明。君谨守之，下皆平正国乃昌。(同上)

臣谨修，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同上)

(2)关于《赋篇》

在中国文学史上，荀子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因而历来被认为赋的始祖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卿赋原有10篇，今《荀子·赋篇》仅存《礼》、《知》、《云》、《蚕》、《箴》五篇，末附《佹诗》二篇，《小歌》一篇。其中，《礼》、《知》二赋为说理之作，《云》、《蚕》、《箴》三篇则为咏物之赋。其形式颇为一律，如同制作谜语。基本上是前段设谜，以四言韵语围绕谜底铺陈形容；后段点题，杂以散文句式，设为问答之辞，末以结语揭示谜底。至于《佹诗》与《小歌》(按：《小歌》亦见《战国策·楚策四》及《韩诗外传》卷四，称之为"赋"，文字略有出入)，乃《赋篇》之总结，有如

《楚辞》之“乱曰”。荀赋五篇，以《箴赋》较为生动，余则训诫之味颇浓，艺术价值不高。但《荀子·赋篇》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在“赋”的领域里自成一家，对汉赋影响甚大，因而值得重视。

孙卿赋十篇。（《汉书·艺文志》）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刘勰《文心雕龙·谐隐》）

（赋）既与诗分体，则义兼比兴，用长箴颂矣。单行之始，椎轮晚周，别子为祖，荀况、屈平是也。（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篇》）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箴（同“针”）。（《荀子·赋篇·箴》）

第四节　《韩非子》、《吕氏春秋》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著作，《吕氏春秋》则历来被认为是杂家之书。二书同出于战国之末，思想、艺术各有特色和成就。在先秦诸子之文的发展历程上，它们是耸立于末端的两座丰

碑。

一 《韩 非 子》

(一)韩非与《韩非子》

1. 韩非其人

韩非(约前280—前233)，其生年不详，而卒年可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生平，据此可知其出身、爱好、学问渊源、个性特征、非凡能力及悲剧结局。唯《史记》所载韩非因受李斯、姚贾谮害下狱而死，与《战国策·秦策五》所载韩非之死的情节有所不同。看来韩非之死既有客观的因素，亦有主观的因素；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四国为一，将以攻秦。……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短之，曰："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且梁监门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所以厉群臣也。"

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今王听谗，

则无忠臣矣。"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故明主不取其汙，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战国策·秦策五》)

(秦始皇)十四年（前233）……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史记·秦始皇本纪》)

2．《韩非子》其书

《韩非子》一书集中汇编了韩非的著作。此书是先秦法家集大成的一部重要典籍，是在"百家争鸣"的高潮之中产生的一部丰富多彩的学术巨著。今传《韩非子》共20卷，55篇。此书基本上是韩非亲手所著，但其中也有后学者之辑录，故与先秦其他子书一样，仍属一家之学。如首篇《初见秦》，其作者为谁，迄今尚无定论。再如《有度》篇，论及齐、楚、燕、魏之亡，乃韩非死后之事，可知亦非韩非所著。又如《解老》、《喻老》二篇，思想、笔调及引文均有出入，似亦非一人所作。总的看来，此书多系韩非所著，但在展转流传中，难免有增删错杂之处。而且此书在当初，大约单篇流行，司马迁所见者即为单篇文章。其系统辑录成书，当出后人之手。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韩子》五十五篇（原注：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汉书·艺文志》)

阮孝绪《七略》云："《韩子》二十卷。"(《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张守节《正义》)

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一)

《初见秦》篇又见《秦策》，以为张仪说秦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沙随程氏说："非书有《存韩》篇，故李斯言非终为韩不为秦。后人误以范雎书厕其间，乃有举韩之论。"是以《初见秦》为范雎书。然篇中论长平、邯郸、李下之事，正雎以此畏罪而乞退者，岂得转谓范雎书哉？……近人有疑为蔡泽或泽之徒为之者，殆或近是。（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四《李斯韩非考》）

《初见秦》篇的著作权实在是应该划归吕不韦，假使改收在《吕氏春秋》里面作为附录，倒是更合适的。……因此《韩非子》一书中的各篇的著作权都应该从新审定。其中必然还有性质相同而被误收的东西。例如《解老》与《喻老》便又是一个例证。这两篇的作风和见解都不同，而且所据的《老子》的底本也有文字上的出入——如《喻老》引"咎莫憯于欲得"，《解老》"得"字作"利"；《喻老》引"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解老》"辍"字作"绝"。象这样，两篇也同样不会是出于一个人之手。（郭沫若《青铜时代·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韩非子·有度》）

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先王以三者为不足，……先王之所守要，……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先王贵之而传之。（同上）

《有度》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12年了。可见《韩非子》决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胡适疑此篇（按指《有度》）言及荆、齐、燕、魏之亡，在韩非死后，必非非作。细究本篇原文，实不然。……本篇所谓亡，非灭亡，乃衰微之意。……但从他方面观之，韩非可靠诸篇中，皆反对效法先王，……而《有度》五次称先王，与韩非思想根本不同，可知为他人作。（刘汝霖《周秦诸子考》）

(二)韩非的法家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总代表。他继承、总结了前辈法家包括慎到、吴起、商鞅、申不害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特征，值得我们重视。

1. 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的政治观

韩非在批判地继承前辈法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申不害之"任术"，公孙鞅之"明法"和慎到之"乘势"作了总结和发展，并且吸取了荀子和道家的某些理论，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的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法治思想。这在《定法》、《难三》、《难势》、《和氏》等篇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韩非这一以"法"为中心，结合"术"与"势"，将三者组成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的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故其说传入秦国，为始皇击节赞赏。并被其用之于统一中国的实践，实非偶然。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公孙鞅之治秦也，……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对曰："申子未尽于

术，商君未尽于法也。……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韩非子·定法》)

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慎子曰："……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应慎子曰："……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

2. 反对复古，主张革新的社会历史观

先秦诸子大多善于纵论古今，孔、孟之论"三代"，老、庄之讲远古，都说明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他们大都是古非今、贵古贱今。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不同。他也讲历史，但已明确地提出了古今有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他不仅认识到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反对盲目崇古，主张着眼于现实，立足于当今；嘲笑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人，"皆守株(待兔)之类也"。这种反对复古、主张革新，反对因循旧制、主张因时而变的思想，无疑反映了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这在《五蠹》篇中有较为集中的论述。应该看到，韩非仅仅从社会物质财富的变化展开论证，虽然新颖，但不免有片面性。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毕竟是超过前人的有识之见。还应指出，韩非的这一思想也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见其学术思想确实是渊源有自的。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

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

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同上)

公孙鞅曰："……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同上)

3. 重质轻文、崇实反虚的文艺观

韩非的文艺观亦集法家文艺观之大成。其基本观点是：重质朴轻文饰，重内容轻形式，重实用轻丽辞，重真实反虚华。

(1)重质朴轻文饰

韩非认为，"美"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作为"美"的事物，其本质就是美的，无需加以文饰。靠人工文饰之"美"，其本质原即不美。这种崇尚质朴而反对文饰的观点，显然

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但韩非根本否定"文饰"的作用，未免片面；既然"文为质饰"，二者之间便存在着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忽略了这一点，就难免要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不见其采，下故素正。（《韩非子·扬权》）

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此谓"养殃"。（《韩非子·八奸》）

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韩非子·显学》）

（2）重内容轻形式，重实用轻丽辞

韩非在《外储说左上》中，借"秦伯嫁女"、"买椟还珠"的寓言故事，表达了重内容轻形式、重实用轻丽辞的观点。他认为，讲究形式，必然损害内容；"滥于文丽"，定然有伤功用。这种强调内容与功用，排斥形式与丽辞的观点，与其"好质而恶饰"的思想是一致的。韩非把内容与形式、"文丽"与功用完全对立起来，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不免有片面之失。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

（3）重真实，反虚华

韩非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奉实用为宗旨，崇尚质实，反对虚华。在他看来，“华而不实”者亦必“虚而无用”。因此，他力排“虚辞”而推崇“实事”，并把“不诚之言”斥之为“窕言”。他还借“画鬼魅易画犬马难”的寓言，含蓄地表达了艺术乃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其是非、美丑、难易、成败，均受客观事物之制约的观点。然而贬斥画鬼魅之类的艺术虚构，意味着要求艺术必须与客观事物丝丝入扣，不能“反事之情”。这显然不尽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因为太实反而是艺术之大忌。应该指出，韩非的文艺观走向极端，势必对一切文艺、审美活动采取拒斥甚至取缔的态度。这就难怪他要鼓吹所谓“燔诗书”了。

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是故求其诚者，非归饷也不可。(同上)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同上)

或曰：李子设辞曰：“夫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谓之窕言。”……夫曰“言语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者，必不诚之言也。(《韩非子·难二》)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则见以为华而不实；……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韩非子·难言》)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

(三)《韩非子》的散文特色

与法家的刻深寡恩、真率直露的特点相适应，韩非之文具有冷峻峭刻、锋芒毕露的特征，在先秦诸子之文中自成一家，独具特色。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

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刘熙载《艺概·文概》)

1. 直言畅论，个性鲜明

韩非的法家思想鲜明直露，无所掩饰；其文亦直言畅论，不加文饰。读其文，令人有冷峻、尖锐、直率、犀利之感。他在《备内》篇中剖析当时的人际关系，无情地撕开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那丑恶、肮脏的实质揭露无遗。他在《八奸》篇中专论内奸篡夺政权的危险和手段，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在其名作《说难》篇中，他论游说之难，"身危"种种，也是畅论直言，无微不至。韩非之文，鲜明地显露出作者的个性特征：不善言辞而善著书，不擅人际交往而擅观察生活。且作者又贯通古今，故其文总是具有高度的总结性，非凡的深刻性，凌厉的攻击性，又具有细致、周

详、透彻、明晰的特点。它不同于《论语》的雍容和顺娓娓而谈，也不同于《孟子》的气势浩然、滔滔雄辩，更不同于《庄子》的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和纵横家的辩丽横肆、夸说浮辞。可以说，韩非的思想、气质、性格、为人和他的文章是融为一体的。所谓“文如其人”，未必人人如此；但对韩非说来，确能得到体现。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韩非子·备内》)

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韩非子·八奸》)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

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韩非子·说难》)

2. 文体多样，特擅驳论

韩非之文，多属政论，但体式多样，不一而足。如《五蠹》、《显学》为长篇专论，《三守》、《备内》乃短篇专论；《难一》、《难二》属驳论之体，《难势》、《定法》系辩难之文；以韵文为主者如《主道》、《扬权》，呈骈偶倾向者有《功名》、《大体》；还有纲目式的经说文如《解老》，长编式的专辑体如《说林》及内、外《储说》……。上述种种，尚未包括无遗，但已足见其文体之多样化了。这些文体有的是对前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有的则为韩非所独创。它们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众体之中，韩非特擅驳论之体。这不仅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具体表现，而且也是韩非口不善言，只好寄意于笔端的结果。诸子横议，大多笔、舌并用，而韩非则主要用笔墨辩驳。故其特擅驳论之文，想亦与笔墨实践之多有关。如《难一》、《难二》之驳论，有破有立，有论有据，圆熟老练，犀利明快，极富说服力。比较荀子驳论之作，显然已"更上一层楼"了。

毋弛而弓，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其斗𪗇𪗇。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韩非子·扬权》)

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必载。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朴，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韩非子·大体》)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

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使襄子于晋阳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无国，晋阳无君也，尚谁与守哉？今襄子于晋阳也，知氏灌之，臼灶生龟，而民无反心，是君臣亲也。襄子有君臣亲之泽，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犹有骄侮之臣，是襄子失罚也。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同上)

3. 广譬博喻，寓言大观

先秦是寓言文学繁荣的黄金时代。先秦寓言无论数量之众多，思想之深刻，艺术之高超，均足以雄视百代。然而它们大多是说理的手段或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尚未独立成体。到了韩非手中，

则发生了空前的变化。韩非对散见各书和流传民间的众多寓言故事作了系统的收集整理，再加上自己的创作，而后分门别类加以编排，于是第一次推出了洋洋大观的寓言专辑，载于《韩非子》中的《说林》及内、外《储说》篇中。如果把过去那些散见各处的寓言故事比为散兵游勇，那么，在《韩非子》中，它们已被改造为行伍军阵了。这不能不说是韩非的一大创造和一大功绩。据统计，《韩非子》一书中共有寓言故事300多则，居于先秦各家著作之首。它们成为韩非广譬博喻、用来宣扬其法治思想的锐利武器，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冷峻峭刻、褒贬分明、尖锐遒劲、典雅庄重的特点。其作举不胜举，著名者如《和氏献璧》（《和氏》）、《老马识途》（《说林上》）《远水不救近火》（《说林上》）、《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画鬼魅易画犬马难》（《外储说左上》）、《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自相矛盾》（《难一》）、《守株待兔》（《五蠹》）等等，其中不少已为成语，至今活在人们的口头。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韩非子·说林上》）

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于晋，或宦于荆。犁钼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虽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今晋与荆虽强，而齐近，鲁患其不救乎！"（同上）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韩非著博喻之富。（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二 《吕氏春秋》

（一）作者及成书

《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下食客（智略士）集体撰著而成。吕不韦是名义上的编撰者，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今

之"主编"。不过，此书既以"吕氏"为旗号，又在其主持下撰成，该书的思想与他自然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原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汉书·艺文志》)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旧本题吕不韦撰。实则其宾客所集也。凡十二纪、八览、六论，故《汉志》称二十六篇。实则纪、览、论各分子目，共一百六十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

1. 关于吕不韦

吕不韦其人之生平事迹，具见《史记》本传和《战国策·秦策五》。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他原为阳翟大贾，后转而从事政治投机活动，一举成功，身贵富溢，最终死于非命。历来对其评价，多有微词，但郭沫若独出新见，认为他"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现在看来，吕不韦在战国末年的政治舞台上，确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秦王朝统一天下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不能说没有他的作用。《吕氏春秋》的撰著成功，为秦统一天下作了理论准备；而此书的诞生，是与他的积极倡导与支持分不开的。因此，不如这样说：吕不韦至少是战国末年政坛上一位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

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岁余，……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史记·吕不韦列传》）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秦子异人质于赵，处于聊城，故往说之曰："……今子听吾计事，求归，可以有秦国。吾为子使秦，必来请子。"……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战国策·秦策五》）

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无疑地，吕不韦本人一定是一位民主思想者，至少可以说是一位民主的政治家。（同上）

2. 关于《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一书，不仅自定书名明确，而且成书年代明确。据《序意》篇所记，可知其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前239），下距秦统一六国尚有18年，堪称确实可信的先秦著作。这是很难得的。此书体式新颖而整齐，可谓前所未有。"八览"为八组文章，每"览"下分八篇，共64篇；"六论"为六组文章，每"论"下分六篇，共36篇；"十二纪"则按春、夏、秋、冬四季编排，各含孟、仲、季三纪，每"纪"下分五篇文章，共60篇。全书总为160篇文章。编排严整，自成系统。今本编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序意》列于

十二纪之末。古人著书，序文例在书末。可见原书编次应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一如《史记》之所述。又，《序意》显系残文，其题下另标“一作《廉孝》”，而“有始览”仅有七篇，故疑有脱佚或错简。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吕氏春秋·序意》)

不韦《春秋》，成于始皇八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此其书成之岁月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吕氏春秋附考》引吕祖谦语)

《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八览》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简脱，后人遂强相附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缺。(毕沅新校正《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附考》引卢文弨语)

吕氏辑成这部书的年代，《序意》篇里面表示得很明白，便是“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云云。“维秦八年”自然就是秦始皇八年，先秦列国纪年，在金文中每每有这样的例子。(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八览》每览应该是八篇，但开首《有始览》只有七篇，可知定然脱落了一篇。《序意》篇也系残文，题名下标注“一作《廉孝》”，则《有始览》所夺的一篇或许怕就是《廉孝》。(同上)

(二)《吕氏春秋》的思想特征

1．“杂家”特征

《吕氏春秋》成于众家之手，又是人人颇为自由地著其所闻，如此集而成书，故历来有“杂家”之称。《汉书.艺文志》即将其列入“诸子略”中的“杂家”一类，并谓“兼儒、墨，合名、法”乃“杂家”之特征。其实，善取众家之长，“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兼容并包各家思想，而呈现所谓“杂”的面貌，正是《吕氏春秋》一书的主要思想特征。在此书中，无论儒、道、墨、法，还是阴阳、

纵横、名、农、兵等各家思想都有所反映。如《劝学》、《尊师》、《诬徒》、《大乐》、《适音》、《音初》、《精通》、《务本》、《孝行》等篇集中反映了儒家学说，《本生》、《重己》、《贵生》、《尽数》、《论人》、《先己》、《制乐》、《君守》、《下贤》等篇集中反映了道家思想，反映墨家思想者有《侈乐》、《节丧》、《安死》、《当染》等篇，反映法家思想者有《去私》、《禁塞》、《义赏》、《察今》等篇，反映名家思想者有《诚廉》、《正名》等篇，反映兵家思想者有《荡兵》、《振乱》、《怀宠》、《简选》、《决胜》等篇，《顺说》、《报更》等篇反映纵横家思想，《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反映农家思想，《应同》等篇则反映了阴阳家的思想……。由此可见，确实是各家学说并存，尽管时有矛盾、牴牾之处，亦能包容于一书之中。这样看来，作为主持编撰者的吕不韦，似乎颇有能容纳百川的肚量。这是值得肯定的。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于贤者乎？……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用众》）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

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毕沅新校正《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附考》引高似孙语）

其著一书，专觊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实始于不韦。（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

《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原注：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斯又出于宾客

之所不与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这书（按：指《吕氏春秋》）在《汉书·艺文志》被列于“杂家”，而“杂家”中的各书事实上要以本书为代表作。……这书不仅在思想上兼收并蓄，表现得“杂”，就是在文字结构上也每每饤饾泄沓，表现得“杂”。（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2．主要思想倾向

虽然《吕氏春秋》一书兼容各家之说，呈现“杂”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编撰者只是机械地罗列众说，无所侧重。事实上，既然是杂取众家之长，起码就有个选择的问题；而且，编撰者的思想倾向，也应有其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历来多有论及，但各说不一。有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倾向者；有认为“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者；也有认为“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者。现在看来，硬要认定此书以何家思想为主，也许是勉为其难的。因为此书毕竟以“杂”为基本特征，谓之“兼儒、道，合墨、法”，大体可见其主要思想倾向。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此书的编撰目的，乃在“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总之是为秦王朝统一天下作理论准备的，故书中特别强调所谓“一”，即“统一”的思想。如果要说有一根贯通全书的主线，这就是吧。

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高诱《吕氏春秋序》）

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

它（按：指《吕氏春秋》）并不"杂"，它是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文信侯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吕氏春秋·序意》）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刬，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吕氏春秋·观世》）

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吕氏春秋·不二》）

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吕氏春秋·执一》）

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高诱注：择，弃也；法，用也），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于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吕氏春秋·大乐》）

（三）《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一书，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瑰玮宏博，幽怪奇艳"，在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它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文献和遗闻佚事，无论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音乐学、农学、人才学等等领域，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关于它的文学价值，尚需深入、系统研究，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家有此书(按：指《吕氏春秋》)，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高诱《吕氏春秋序》)

《吕氏春秋》言天地万物之故，其书最为近古。(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十六)

其书(按：指《吕氏春秋》)沈博绝丽，汇儒、墨之恉，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后人所以探索而靡尽与。(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

(《吕氏春秋》)瑰玮宏博，幽怪奇艳，上下钜细事理名物之故，粲然皆具，读之如身入宝藏。……不能不叹羡其备物之富有也。(徐时栋《吕氏春秋杂记序》)

(《吕氏春秋》)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自序》)

(《吕氏春秋》)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也含有极高的文化史上的价值；向来的学者似乎还不曾充分的认识。(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1. 新颖、独创的体式

《吕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撰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大著。其体式新颖，前所未有。它分"览"、"论"、"纪"三大类，各类下分8、6、12组，各组分别包括8、6、5篇文章，体制严整，自成系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先秦散文从语录体——对话体——独立成篇，发展到《吕氏春秋》式的系统化专著，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尽管为了强求整齐，不免有敷衍、割裂、重复之病，因而被郭沫若讥评为"拙劣"；但实际上，这些毛病毕竟只占全书很小比例。而且此书体式新创，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整体看来，它在体式上的独创性、严整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确实是难能可贵而值得赞赏的。这种体式的产生，为后世的一些专著（包括"类书"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吕氏鉴远而体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同上）

《汉书·艺文志》载《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所统子目六十一，览所统子目六十三，论所统子目三十六，实一百六十篇，《汉志》盖举其纲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

吕氏之书，盖司马迁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纪，仿其十二月纪；八书，仿其八览；七十列传，仿其六论，则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时错举，名曰“春秋”，则吕氏犹较虞卿、晏子“春秋”为合度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同上）

（《吕氏春秋》）因为篇数有一定的限制，各篇的长短也约略相等，于是便有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裁，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2. 平实畅达的文风

《吕氏春秋》的文章，不仅现实针对性强，而且放言无惮。这与先秦诸子之文是一致的。此书敢于诋訾时君，指责时政。如其《贵公》、《去私》、《圜道》等篇论尧、舜让贤而“不肯与其子孙”，矛头显然直指欲“传之无穷”的“始皇帝”（亦含为吕氏争权之意）。又如《节丧》篇斥厚葬之风，也是针对秦王之侈靡而发。如此放言无忌，指斥时君世主，乃时代之风气使然，并非“秦法犹宽”之故。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虽然时有尖锐之论，但因意在为统一大造舆论，故其文风不像法家似的锋芒毕露，也不像纵横家似的辩丽横肆，而近似于以荀卿为代表的儒家的平实。也许，所谓“著书布天下”的“荀卿之徒”，便是此书的主要作者。此书文章大都平稳、朴实，侃侃而论，娓娓动人；重在摆事实，讲道理，不作空言，不尚文采。其文因出众手，不尽统一，但显然曾经专人整

理，文风尚能大体保持一致。总的风格是平实畅达，质而不文。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贵公》）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

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远，而所知者之近也。（《吕氏春秋·圜道》）

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吕氏春秋·节丧》）

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同上）

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吕氏春秋·安死》）

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树草木以象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之所甚讳，而秦不

以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毕沅新校正《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附考》引方孝孺语）

3．色彩缤纷的寓言故事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重大价值是保存了丰富多彩的先秦寓言和历史故事。它们无不闪耀着文学的光彩。据统计，此书共辑寓言故事300余则，几乎各篇皆有，其数量之多，可与《韩非子》相颉颃。这些寓言故事亦如其思想，大多"杂取各家"，当然并不排除也有其自己的创作。因此，其中不少寓言和历史故事亦见于先秦其他著作。《吕氏春秋》颇重理性，其文引用寓言故事并非猎奇，而是为了说明事理。其结构形式略似《韩非子》中的《储说》，但构思更为严谨细密。每篇文章引用寓言故事往往非止一则，而数则寓言故事各有作用，合而共同说明一个道理。如著名的《察今》篇，引有《循表夜涉》、《刻舟求剑》、《引婴儿投江》三则寓言故事，分别说明治世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道理。它们各有侧重，但合起来则共同说明"因时变法"的重要性。如此把寓言故事有机地组织于论说之中，分述其事、合明一理的手法，可说是颇费匠心的，足见作者很花了一番搜集、整理、筛选甚至再创作的功夫。此书中的寓言故事，著名者甚多，如《荆人遗弓》(《贵公》篇）、《网开三面》（《异用》篇）、《腹䵍杀子》（《去私》篇）、《掩耳盗钟》(《自知》篇）、《齐宣王好射》（《壅塞》篇）、《幽王击鼓》（《疑似》篇）、《齐人攫金》（《去宥》篇）、《掣肘》（《具备》篇）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因时变法者，贤主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吕氏春秋·察今》)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吕氏春秋·异用》)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吕氏春秋·自知》)

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吕氏春秋·壅塞》)

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吕氏春秋·疑似》)

第六章　楚辞与屈原

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文学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诸子的活跃和散文的崛起。而在南方，则以楚辞的产生和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为标志，揭开了文学史上的新篇章。

第一节　楚文化与楚辞

楚辞是产生于南方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是继《诗经》之后崛起的又一座文学高峰。它的产生，既有历史的、地理的渊源，更有赖于诗人们的天才创造。不妨说，正是神奇绚烂的楚文化的肥土沃壤，滋养并催开了这一震古烁今的诗坛奇葩。

一　楚文化的形成及其特色

（一）楚之兴盛与楚文化的形成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即兴盛于江汉流域。鲁桓公八年（前704），楚君熊通自号武王。其子文王熊赀始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楚日益强大，占地千里，地广兵强，雄踞南方，专力攻伐黄河流域华夏诸侯，不断扩张领地。楚以"蛮夷"自称，中原人亦称之为"南蛮"、"蛮夷"。独放异采的楚文化正是在长期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

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八》）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

戎、狄之人也。(《国语·郑语》)

荆蛮，芈姓之蛮，鬻熊之后。(同上韦昭注)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

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左传·定公四年》)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

(武王)三十七年(前704)，楚熊通……乃自立为武王。……五十一年(前690)，……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过邓。……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同上)

成王恽元年(前671)，……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同上)

"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毛诗序》)

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朱熹《诗集传·周南序》)

(二)楚文化的特色

楚文化虽与华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无论在地理、物产、风俗、民情、服饰、制度、语言、音乐诸方面，都与中原有不同的特色。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以典重质实为基本精神，那么，楚文化则是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征；一质一文，相映生辉。

1. 江汉辽阔，物产丰富

(王孙圉)曰："……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以戒不虞者也。……"(《国语·楚语

下》)

及楚，……(重耳)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

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汉书·地理志》)

2. 民神杂糅，巫风独盛

昭王问于观射父，……(观射父)对曰："……古者民神不杂。……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国语·楚语下》)

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墨子·非乐上》)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氏春秋·侈乐》)

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吕氏春秋·异宝》)

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觋，祀群神，躬执羽帗，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福祐，不敢救。"(桓谭《新论》)

(楚)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

谷永说上曰："……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汉书·郊祀志》)

3. 服饰、官制，别具一格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按：韦昭注："南冠，楚冠也。"）（《国语·周语中》）

陈，我大姬之后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同上）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左传·成公九年》）

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鲍彪注：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说之）。（《战国策·秦策五》）

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蒍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左传·襄公十五年》）

连敖，楚官。《左传》楚有连尹、莫敖，其后合为一官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如淳注）

陈、楚名"司寇"为"司败"。（《左传·文公十年》杜预集解）

令尹，宰也。……楚臣令尹为长，从他国之言，或亦谓之宰。……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为名，皆取其正直也。（《论语·公冶长》刑昺疏）

4. 语言、音乐，异于中原

秋，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柣之门。……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左传·宣公四年》）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

（孟子曰：）"……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

文公上》)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吕氏春秋·音初》)

二 楚辞的产生及其由来

(一) 楚辞概说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产生于战国后期我国南方的一种新诗体。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异常浓厚的地方色彩。故所谓楚辞，其本义即指楚地的歌辞。它的代表作家是伟大诗人屈原及宋玉。

楚辞之称，始见于西汉。成帝时，刘向在前人纂辑的基础上，集录屈、宋诸作及后人模拟之作为一书，统题为《楚辞》，东汉王逸继作《楚辞章句》，于是《楚辞》又作为这一诗歌总集的书名流传于世。在汉代，楚辞常被称之为"赋"。实则二者虽有联系，却并非一类。它们是体制不同的两类文体。

"楚词"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然屈、宋之文，与后世依仿者，通有此目。……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词序》)

盖自屈原赋《离骚》而南国宗之，名章继作，通号"楚辞"，大抵皆祖原意，而《离骚》深远矣。(朱熹《楚辞集注目录序》)

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

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史记·酷吏列传》)

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汉书·朱买臣传》)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汉书·王褒传》)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后汉书·王逸传》)

裒屈、宋诸赋，定名为《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是为总集之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

《楚词章句》十七卷。汉王逸撰。初，刘向辑屈原、宋玉、景差诸赋，附以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诸作，及向自作《九叹》，为“楚词”十六篇。逸又益以自作《九思》，及班固二叙，勒成十七卷，且为作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五)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

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刘熙载《艺概·赋概》)

问“楚辞”、“汉赋”之别，曰：“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同上)

“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然“汉赋”之最上者，机括必从“楚辞”得来。(同上)

(二)楚辞的由来

楚辞这一新的文学样式登上诗坛，开创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新时代。但它并非由天而降，而是渊源有自的。南方楚地的山川、风物、民情、习俗孕育了它，风味独特的楚声、楚歌滋养了

它；同时，它还从光照千秋的《诗经》里吸取了营养，在战国策士的游说风气中受到了熏陶；最后得力于伟大诗人屈原的天才创造，终于成就了这一足与日月争光的战国文学精品。或者说，楚辞是植根于楚文化的肥厚土壤，受溉于中原文化的甘甜雨露，有赖于伟大诗人屈原的辛勤培植，得以萌芽、开花而结出的奇艳而丰美的累累文学硕果。

1． 楚地山川、风物、民情、习俗之孕育

楚地瑰丽奇伟、光怪陆离的山川风物，人神杂糅、巫风盛行的民情风俗，是楚辞产生的客观前提。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朱熹《楚辞集注·九歌序》）

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触撩抑。（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

2． 楚声、楚歌之滋养

风味独特的楚声、楚歌，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不妨说，出自民间的楚声、楚歌正是楚辞的直接源头。

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左传·哀公十三年》）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

足。”(《孟子·离娄上》)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越人歌》，见刘向《说苑·善说》)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一作《阳阿》)些(王逸注：楚人歌曲也)。……宫庭震惊，发《激楚》些(朱熹注：《激楚》，歌舞之名，即汉祖所谓“楚歌”、“楚舞”也)。(《楚辞·招魂》)

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讴和《扬阿》，赵箫倡只。(《楚辞·大招》)

项王军壁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按：《史记正义》引颜师古云：“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史记·项羽本纪》)

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史记·留侯世家》)

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书·礼乐志》)

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嗷咷楚歌。(《汉书·韩延寿传》)

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按指“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隋书·经籍志》)

3. 中原文化的滋润和熏陶

楚辞固然是南方文化的特产，然而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对它的产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北方诗歌代表《诗经》对它有明显的影响，而战国时代的游说之风和纵横之辞也对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故使子孙无忘其章。……”(《左传·宣公十二年》)

左史倚相趋过。(楚灵)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子革)对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昭公十二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按：据班固《离骚序》，此段文字原出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史记·屈原列传》)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文心雕龙·时序》)

或谓楚赋自铸伟辞，其取熔经义，疑不及汉。余谓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实乃较汉尤高。(刘熙载《艺概·赋概》)

《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太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皮锡瑞《经学通论》二《诗经》)

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形式文采之所以异者，由二因缘，曰时与地。……周室既衰，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游说之风寖盛，纵横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同上)

4. 伟大诗人屈原的天才创造

楚辞是与伟大诗人屈原连在一起的。作为一代文学之标志的楚辞，乃是屈原植根于楚文化的沃土，沐浴着中原文化的新风，吸取了楚国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而"自铸伟辞"的天才创造。因此可以说，没有伟大诗人屈原，便没有楚辞。

固知"楚辞"者，……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

伟辞。(《文心雕龙·辨骚》)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同上)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隋书·经籍志》)

第二节　屈原和《离骚》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杰作《离骚》则是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屈原和《离骚》，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巍然耸立的丰碑。

一　伟大诗人屈原

(一)悲剧的一生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其祖先屈瑕，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问题，历来意见分歧，迄今尚无定论。据郭沫若考证，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卒于公元前278年。但因学者们对屈原自叙"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的理解有别，推算方法各异，故结论自亦不同。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其所记，颇为粗略；且有牴牾扞格之处，当系后人窜乱所致。据现有资料所见，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善于应对，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生当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他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显著成就。但后来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之，一度流于汉北。屈原既疏，群小得势，楚国政治日趋腐败。怀王昏庸贪婪，刚愎自用，因受张仪之欺，愤而两次伐秦，均遭惨败，后竟囚秦而死。顷襄王继立，谄谀用事，屈原竟被放逐于江南。这时

侯，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既无良臣，又无守备"，百姓心离，国运危殆。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烧毁楚先王墓，顷襄王逃往陈城。眼见祖国沦亡，人民遭难，屈原万分悲愤，极端绝望，于是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其时传说为旧历五月五日。

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楚国和时代的悲剧。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史记·屈原列传》)

顷襄王二十年(前279)，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徙，东北保于陈城。楚遂削弱，为秦所轻。(《战国策·秦策四》)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

武安君曰："是时楚王(鲍彪注：顷襄)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战国策·中山策》)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他(按指屈原)的诞生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于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寅年便当得是前340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与《离骚》相合。(郭沫若《屈原研究》)

至于他的死年是公元前278年的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死的月日据传说是五月五日。(同上)

生年：有公元前335(林庚《屈原生卒年考》)、339(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340(郭沫若《屈原研究》)、343(游国恩《楚辞概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说法。卒年：有公元前277(游国恩《屈原》)、278(郭沫若《屈原研究》、郑振铎《屈原传》、文怀沙《屈原集前言》)、280(浦江清《屈原》)、290(陆侃如《屈原与宋玉》)、296(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29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说法。(郭在贻《近60年来的楚辞研究》)

公元前353年，即楚宣王十七年。查新城新藏《战国秦汉长历图》，这年正月大，戊辰朔，二十三日庚寅，可以作为屈原生年。屈原如果生于这一年，到楚怀王十年时为35岁，和《史记》、《新序》等书所载屈原经历非常符合。因此屈原生年应当定为公元前353年。(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屈原生

年新考》)

(二)光辉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有作品25篇，然未列篇名。后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颇多歧见。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标明“屈原之所作”者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于25篇之数。这也许本于当初刘向的校定。另有《大招》一篇，王逸既谓“屈原之所作”，又称“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则径断《大招》为景差之作，其所定屈原作品25篇，一如王逸所定。但据学者们考证，《远游》、《卜居》、《渔父》乃后人之作，并非屈原作品。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确系屈原所作，无可怀疑；《九章》中虽有后人拟作之可疑者，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再创作。另有《招魂》一篇，据司马迁之说，亦应认为屈原所作。虽然屈原作品真伪杂糅，一时难以辨清，但经历代学者的研究、考证，大部分还是可以认定的。以《离骚》为代表的光辉作品，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

屈原赋二十五篇(原注：楚怀王大夫，有《列传》)。(《汉书·艺文志》)

屈原的诗歌，根据汉代官家的著录，在当时只留下25篇。很可庆幸的是这25篇一直保留到现在，并没有残缺。那就是《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卜居》、《渔父》各一篇，一共25篇。……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招魂》本身的内证，可以断定《招魂》确实是屈原的作品，而《远游》则很有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在这25篇中，还有一个近于公认的看法是：《卜居》和《渔父》(特别是《渔父》)也不会是屈原所作。(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按《惜往日》说：“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说：“骤谏

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都是别人对屈原自沉的惋惜之语，岂是屈原自己的作品，……至于《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屈原是楚的贵族，少年就已得志，如何能说是“贱贫”？……以上三篇所以绝非屈原的作品，十分明显。《思美人》是模仿《抽思》的，但是通篇逍遥自得多于哀怨，……它又与《悲回风》《惜往日》《惜诵》同为无标题无乱辞的篇章，所以也可以肯定乃是拟作，《九章》中因此只有五篇真正是屈原的作品。（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远游》非屈原所作的主要理由有二：一、《远游》的中心思想是道家方士思想；二、《远游》模仿屈原的《离骚》等作品的地方太明显，光就抄袭的句子粗粗一算，就达23条之多。（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楚辞考证》）

《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主要理由是：一、司马迁将《渔父》全文录入《屈原列传》，没有说明是屈原作品，司马迁是当作屈原行事来叙述的。……二、这两篇作品的文章风格不象屈原。（同上）

《大招》模拟《招魂》，产生必在《招魂》之后，非屈原所作，是无疑的了。（同上）

二　不朽杰作《离骚》

（一）《离骚》题义和写作年代

1. 《离骚》题义

自西汉以来，关于《离骚》题义的解释，颇多异说。司马迁释为“离忧”，班固释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这是较早的也是用训诂方法作出的解释。宋人项安世、王应麟则据《国语·楚语上》韦昭注，认为“离骚”亦如“骚离”，“皆楚言”也。后人对此再加发挥，以为“离骚”即“牢骚”。这是从方言角度作解的。近人游国恩主要从音韵着眼，认为《离骚》与《大招》篇中“楚《劳商》只”之“劳商”为双声字，并以旁纽通转，二者一事而异名；《离骚》亦即《劳商》，为楚古曲之名。此外大同小异的解释还多，但主要说法为上述三种。现在看来，三说似皆言之成理，但以马、班之说最为近古，合乎诗人命题之旨，于训诂有据，且不乏旁证，故较为可

信。又，后人常以《离骚》之名为楚辞之代称，如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将屈原作品均冠以《离骚》之名。梁昭明太子《文选》分《骚》、《赋》为两体，刘勰《文心雕龙》分立《辨骚》、《诠赋》二目，则径以"骚"代称楚辞了。

"离骚"者，犹离忧也（按：史迁之说，本出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史记·屈原列传》）

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班固《离骚赞序》）

离，别也。骚，愁也。（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离骚》）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同上）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同上）

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同上）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屈原《九歌·山鬼》）

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屈原《九章·思美人》）

《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如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

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

"离骚"即伍举所谓"骚离"，扬雄所谓"牢愁"，均即常语所谓"牢骚"耳，二字相接自成一词，无待分训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一《辨骚》注）

"牢愁"古叠韵字，同在"幽"部，韦昭训为"牢骚"。后人常语谓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盖本于此。"牢愁"、"牢骚"与"离骚"古并以双声叠韵通转。（游国恩《楚辞概论》）

第考本书《大招》有云，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者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则《离骚》或亦楚人固有乐曲，如郢中之有《阳阿》《薤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楚之古曲，

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

2. 写作年代

据两汉诸家古说，屈原之作《离骚》，乃在怀王时代遭谗被疏之时，亦即屈原壮年时期。除《史记·屈原列传》外，他如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等，均持此说，本无歧异。但由近古至现代，有学者主要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所谓"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说，以及《屈原列传》中"虽放流，……岂足福哉！"一大段评论文字，认为《离骚》乃作于襄王之世。实则"虽放流"一段文字，乃后人窜入的淮南王刘安《离骚传》语，《史记·屈原列传》原本并不如此。再稽以《离骚》中有关年岁的反复咏叹及诗人对国将倾危的忧患之情，可见《离骚》不作于屈原刚被疏时，而应作于诗人将老未老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这个时期，应即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内。看来，两汉古说是可信的。至于司马迁前后两说之矛盾，确乎存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放逐，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刘向《新序·节士》）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

序》）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同上）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同上）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同上）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同上）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同上）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史记·屈原列传》）

近古以至现代的屈原研究者，始多根据今本《屈原列传》中"顷襄王"以下至"虽放流"一大段评《骚》文字，并佐以其他证据，谓屈原赋《骚》乃在顷襄之世，亦即晚年时期。如王闿运《楚辞释》、游国恩《楚辞概论》、《屈原》、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等，都作如此主张。（郭在贻《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

今本《屈原列传》中被后人窜入的《离骚传》的话，不仅班固所引用的"国风好色而不淫，……争光可也"这一段，而是从"离骚者，犹离忧也"直到"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这是刘安《离骚传》的前半部。其次，……今本《屈原列传》中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一大段，也是后人窜入的《离骚传》语。这是刘安《离骚传》的后半部。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两段合起来，犹可以看到接近完整的《离骚传》的梗概。（汤炳正《屈赋新探·〈屈原列传〉理惑》）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则"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固不能因此而疑史迁游移其词，兼采两说；更不能因此而疑今本《屈原列传》中的矛盾乃原本《史记》所已有。（同上）

至于司马迁的忽说被疏，忽说被放，恐怕是他对于屈原在怀王朝到底是只见疏远还是曾被放逐不很了然，所以说得前后歧异。（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楚辞考证》）

(二)《离骚》的思想特色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诗人饱含血泪倾诉了自己的理想、情操，展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思想的灿烂光芒闪耀在全诗的字里行间。

1. “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战国七雄争霸，秦、楚一度势均力敌，时有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之说。然而屈原生当怀王之世，其时楚国已是内忧外困，日趋衰落。“明于治乱”的屈原，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虽然遭谗被疏，但仍系心怀王，念念不忘振兴楚国。然而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使他壮志难酬，他只得把自己未能实现的“美政”理想寄咏于诗。其具体内容主要是：向往一统天下，关心同情人民，渴求举贤授能，冀望修明法度。

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战国策·秦策四》)

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刘向《战国策书录》)

(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二十八年(前301)，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史记·楚世家》)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

(1)向往一统天下

战国时期，天下已呈现出大一统的必然趋势。屈原与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一样，认清了社会由分裂而趋向统一的发

展规律，表现出对“大一统”的憧憬与追求。他在《离骚》中称道“前王”、“前圣”、“前修”，并不囿于楚国的历史传统，其所奉典范，都是属于华夏诸国所公认的楷模；而其所举破国亡身的历史人物，也都是天下所公认的昏君奸臣。此外，诗人所描叙的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所在，也突破了狭隘的楚国境域，几乎包括神话传说中整个中国的辽阔疆土和广大空间。这一切，正是诗人热切向往一统天下的形象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实现“大一统”，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

孟子见梁惠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楚人有黄歇者，游学博闻，襄王以为辩，故使于秦，说昭王曰：“天下莫强于秦、楚，……今大国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战国策·秦策四》)

马服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三》)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吕氏春秋·用民》)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同上)

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同上)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同上)

汤、禹俨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同上)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同上)

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同上)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同上)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同上)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同上）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同上）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同上）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同上）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同上）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同上）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同上）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同上）

为统一全中国起见，极力主张消弭各个氏族集团的个别的传统，特别是个别的氏族传统，而倡导出整个中国民族的大公祖以为统一的基点。道家捧出黄帝，儒家捧出尧、舜，墨家捧出夏禹，都是这个用意。……故黄帝、尧、舜的出现在当时也实在是革命的出现，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企图泯却各族的差别观，而在政治上求得中国的大一统。（郭沫若《屈原研究》）

（2）关心同情人民

从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之说，到孟子“保民而王”、“民贵君轻”之论，形成了儒家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的思想传统。《离骚》表现了诗人关心民生、重视民心的思想和“有德在位”的主张，可见与儒家的思想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关心同情人民是屈原“美政“理想的根基。屈原身后之所以受到后世人民的纪念和崇敬，是和他与人民气息相通分不开的。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同上）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续齐谐记》）

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隋书·地理志》）

（3）渴求举贤授能

自春秋以来产生的"尚贤"思想，到了战国时期已几乎成为进步思想家们的共识。身为楚国宗臣的屈原，眼见祖国政治溷浊，谗佞当道，自已忠心耿耿，却反遭斥疏，于是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唯贤是举的重要性，因而在《离骚》中明确地提出了"举贤授能"的主张。显然，在屈原看来，能否真正做到"举贤授能"，乃是其"美政"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同上）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同上）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同上）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同上）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同上）

（4）冀望修明法度

屈原具有法治观念，并在其从政实践中有所作为。他在未被斥疏之前，曾有"造为宪令"之举。在他看来，修明法度乃是实现其"美政"理想的必由途径。这在《离骚》中也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离骚》）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同上）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九章·惜往日》）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汜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同上）

2. 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

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自己的祖国。在朝之时，他竭忠尽智，辅佐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他仍系心君国，不弃"存君兴国"之志。诗人把个人的进退、生死置之度外，而把君国的命运、前途系于心中。楚国容不下他，他却离不开楚国。那时候，七国并争，诸侯割据，人才尽可自由流动。贤能之士，不愁没有用武之地。所谓"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亦不乏其人。以屈原之才干，不难另谋出路；他也确实考虑过"远逝以自疏"。然而当他托言"上下求索"、四方神游之时，"忽临睨夫旧乡"，那积淀于胸中的爱国情愫千丝万缕缚住了他，使之"蜷局顾而不行"。他宁肯以身殉国，也不愿离开父母之邦。如此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纯洁！然而应该指出，屈原的爱国是与忠君连在一起的。在诗人心目中，君国一体，密不可分，忠君与爱国是二而一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但屈原的爱国思想与狭隘的忠君意识杂糅互混，他把实现"美政"的理想寄托于楚王一人，显然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至于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政权的需要，对此特加利用，刻意渲染，大肆颂扬屈原式的"愚忠"精神，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影响之深远，也是不容忽视的。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同上）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同上）

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同上）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同上）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同上）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

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王逸《楚辞章句序》）

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序论》）

3. 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战国时期，思想解放，百家争鸣。诸子放言横议，无所顾忌。这一时代精神，在屈原《离骚》中也有所体现。诗人满怀悲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谗邪，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正是这一点，为后世维护皇权、囿于儒家"诗教"传统的班固之流所不容，乃有所谓"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不过，这倒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批判精神之可贵。但也应该看到，屈原在忠君前提下对楚王的批判，毕竟多哀怨凄恻之音，而少反抗挑战之意，故其"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离骚》)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同上)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同上)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同上)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同上)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同上)

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同上)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

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

屈原之辞，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王逸《楚辞章句序》)

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刘知几《史通·载文》)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

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摩罗诗力说》）

4. 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屈原志洁行廉，既怀内美，又重修能。他在长期的参政实践中，正道直行，屡经风波，养成了忠于理想、坚贞不屈、特立独行、洁身自好的品格情操。诗人在《离骚》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奸佞谗邪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其峻洁人格，足与日月争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离骚》中表现了一种颇强的超群意识。应该说，在当时的楚国，才识卓异的屈原站在历史的高度，确有超出众人之处。但他心系楚王，惟独寄望于楚王，因而一当希望破灭，便觉无所适从，这就难免要产生"国无人莫我知兮"的孤独感、绝望感，终于只有忿恚自沉，"伏清白以死直"了。这样看来，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来，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同上）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同上）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同上）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同上）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同

上）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同上）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同上）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同上）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楚辞·渔父》）

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按：据班固《离骚序》，此段文字原出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史记·屈原列传》）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楚辞章句序》）

（三）《离骚》的艺术成就

《离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力完成的长篇抒情诗。诗人屈原的出现和《离骚》的产生，无疑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铺平了道路。《离骚》在艺术上有极高的造诣，无论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语言诸方面，都有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离骚》）首尾二千四百九十言。（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一）

（《离骚》）全篇三百七十三句（原注：黄昏二句衍文不计），凡二千四百九十字。（《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

1. "灵均"形象的塑造

在屈原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

品可知作者，如家父、寺人孟子、吉甫、奚斯、许穆夫人等，但他们只是因时感事偶一为之，并非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散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都非出个人之手，亦非专事"翰藻"之作。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在我国文坛上产生了第一个自觉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自叙性抒情长诗《离骚》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以自身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光采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抒写了"灵均"的世系、出身、品质、抱负，描叙了他的志趣、爱好、服饰、言行和境遇，展现了他的心灵世界。在"灵均"的身上，诗人熔铸了自己的意识、情感、理想和人格。诗人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景仰、敬慕的崇高典型。同时，《离骚》一诗也为长篇抒情诗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同上)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同上)

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同上)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同上)

2. 创作方法的突破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奠定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

优良传统。他的光辉诗篇《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这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诗人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体现为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真率地抒发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感情。《离骚》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具体表现为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艳丽的文采。《离骚》是一曲哀壮而激越的悲歌。它颂扬了崇高的理想、峻伟的人格，歌赞了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令人激昂、振奋，给人以鼓舞和信心。这种富于进取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把人引向虚无和幻灭的《庄子》之文的消极浪漫主义。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离骚》)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

以邈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同上）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同上）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同上）

《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

3. 赋、比、兴的开拓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诗经》的伟大艺术创造。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成果，在《离骚》的创作实践中，特别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的开拓，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采。《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主要是以彼喻此、借彼咏此，且多为诗中片断，大都比较单纯。而《离骚》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则有了较大的变化、发展，不仅用得更加广泛，富于变化，而且寄情于物，融情于景，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如诗人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等等，都莫不如此。《离骚》在表现手法上的开拓创新，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按：据班固《离骚序》，此段文字原出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

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

虬龙以谕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辨骚》）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

屈子之赋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质，旁通之妙用也。（刘熙载《艺概·赋概》）

《离骚》不必学《三百篇》，《归去来辞》不必学《骚》，而皆有其独至处，固知真古自与摹古异也。（同上）

4. 形式、语言的革新

《离骚》的卓越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对诗歌形式和语言的革新上。

（1）“骚体”的新创

《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和先秦散文的语言表现功能，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后人称之为“骚体”。屈原开创的这一新诗体，较之《诗经》，“其言甚长”，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助于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骚体”的新创，无疑是屈原对诗歌发展的一大贡献。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文心雕龙·辨骚》）

朱（按：即朱买臣）、马（按：即司马相如）以“骚体”制歌。（《文心雕龙·乐府》）

我们向来认定屈原有特创性。自从屈原把《离骚》做出了以后，中国文学便创出一个特殊的体裁，所谓“骚体”。……《离骚》与《雅》《颂》的体裁，的确各不相同。从形式上说，大家都知道《诗经》是四个字一句，而《楚辞》有六字一句的，也有四字、五字、七字一句的，不等。（郭沫若《屈原的艺

术与思想》）

（2）语言的革新

《离骚》在语言艺术上也有不少新的开拓。如双声、叠韵、重言的运用，较之《诗经》，有了新的发展。双声，叠韵如：正则、灵均、驰骋、纯粹、顑颔、贪婪、追逐、靰羁、郁邑、陆离、婵媛、歔欷、逍遥、相羊、纬繣、骄傲、偃蹇、佻巧、犹豫、狐疑、缤纷、晻蔼、翱翔、委蛇、赫戏、蜷局，等等；重言如：謇謇、冉冉、缅缅、岌岌、菲菲、申申、浪浪、忽忽、曼曼、总总、暧暧、刻刻、啾啾、翼翼、婉婉、邈邈，等等。它们的广泛运用，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文心雕龙·诠赋》）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文心雕龙·物色》）

此外，诗人还熟练地运用对偶工巧的句法，包括所谓"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和"当句对"等多种形式，增强诗歌的文采和艺术表现力。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粻。（《离骚》）

"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文心雕龙·丽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吸收大量极富地方特色的楚地方言口语入诗，显示了新的风采。宋人黄伯思早已指出："若些、只、羌、谇、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词序》)此外还有扈、汩、搴、莽、诼、凭、婞、邅、轪等等，也都是楚地方言口语。至若"兮"字的运用，则更为引人注目。它们大多置于句尾，并且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愤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总之，《离骚》在语言艺术方面的开拓革新，充分显示了诗人屈原伟大的创造精神。

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覆致意"者。(刘熙载《艺概·赋概》)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这些字眼是举不胜举的。一个反复使用的"兮"字便是最好的一把钥匙。"兮"字是古代民歌里所常见的字，采自民间的《国风》也常见使用。这个字，今音虽读如牺，古音却读如呵，懂得这个音窍去读屈原作品，民歌品质的真相便完全表露出来了。(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第三节　屈原的其他作品

一　《九　歌》

(一)《九歌》概说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经屈原再创作而成的《九歌》，仍然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结合的特点。

1. 《九歌》之名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在神话传说中，它是由夏后启从天上偷来人间的。由此可见，《九歌》之名来源甚古。屈原《九歌》之题乃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所谓《九歌》即指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故屈原《九歌》并非9篇，而是11篇。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离骚》)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同上)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天问》)

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山海经·大荒西经》)

王逸注《九辩》云：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五臣云：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按：《九歌》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为名者，取箫韶九成、启《九辩》《九歌》之义。(洪兴祖《楚辞补注·九歌序注》)

2. 写作年代

关于屈原《九歌》的写作年代，大体上有作于早期和作于晚年两种说法。从《九歌》的内容看来，它的写作有一个搜集、整理的较长过程，不可能作于一时一地，但最后写定应在屈原晚年放逐江南流浪沅、湘之时，故作于晚年之说是较为可信的。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

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是以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朱熹《楚辞集注·九歌序》)

《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遭洞庭之句。逮后顷襄信谗，徙原于沅、湘，则原忧益迫，且将自沉，亦无闲心及此矣。(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

《九歌》不知作于何时，其为数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时所作也。……然《大司命》曰"老冉冉兮既极"，《山鬼》曰"岁既晏兮孰华予"，其亦暮年所为欤?(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上》)

《九歌》应该还是屈原的作品，当作于他早年得志的时分，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后。(郭沫若《屈原研究》)

3. 所祀诸神

《九歌》的写作与楚国巫风之盛行密切相关，它是楚国沅、湘之间原始宗教迷信的产物。《九歌》所祀诸神分别是：天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河神(《河伯》)、山神(《山鬼》)、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则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之曲。看来自成体系，大体上再现了楚国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按：指《礼魂》)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旧说谓以礼善终者，非是。(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

此(按：指《礼魂》)祠祀将毕而歌以送神之词。乐之卒章，犹曲之尾声也。旧解谓以祭善终者，非。(王邦采《屈子杂文笺略》)

(二)《九歌》的艺术特色

《九歌》是一组题材特殊、风格独异的美妙奇崛的抒情诗。它在精神实质上与《离骚》一脉相承，而在艺术上却又独具特色。

1. 神奇而亲切的形象

《九歌》不同于《离骚》之直抒胸臆。诗人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主要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借其口而抒情。《九歌》中所塑造的神灵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征，神奇而亲切。经过诗人的艺术创造，神灵被人格化了。他们的华美雅洁的容饰，馨香远播的居室，超尘脱俗的器物，飘渺绰约的风姿，固然弥漫着神秘灵异的气息；而他们的纯洁美丽的心灵，忠贞不渝的品格，缠绵悱恻的情思，以及对理想的百折不挠的追求，却又无一不是人格特征的显现。《九歌》所塑造的众神灵的艺术形象，体现了诗人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

（1）神灵气息的弥漫

诗人在《九歌》中的描写，弥漫着奇异而浓烈的神灵气息。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东皇太一》）

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东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云中君》）

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湘君》）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湘夫人》）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涑雨兮洒尘。（《大司命》）

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少司命》）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山鬼》)

(2)人格特征的显现

《九歌》中所描写的神灵，具有人的情感，显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东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湘君》)

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湘夫人》)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少司命》)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河伯》)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

2. 优美或壮美的意境

《九歌》的基调是礼赞神明，但其内容颇多恋情的描写。无论是神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恋爱，在诗人笔下，都充满了人世间的生活气息，呈现出神话传说与民间恋歌交织为一的特征。诗人的艺术之笔善于把景物的描绘、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有机地融合起来，使客观事物的描写与主观情感的抒发密合无间，从而创造出情景交融的美的意境，产生感人的

艺术魅力。如《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篇，实为缠绵凄婉的恋歌。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孤寂冷落的哀怨之情和凄迷苍茫的悲凉之景，互相融合，格调清丽，形成了优美的意境。较为特殊者是《国殇》一篇。此篇礼赞为国阵亡者之神，描写了悲壮激烈的战斗场面，歌颂了楚国卫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它刚健雄浑，深沉质朴，激昂扬厉，悲歌慷慨，洋溢着爱国激情和英雄精神，笼罩着浓郁的悲壮气氛，形成了壮美的意境。

桂櫂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国殇》)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正是写出"目眇眇兮愁予"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正是写出"思公子兮未敢言"来，俱有"目击道存，不可容声"之意。(刘熙载《艺概·赋概》)

《九歌》纯是性灵语。(同上)

3. 委婉而含蓄的抒情

《九歌》采用楚国民间祭歌的形式，内容杂糅神话传说与民间情歌，其风格和情调与《离骚》迥然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九歌》与《离骚》实有相通之处。《九歌》中"婉娩缠绵"的字里行间，渗透了诗人深沉含蓄的情思。既有"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亦多时不我待、壮志难酬的忧伤。至于倾注了诗人满腔爱国之情的《国殇》，更是感人至深的抒情佳作。不难看出，诗人的理想和愿望，痛苦与追求，深寓《九歌》之中；诗人在《九歌》中所抒发的忧世伤时之情，与《离骚》实无二致。只不过《离骚》是直接抒情，《九歌》是间接抒情；《离骚》是畅抒胸臆，而《九歌》则显得委婉含蓄罢了。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君》)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湘夫人》)

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大司命》)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君思我兮然疑作。……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

《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文心雕龙·辨骚》)

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故为就文即事，顺理诠定，不取形似舛盩之说，亦令读者泳泆以遇于意言之表，得其低回沉郁之心焉。(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

4. 华丽且铿锵的语言

《九歌》的语言不仅华美雅丽，令人赏心悦目；而且音调铿

锵，韵味悠长，勾人无限情思。《九歌》的诗句虽以六言为主，但也多有五言、七言之句，长短适意，宛转动听。其押韵亦颇灵活，韵脚变化频繁，或四句一转韵，或六句、八句一转韵，节奏鲜明，音韵和谐，读来如聆金玉之声。特别是"兮"字用于句中，几乎代替了所有虚字的功能，不同于《离骚》之用于句末而专为语助。这就扩大了它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炼句技巧的进步。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緪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鸣鷈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东君》）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礼魂》)

诗从"三百篇"、"楚辞"进展到建安（原注："十九首"包括在内），五言句法之完成，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而句中虚字数量的减少，或完全退出，才是意义重大。……"九歌"以一浑然的"兮"字，代替了许多职责分明的虚字，似在省去与未省去之间，正是炼句技巧在迈进中的一种姿态。（闻一多《怎样读〈九歌〉》）

二 《九 章》

(一)《九章》之名及写作年代

1. 《九章》之名

《九章》包括九篇作品，按王逸《楚辞章句》的编排，依次为：《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或许即为刘向最初编辑《楚辞》时的顺序。但《九章》之名并非本来就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全录《怀沙》之文，径称"《怀沙》之赋"；并在"太史公曰"中，以《怀沙》与《哀郢》诸篇并列，单举篇名，不称《九章》。《汉书·扬雄

传》载扬雄往往摭屈文而反之，亦仅举《惜诵》、《怀沙》之篇名，而未称《九章》。可见当初并无《九章》之名。《九章》名称始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作《九叹·忧苦》，而刘向又是《楚辞》最初的编辑者，故一般认为，《九章》之名应即刘向所加。及至东汉之时，王逸作《楚辞章句》，沿用刘向旧题，于是《九章》之名始得流传。

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刘向《九叹·忧苦》）

（扬雄）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汉书·扬雄传》）

2. 写作年代

关于《九章》的写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九章》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橘颂》的写作年代最早，可能作于屈原被疏之前。《惜诵》、《抽思》、《思美人》则可能作于被疏之后。《哀郢》、《涉江》、《悲回风》、《惜往日》、《怀沙》等篇，则应作于屈原既放江南之后。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念君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

原既得罪，触事成吟，后人辑之，共得九章，合为一卷，非必一时一地之言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这（按指《橘颂》）是他的早年作品，除后章的“嗟尔幼志”和《乱辞》的“年岁虽少”两句已明白表示外，再就思想内容看，全篇没有露出一点忧伤愤懑的情绪，必是早作无疑。（谭介甫《屈赋新编》）

据我看来，《橘颂》作得最早，本是一种比兴体，前半颂橘，后半颂人，所颂者不知究系何人。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而大体上是遵守着四

字句的古调。（郭沫若《屈原研究》）

《惜诵》乃怀王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所作，然亦未放。……大约先被谗止是疏，本传所谓"不复在位"，以其不复在左徒之位，未尝不在朝也，故有使于齐及谏张仪二事。（林云铭《楚辞灯》）

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按指《惜诵》）以白其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倡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

此篇（按：指《抽思》）盖原怀王时斥居汉北所作也。……原于怀王，受知有素，其来汉北，或亦谪宦于斯，非顷襄弃逐江南比。（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九章·思美人》）

上云"观南人之变态"，此云"茕茕而南行"，宜为在汉北所言。（戴震《屈原赋注》引方晞原语）

此篇（按：指《思美人》）大旨承《抽思》立说。……两篇旨作于怀王时。（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顷襄迁原于江南，其迁都于陈，原不与同迁。寻绎此篇（按：指《哀郢》）前后之旨，盖原虽不用，然犹可与闻国政。东迁之役，原所不欲，谗人必以沮国大计为原罪而谮之，故重见窜逐，其伤心悲叹者，于此为切。（王夫之《楚辞通释》）

《涉江》、《哀郢》，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3. 绝笔之作

至于诗人的绝笔之作，迄今尚难确定。历代学者对此亦多歧见。但据司马迁等汉人的记载，《怀沙》为屈原的绝命词，应是较为可信的。

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

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

(《悲回风》)盖原自沉时永诀之辞也。(王夫之《楚辞通释》)

此篇(按指《悲回风》)继《怀沙》而作，于为彭咸之志，反覆著明，几已死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惜往日》，其灵均绝笔欤！……《九章》惟此篇词最浅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饰，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晓也。(同上)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九章·怀沙》)

(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史记·屈原列传》)

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东方朔《七谏·沉江》)

言己所以怀沙负石，甘乐死亡，自沉于水者。(同上王逸注)

《怀沙》，言怀抱沙石，以自沉也。(朱熹《楚辞集注》)

《怀沙》者，自述其沉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所谓不畏死而勿让也。原不忍与世同汙而立视宗国之亡，决意于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盖绝命永诀之言也。故其词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繁音促节，特异于他篇云。(王夫之《楚辞通辞》)

《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若以"怀沙"为怀石，失其旨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怀沙》是屈原的最后一篇作品。……通篇都自述生平怀抱，一种向世间告别语气，可证明司马迁所说正确。(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楚辞考证》)

"怀"，当释作"归"、"依"。《广雅·释诂二》："怀，归也。"《后汉书·吴汉传》注："怀，依也。""沙"，指水中。《易·需卦》："需于沙"，虞注："水中之阳称沙也。""怀沙"，意即沉江。(同上)

（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1. 思想内容

《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大体相似，除《橘颂》外，各篇均为屈原某一生活片断的反映，表现了诗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感受。可以说，《离骚》是对屈原生平和心路历程的完整反映，《九章》则是对某一方面的片断抒写。诗人的“美政”理想、爱国感情、批判精神和峻洁人格，在《九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此外，我们在《九章》中还不难发现与《离骚》形神毕肖的众多诗句。这都说明，在精神实质上，《九章》与《离骚》是基本一致的。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抽思》）

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

岁曶曶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薠蘅槁而节离兮，芳以歇而不比。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可聊。宁逝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悲

回风》）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惜往日》）

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乱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

2. 艺术特点

《九章》的艺术风貌也与《离骚》大体相似。不过，《离骚》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九章》虽也不乏浪漫主义的笔触，却主要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九章》各篇不以飞腾的想象和奇幻的意境取胜，而以具体的写实和直接的抒情见长。同时，在写景寄情方面，《九章》也颇有独到之处。尤为特出者，是《橘颂》一篇。此篇移情于物，借颂橘而自颂，实开后世咏物诗之先河，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1）具体写实和直接抒情

《九章》多具体写实之辞，有似"实录"；同时，诗人以直接抒情的方式，坦陈内心的情怀，具有"朗丽以哀志"的特点。这些都体现了它的现实主义特征。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朝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

翱翔之焉薄？心绖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哀郢》)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而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惜往日》)

《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文心雕龙·辨骚》)

(2)浪漫主义的笔触

《九章》虽以现实主义特色为主调，但也不乏浪漫主义的笔触。和《离骚》一样，这二者也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惜诵》)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思美人》)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冯昆仑以瞰雾兮，隐𡵚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悲回风》)

（3）写景寄情的手法

《九章》往往情寓于景，景以寄情，无论写山水，言节候，都能做到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抽思》）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思美人》）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

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登石峦以远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响之无应兮，闻省想而不可得。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羁而不形兮，气缭转而自缔。（《悲回风》）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怀沙》）

故其（按指屈原诸作）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文心雕龙·辨骚》）

屈子之辞，沉痛常在转处。"气缭转而自缔"，《悲回风》篇语可以借评。（刘熙载《艺概·赋概》）

（4）咏物诗的开拓

《九章》中《橘颂》一篇独具一格。此篇以橘自喻，借颂橘而言志，抒发了美好的理想，歌颂了高尚的情操。名为《橘颂》，实为诗人峻洁人格的自我写照。这不仅是对比兴手法的扩大和突破，而且开拓了后世咏物诗发展的道路。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橘颂》)

(《橘颂》)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王逸《楚辞章句·橘颂序》)

旧说："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内意皆放此。(朱熹《楚辞集注》)

橘者，南方之嘉木也。古产于楚湘，今盛于闽粤。按李衡言，江陵有千头木奴，则楚之宜橘旧矣。原偶植之，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王夫之《楚辞通释》)

《橘颂》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纯乎赋体。(刘熙载《艺概·赋概》)

屈子《橘颂》云："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同上)

三　《天问》、《招魂》

(一)《天　问》

1. 《天问》题义和写作年代

(1)《天问》题义

关于《天问》题义，向有不同解释。其实，"天问"就是"问天"，亦即对天问难。"天"是屈原设疑问难的对象。从《离骚》中"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以及《哀郢》中"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等句看来，在屈原心目中，并不完全否认有意志有人格的"天"的存在，但他同时对"天"又有所怀疑。这显然是屈原思想的矛盾的反映。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

逸（按：指王逸）又云：不言"问天"，而言"天问"，天高不可问，说亦未是。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王夫之《楚辞通释》）

事有人莫能解，故于天是问，盖聊以寄其感慨。虽明知其事之荒唐，亦问。（徐焕龙《屈辞洗髓》）

《天问》者，仰天而问也。（屈复《楚辞新注》）

天即理也。理有可信，亦有可疑。理可疑，故有问。疑而问，即以问而使人悟，故举曰"天问"也。又天，君也，问之冀其一悟也。（陈远新《屈子说志》）

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戴震《屈原赋注》）

此篇（按：指《天问》）皆郁极无聊，搔首问天之语。王逸谓天尊不可问，非也。（胡文英《屈骚指掌》）

王逸以《天问》为问天，其说非也。……屈子以《天问》题篇，意若曰，宇宙间一切事物之繁之不可推者，欲从而究其理耳。（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

（2）写作年代

《天问》的写作年代无从确考，一般认为作于屈原被放逐之时。从篇中不无愤懑忧思之情以及篇末"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等句看来，此篇大约作于怀王末年，屈原遭谗被疏流于汉北之时。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

旧序云：原放逐山泽，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神灵，古圣

贤怪物行事，呵而问之，以渫愤懑，其言是矣。又云：原辞止书于壁，而楚人论述成篇，则未必然。（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天问》）

爰，于也。吾将退于江滨，伏匿穴处耳，当复何言乎？（王逸《楚辞章句》）

爰，于也。"伏匿穴处"，即游于江潭也，将于何告乎？楚方以兴师为功，夫何能久长乎？言享国日蹙也。穴处，岩穴是处，隐者通语也。"作师"犹"兴师"，即《史记》"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怀王复悉发国中兵，深入击秦，战于蓝田"是也。（毛奇龄《天问补注》）

今我未得归，而伏处于岩穴，固何足云？乃怀王十七年，秦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二十八年，秦、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二十九年，秦复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襄王元年，秦发兵攻楚，斩首五万，取淅十五城而去。荆楚之有勋旧者，类皆以身殉师矣。所余者，特持禄养交之臣耳。楚地日削，势日微，其又何以久长乎？（徐文靖《管城硕记》）

"伏匿穴处，爰何云"者，谓己为窜谪之臣，唯当伏匿而处于岩穴耳，奈复有所云乎？其有所云者，爱君忧国之心不能自已也。（曹耀湘《读骚论世》）

吾告堵敖，以不长。（《天问》）

楚人谓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哀怀王将如堵敖不长而死，以此告之。（柳宗元《柳河东集·天对》注）

吾告堵敖以立国之不长也。堵敖即熊囏，楚文王子。……楚人以不成君与无谥号者皆谓之敖。……上言"夫何长"，恐楚国之入于秦。此言"不长"，则恐怀王之死于秦也。（毛奇龄《天问补注》）

"告堵敖以不长"者，此追闻怀王有入武关之信，深恚其死于秦而不得谥。不长，不久也。言眼见即有堵敖之称焉，是以极欲告之，俾其毋往也。不意不听其言，卒如所料。（陈本礼《屈辞精义》）

2. 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

（1）大胆怀疑、探求真理的对天问难

《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奇文。全文包括370多

句，1500余言。作者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举凡天地山川、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天命人事、现实生活等等方面，均所涉及。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屈原确实是“博闻强志，明于治乱”，而且充分体现了他大胆怀疑，敢于向传统思想挑战，勇于探求真理的进取精神。应该说，这种精神乃是不朽的屈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列传》)

《天问》当分作三大段，自“曰遂古之初”起，至“曜灵安臧”止为上段，共44句，是问天上事许多不可解处。自“不任汩鸿”至“乌焉解羽”止，共68句为中一段，是问地上事许多不可解处。自“禹之力献功”起，至末“忠名弥彰”止，共261句为后一段，是问人间事许多不可解处。(李陈玉《楚辞笺注》)

按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之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王夫之《楚辞通释》)

(屈原)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

(《天问》)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而那所提出的问题，从天地开辟以来一直问到他自己，把他对于宗教信仰上的、神话传说上的、历史记载上的、人生道德上的各种各样的怀疑，都痛痛快快地表示了一个淋漓尽致。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郭沫若《屈原研究》)

① 天地山川之问

《天问》开篇即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接着对天地开辟、宇宙生成、山川地理、日月星辰等一系列未知的自然现象设疑问难，表现出大胆怀疑，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

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天问》）

② 神话传说之问

《天问》中还问及不少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屈原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画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天问》）

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同上）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同上）

妖夫曳衒，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同上）

③ 天命人事之问

《天问》中关于天命人事的问难，实际上反映了屈原对所谓“天命”的怀疑和批判。

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天问》）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同上）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合，卒然身杀？（同上）

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同上）

④ 现实生活之问

《天问》最后涉及现实生活和诗人自身，表现出屈原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他深怀忧患的愤懑。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天问》）

（2）新颖独特、气势磅礴的千古奇文

《天问》不仅在哲学、史学、神话学、民俗学上有特殊的贡献，而且在文学上也有不容否认的价值。它构思新颖，形式独特，节奏铿锵，气势磅礴，感情激越，格调高古，是一篇古今独步的奇文。应该指出，《天问》乃近文之赋。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具有所谓"赋家之心"；而且主要以四言为句，四句为节，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它的产生，无疑对赋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屈原赋固然以写怀言情为主，而《天问》却已明显有论事说理的倾向。汉初贾谊赋将言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正是对这一特点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见，所谓《天问》"全无文学价值"之论，实在是无稽之谈。

《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文心雕龙·辨骚》）

（《天问》）特创为百余问，皆容成、葛天之语，入神出天，此为开物之圣，后有作者，皆臣妾也。（陈深批点《楚辞》）

《天问》一篇，灵均碎金也。……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然自是宇宙间一种奇文。（贺贻孙《骚筏》）

其友人盛览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

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文心雕龙·诠赋》）

贾谊《惜誓》、《吊屈原》、《鹏赋》,俱有凿空乱道意。骚人情境,于斯犹见。(刘熙载《艺概·赋概》)

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刘师培《论文杂记》)

至近人的胡适更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以断定为后人杂凑起来的"(《读楚辞》)。这些却真真是活天冤枉!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全篇以一"曰"字领头,通体用问语,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以那种主于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板滞的格调,而问得参差历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郭沫若《屈原研究》)

(二)《招 魂》

1. 《招魂》的作者、主旨和写作年代

(1)作者

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则认为是宋玉所作(或本刘向旧说)。其后学者们或主屈作,或主宋作,各说不一。现在看来,司马迁之说较为近古,其说必有所据,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其误,故不宜轻易否定。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列传》)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

自王叔师以《招魂》为宋玉所作,千余年来,未有易者。……至明黄维章始以为非,而取二招归之于原,然言多迂滞,未足以发其义。林西仲本黄氏之说,又从而条列之,而后二招之属于原,殆有确乎不易者。……王逸乃以《招魂》为宋玉所作,试问太史公读而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且果系玉作,无论首尾解说难通,即篇中亦应仿古礼以自致其招,何乃托之巫阳,涉于戏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

下》）

（司马迁之说）《天问》、《招魂》夹在《离骚》与《哀郢》之间，《离骚》与《哀郢》既为屈作，则《天问》、《招魂》自以认为屈作为宜。古人谓"诗言志"，悲其志即系断定为其心声，不然则悲其遇而已足。（郭沫若《屈原·招魂·天问·九歌》）

（2）主旨

《招魂》既为屈原所作，所谓宋玉招屈原魂之说不能成立，那么，其所招究竟为谁呢？比较通行的说法主要有屈原自招其魂和屈原招怀王魂两说。从《招魂》所叙宫室之美、服食之奢、娱乐之盛、士女之乱看来，其所招之人非君主莫属。因此，屈原作《招魂》以招怀王魂之说是比较可信的。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文心雕龙·辨骚》）

是篇（按：指《招魂》）千数百年来皆以为宋玉所作。王逸茫无考据，遂序于其端。……后世相沿不改，无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兴，亦不嫌其为自招也。（林云铭《楚辞灯》）

或谓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且有生而自祭者，又何嫌于自招？杜子美《彭衙行》："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固亦自招之明验也。玩篇首自序，及篇末乱词，皆不言"君"而曰"朕"曰"吾"，断非出于他人之语。（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下》）

这篇文章（按：指《招魂》）《史记》明说是屈原的作品，据我看来也明白地是为追悼楚怀王而作。文辞中所叙的宫庭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能够相称的。王逸认为宋玉做来招屈原，林云铭辈又认为屈原自招（《楚辞灯》），都是不正确的。（郭沫若《屈原研究》）

《招魂》的"辞曰"里面明明说"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接着又说："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魂兮归来哀江南"，可见被招的是"王"而与招者的"吾"是完全两个人。这决不会是宋玉招屈原之魂，也不会

是如一部分人所说是屈原做来招自己之魂的。（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

（3）写作年代

《招魂》作于何时?限于资料，尚难确考。有学者据《招魂》中有人在下”、“魂魄离散”之句，谓其作于怀王生前身为秦虏之时。但据《招魂》中有关丧礼“皋复”的描写和“像设君室，静闲安些”等句看来，所招者必为已死之楚王。史载楚怀王三十年（前299），怀王入秦被拘；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招魂》之作，大约即在此后不久。

怀王为秦虏，魂亡魄失。屈子恋君而招之，盛言归来之乐，以深痛其在秦之苦也。……时怀王未死，故曰“有人在下”、“魂魄离散”，盖入秦不返，惊惧忧郁而致然也。（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

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招魂》）

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礼记·礼运》）

“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仪礼·士丧礼》郑玄注）

“皋”，长声也，某死者之名也。“复”，反也，降衣下之也。（同上）

“招具”，……《礼》所谓“上服”也。……“啸呼”，即所谓“皋”也。（朱熹《楚辞集注》）

像设君室，静闲安些。（《招魂》）

“像”，盖楚俗，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祠之也。（朱熹《楚辞集注》）

“像”，……愚按若今人写真之类。（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楚怀王）三十年，……（怀王）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秦因留楚王。（《史记·楚世家》）

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同上）

《招魂》作于楚怀王死时，是襄王三年，屈原46岁时做的。（郭沫若《屈原研究》）

2. 《招魂》的艺术特点

《招魂》是《天问》之外的又一篇奇文，其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均有独到之处。

（1）改造民间形式，自铸新篇

"招魂"是始于科学不发展的人类古代的一种迷信风俗。有在人死后招其魂者，也有在人生前因病或受惊而招其魂者。屈原《招魂》的产生与当时楚国巫风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它是屈原改造民间流行的巫觋招魂辞的形式再创作而成的诗篇。屈原曾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创作《九歌》，他对民间招魂辞的形式当然也是熟悉的。《招魂》前有序言，中为招魂辞，后有乱辞，以招魂辞为全篇主干。这种结构形式和"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的写法，以及招魂辞句尾通用极其特殊的"些"字等，都无疑显示了民间巫觋招魂辞形式的特征。《招魂》的创作再一次证明了屈原是善于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的伟大诗人。

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魄，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祠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朱熹《楚辞集注·招魂序》）

半开化的民族常有招魂的事。……弗拉社曾记缅甸的招魂词如下：

缅甸的加伦人不断的为他们的灵魂而焦虑，只恐怕灵魂远离人身而陷入于危险。如果有人猜疑自己的灵魂将要离开了，于是便举行个留住它或召回它的仪式，全家人都得参加。……念道："啊！回来呀，我的灵魂，别在外边停留呀！天若下雨，你便要淋湿了。太阳若出来，你便太热了。小蝇们将刺你，蚂蝗们将咬你，老虎们将吞你，雷电将劈你。啊！回来呀，我的灵魂。这儿恰相反，你将异常舒适。你什么都不会缺少。来吃罢，狂风暴雨都不会袭你。"（《金枝简编》第十八章第二节，弗拉社夫人法译本，页172-3，转引自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一《古代诗史》）

《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

《楚辞·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按：一本"些"作"娑"）。此乃楚人旧俗。（沈括《梦溪笔谈·辩证一》）

《招魂》首尾用骚体，中间主要用四言形式。每隔一句，句尾用"些"字，与其它各篇用"兮"字不同，大概是摹拟南方巫音。（游国恩《屈原》）

屈赋《招魂》，除首段的叙事及末段的"乱曰"外，中间的"招曰"以下，全是摹拟苗族巫师招魂咒语的形式；尤其是语尾用了极其特殊的"些"字，当是从摹拟苗族咒语尾声的"写写"而来的。（汤炳正《屈赋新探·〈招魂〉"些"字的来源》）

屈赋《招魂》语尾的"些"字，相当于苗族招魂咒语尾声的"写写"。因为"些"字本系"此此"的重文复举，以"二"作为重文符号。在古代文字里并没有"些"字，后世才误把"此""二"合并为"些"，并改读叠音为单音。其音读仍如"此"字，在古音歌部。……可见，屈赋《招魂》，乃是采用当时盛行于楚国少数民族中招魂咒语形式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它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浓厚民间文学色彩的瑰丽诗篇。（同上）

（2）描写铺陈夸张，新奇细致

在表现手法上，《招魂》不同于《离骚》、《九章》之以抒情见长，而是以善于描写著称。它无论"外陈四方之恶"，还是"内崇楚国之美"，都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作者广采神话传说，充分发挥想象，描写天堂、"幽都"之可怖，铺陈东、南、西、北之极危，既怪异，又新奇，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写楚国宫室之美，服、食之奢，歌舞之乐，娱酒之欢，又无不是对现实社会中楚王奢靡生活的如实写照和细致刻画，既生动，又逼真，分明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征。《招魂》这种铺陈夸张、新奇细致的描写手法，无疑对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五谷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招魂》）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二八侍宿，射递代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娱酒不废，沉日夜些。（同上）

康回倾地，夷羿骅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文心雕龙·辨骚》）

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

宋玉《招魂》，在《楚辞》为尤多异采。约之亦只两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刘熙载《艺概·赋概》）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曰"至"曰"极"，此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所谓"欲人不能加"也。（同上）

铺，有所铺，有能铺。司马相如《答盛览问赋书》有赋迹赋心之说。迹，其所；心，其能也。……且言赋心，不起于相如，自《楚辞·招魂》"同心赋些"已发端矣。（同上）

（3）文藻瑰丽富艳，异采纷呈

与描写的铺陈夸张、新奇细致相适应，《招魂》的语言艺术异采纷呈。最突出的表现则是文藻瑰丽富艳。特别是铺陈描写"楚国之美"的一大段招魂辞和篇末的"乱"辞，写得色彩缤纷，声韵铿锵，

词藻华美，文采斐然，体现了作者驱遣文字的功夫已臻炉火纯青之境地。《招魂》描写之铺陈和文藻之富丽实开汉赋之先河。但同时也不无消极的影响，后世赋家专务文辞之巧丽，趋繁竞艳，以致“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招魂》之作，实开其端。

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氾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文异豹饰，侍陂陁些。轩辌既低，步骑罗些。兰薄户树，琼木篱些。魂兮归来！何远为些！（《招魂》）

乱曰：“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步及骤处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皋兰被径兮路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同上）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同上）

赋欲不朽，全在意胜。《楚辞·招魂》言赋，先之以“结撰至思”，真乃千古笃论。（刘熙载《艺概·赋概》）

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然往往有以竟体求奇，转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为泄奇地耳。（同上）

第四节　楚辞的流变和屈原的影响

一　楚辞的流变

在屈原及其作品直接影响下，产生了楚辞流派。楚辞流派以屈原及其作品为旗帜，以《楚辞》一书为标志。在这一流派中，宋玉是屈原之后的重要作家，而《九辩》以及《卜居》、《渔父》则是屈作之外的重要作品。

（一）楚辞流派的兴衰

屈原不仅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诗体，而且开创了文学史上第一个流派。史载屈原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好辞而以赋见称”，但其作品多未流传。《汉书·艺文志》载有“唐勒赋四篇”，然皆亡佚；景差之作则未见著录。王逸曾谓《大招》作者“或曰景差”，而同时又称“疑不能明”，学者们则多不信。唯一有作品流传后世且有一定影响者是宋玉。自屈原之后，仿作楚辞者代不乏人，但大都缺乏创造精神，唯模拟是务，亦步亦趋，专求形似，于是堕入末流，渐趋僵化。然而应该看到，作为“词赋之宗”、“词赋之英杰”的楚辞作品，确实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正是它们直接促进了汉赋的繁荣与兴盛。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史记·屈原列传》）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书·地理志》）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

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班固《离骚序》）

（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王逸《楚辞章句序》）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同上）

（宋玉）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

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文心雕龙·辨骚》）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文心雕龙·时序》）

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裴子野《雕虫论》）

骚为赋之祖。（刘熙载《艺概·赋概》）

后世不问意格若何，但于辞上争辩，赋与骚始异道矣。（同上）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然言赋者多本屈原。汉世自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鹏鸟》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赋》，自《远游》流变。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及淮南、东方朔、刘向之伦，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也。（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刘师培《汉书艺文志书后》）

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同上）

（二）宋玉和《九辩》

1. 宋玉

宋玉是楚辞流派中屈原之后的一位杰出作家。宋玉的成就固不能与屈原相比，但在受屈原直接影响而产生的一批楚辞作家中，唯他有作品流传后世，且有一定成就，故得与屈原并称“屈宋”。关于宋玉的生平事迹，难以详考。从仅见的零星记载中，可知他是战国晚期楚国人，后于屈原而与唐勒、景差同时。他出身寒微、曾入仕于襄王，才高位低，颇不得志。王逸曾说他是“屈原弟子”，虽无确证，但其作品确实是师法屈原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有赋16篇，篇目失考。《楚辞》载《九辩》、《招魂》二篇，王逸定为宋玉所作；此外，《文选》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载《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作者亦归宋玉。但《招魂》应为屈原所作，而《文选》及《古文苑》所载各篇，其风格、体制不似先秦之作，叙事行文亦多可疑之处，故学者们多认为乃后人拟作。可信为宋玉所作者，《九辩》一篇而已。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辨骚》）

屈、宋以“楚辞”发采。（《文心雕龙·才略》）

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周书·庾信传论》）

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狡兔，曰东郭㕙，盖一日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见指注，虽良狗犹不及众兔之尘。若摄缨而纵绁之，则狡兔亦不能离也。今子之属臣也，摄缨纵绁与？瞻见指注与？”其友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诗》曰：“将安将乐，弃予如遗。”（《韩诗外传》卷七）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新序·杂事第五》）

宋玉赋十六篇。（按原注：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汉书·艺文志》）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

宋玉者，楚之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于王，王以为小臣。……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

作赋者托古人以自畅其言，固不计其年世之符否也。谢惠连之赋雪也托之相如，谢庄之赋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为文，乃词人之常事。然则《卜居》、《渔父》亦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自作明矣。（崔述《考古续说》卷一《观书余论》）

宋玉者，……所作本十六篇，今存十一篇，殆多后人拟作，可信者有《九辩》。（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其称为赋者则九篇（《文选》四篇；《古文苑》六篇，然《舞赋》实傅毅作），大率言玉与唐勒、景差同侍楚王，即事兴情，因而成赋，然文辞繁缛填委，时涉神仙，与玉之《九辩》、《招魂》及当时情景颇违异，疑亦犹屈原之《卜居》、《渔父》，皆后人依托为之。又有《对楚王问》，……其辞甚繁，殆如游说之士所谈辩，或亦依托也。（同上）

今天我们在《文选》、《古文苑》诸书里所见的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大言"、"小言"诸赋，实际上都不是他的作品，都是后人所依托的。（郑振铎《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2. 《九辩》

（1）篇名释义

《九辩》亦如《九歌》，原为古曲之名。宋玉乃袭用古题创为新制。"九"表多数，"辩"通"变"、"遍"，一遍即为一阕，"九辩"即指由多阕乐章组成。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离骚》）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天问》)

辩者，变也，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也。(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

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也。(《周礼·大司乐》郑玄注)

按九者，乐章之数，凡乐之数，至九而盈。……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王夫之《楚辞通释》)

《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2)内容主旨

《九辩》既不纯为王逸所谓"闵师"之作，也不全是宋玉自叙之辞。它是一首师法屈原作品借闵惜屈原而自抒胸臆的长篇抒情诗。《九辩》中有不少蹈袭屈作的痕迹，不仅语多模仿，而且有整段抄入者。这既表现了宋玉对屈原作品的激赏，也说明了他对屈原遭遇的同情。诗中申言事君不合、慨叹生不逢时、忧患国事危败、痛斥谗佞当道等等，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含有闵惜屈原的意味。不过，此诗以闵惜屈原为表，以自抒胸臆为里，主要还是抒发了宋玉本人的思想感情，并且还多少透露了一点宋玉的身世。因此可以认为，《九辩》是宋玉借闵惜屈原而自述其志之作。

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

宋玉感时物以闵忠贞，……玉虽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阨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王夫之《楚辞通释》)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积思，心烦憺兮忘食事。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九辩》)

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同上)

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心闵怜之惨悽兮，愿一见而有明。

……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同上）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钼铻而难入。……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同上）

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恐时世之不固。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榘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同上）

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险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按：以上八句抄自《哀郢》）。（同上）

（3）艺术特点

《九辩》是《楚辞》中一篇出色的抒情长诗。它虽模拟屈作，且袭用屈作词句，但在艺术上却有自己的独创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善于写景抒情，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特别是开头一节"悲秋"的描写尽情渲染环境的气氛，把肃杀萧瑟的自然秋景与悲凉凄怆的诗人心情融为一体，情与景互相映衬，主、客观和谐统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具有强烈的感伤情绪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故千百年来受到不少文人学士的推崇，并在一定条件下唤起他们的共鸣。由于宋玉出色的艺术创造，使得"悲秋"从此成为诗歌创作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此外，《九辩》以散文句式入诗，句法更趋灵活，以及善用双声、叠韵、重言等，也表现了它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性。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宋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宋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九辩》）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

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沉藏。（同上）

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躣躣。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轾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骑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同上）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曹丕《燕歌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其二）

（《九辩》）举物态而觉哀怨之伤人，叙人事而见萧条之感候。（陆时雍《读楚辞语》）

（《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三）《卜居》与《渔父》

1. 关于作者

《卜居》与《渔父》是两篇性质相类的作品。它们虽非屈原所作，但在《楚辞》中不失为出色的篇章。这两篇作品都以"既放"后的屈原为描写对象。作者从第三者的角度，分别通过屈原与太卜和渔父的对话叙写，表现了屈原"忠而被谤"的怨愤，不信天命、卜筮的思想，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和他坚贞不屈、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不与谗佞同流合污的精神。这与《离骚》、《天问》、《九章》等作品中所反映的屈原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作者对屈原的生活和思想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此外，《卜居》以"长"、"明"、"通"相叶，《渔父》以"移"、"波"、"醨"、"为"相叶，均为先秦古韵。这些用韵上的特点，证明它们确系先秦之作。这样看来，《卜居》、《渔父》

的作者虽难确考，但可知是受屈原直接影响的楚辞流派中人。

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王逸《楚辞章句·渔父序》）

《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嵇康《高士传》或采《楚词》、《庄子》渔父之言以为实录，非也。（洪兴祖《楚辞补注·渔父序注》）

又有《卜居》、《渔父》，述屈原既放，与卜者及渔人问答之辞，亦云自制，然或后人取故事仿作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卜居》和《渔父》两篇，很多人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特别是《渔父》那一篇应该是后人的著作。但作者只是把屈原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并无存心假托。它们之被认为屈原作品，是收辑《屈原赋》者的误会。这两篇由于所用的还是先秦古韵，应该是楚人的作品。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这在研究屈原上，不失为很可宝贵的资料。（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

2. 艺术特点

《卜居》与《渔父》是《楚辞》中两篇简练精巧而又颇富创新意义的佳作。这两篇作品在艺术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构思新巧，都是以第三人称记叙的“设为问难”之作。二是表现手法相似，均善于从“对比”中突出文章的主旨。《卜居》中记屈原之语，皆一正一反，两两对照，“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不言而喻；《渔父》则以屈原之语与渔父之言形成鲜明对比，在道不同而言相异的记叙中，表现了屈原忠于操守、坚贞不渝的精神。三是韵散相杂，而以散体为主，句法灵活，用韵随意，体现了由楚骚向汉赋过渡的形式特征。《卜居》与《渔父》在艺术上的成就对后世文学有较大影响，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

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氾氾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卜居》）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渔父》）

又有《卜居》、《渔父》，……其设为问难，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则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皆是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二　屈原的影响

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在文学史上理所当然地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他的光辉精神和不朽杰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到唐代的李白、杜甫，直至现代的鲁迅、郭沫若，我国历代有成就的进步作家，很少有不受到屈原精神的激励和屈原作品的哺育的。屈原精神感召后人，屈

原作品沾溉后世，正如刘勰所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迁作《史记》）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陶渊明《悲士不遇赋序》）

史臣曰：……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宋书·谢灵运传》）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

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杜甫《最能行》）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刘禹锡《竹枝词·引言》）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佇。禹锡

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新唐书·刘禹锡传》)

参之《离骚》以致其幽。(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苏轼《答谢民师书》)

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彷徨》题辞)

屈原是永远值得后人崇拜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对于国族的忠烈和创作的绚烂，真真是光芒万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郭沫若《关于屈原》)

《离骚》出来到现在2000多年了，文学方面，莫有不受它的影响的。后代的各种诗体，如五言、七言、长短句等，都可以在《楚辞》中找出胚胎的。这正是屈原伟大的地方。(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
作者＝郭预衡
页数＝415
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
SS号＝10918757
DX号＝000000323540
url＝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323540&d=AC0FC4E2F9ED3ADC46CCE1A58DF38B05&fenlei=09030&sw=%D6%D0%B9%FA%B9%C5%B4%FA%CE%C4%D1%A7%CA%B7%B3%A4%B1%E0